



骆耕漠早年文录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駱耕沙漢梅花鐵骨寒暗香侵
古道今日猶芬芳余以冬心先生法畫
梅一枝為早奉文錄出版賀即乞
耕漢同志清正而實于筆端藉其重時





目 录

自 序

美亚工潮始末·····	(1)
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	(14)
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结束之后·····	(22)
水旱灾的“交响曲”·····	(35)
农民借贷所与银行的典当化·····	(43)
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	(52)
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	(73)
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	(94)
工业日本与农业中国·····	(111)
惊动全球的华北走私问题·····	(120)
中日经济提携·····	(130)
第一节 “中日经济提携”的诞生·····	(131)
第二节 日本怎样实现“提携”·····	(141)
第三节 “提携”的惨痛成绩·····	(152)
第四节 今后的展望·····	(162)
速起扑灭汉奸·····	(171)
盐阜区两年来的货币斗争·····	(173)
盐阜区农村的巨变·····	(203)
如何解决战时部队的油盐菜供应问题·····	(208)
新区初期的部队供给工作·····	(216)
第一部分 新区初期部队供给工作的特点及其	



	基本任务·····	(216)
第二部分	豫皖苏初期解决给养问题的检讨·····	(219)
第三部分	今后供给工作的若干政策问题·····	(226)



自序

1934年春，我刚出狱不久，除革命前程重大问题，迫在眼前的是人海茫茫，从何处找到一个栖身的社会机会？因为我父仅凭当个穷小律师的极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要养活一家大小七八口，我不能再象过去六七年狱中那样来加重他的负担。在这焦愁中，见到浙江省电话局举办话务员、报务员临时培训班，登报招考二三十名学员。这是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录取后，在杭州城皇山顶受业务培训，我搭饭在居民家中，每晨开窗望朦胧雾色，不知当话务员后又将如何开拓下一历程？

三月初旬的一天，老难友徐雪寒自上海来信，相告他通过老难友薛暮桥（当时在广西教书）的介绍，结识了钱俊瑞、姜君辰等几位新朋友。说他们正接下《中华日报》的一笔“生意”，为该报每周包编、包写、包校《中国经济情报》副刊一期，约一万言，报社每月供一百几十元报酬（这是十分苛刻的报商资本做法，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则不失为一个有官僚空隙可乘的大好时机，每月有四万几千字的较自由的言论阵地可供摆布）。他说，他们急需一位能一样穷干、专干的朋友，参加负责编、校工作，一月分担写几千字的文章，便可有十几元来对付生活难



关。他希望我去。他同时附来钱俊瑞刚以“陶直夫”的笔名、在中华书局编辑（后知为钱亦石主编）出版的《新中华》月刊上，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之后，知道他结识的新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能曲笔战斗的人。我喜出望外，立即前往上海。

记得雪寒约我在南站下车，他可就近来接我。这是我们狱中分别八九个月后，第一次能自由相见。当天下午，俊瑞就到我们住的亭子间来看我，寒暄几句后，就问我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第二天他又约我与君辰一起相见，他们交谈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的白银政策。接着他们就布署我为《中国经济情报》下期写一篇短评。这对我当时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大难。俊瑞大概见我有些窘，就说：你找近日报纸看看，我们再谈一次，你大胆写。我们当年是按这样的“时间就是金钱”而工作着。那篇“美国白银政策”的时论，虽然是我执笔，实际不过是记录俊瑞的评介，而且是经他修改定稿的。我请他署名，他说不合适，随便想个笔名，于是就按他拟的“朱心湛”笔名发表。这大概也有所寄寓，以示我们应努力抱着一颗丹心来挥笔。

1934—1937年间（上海沦为孤岛前夕），我是这样开始跟随新老战友踏上革命文化战斗的征途。我当时只有过去几年在监狱里自修所得的马列主义的点滴基础知识，就用它来作武器，学习列宁的“伊索寓言”式曲笔，联系国难当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等实际，写通俗宣传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主要是写经济时论，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军国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国民经济破落、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黑暗现象。回顾早年所写的文章，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现在读来，大多稚气醒目，不禁羞愧。本书收录下的前十二篇，仅因它们有些史料和激情。我的处女作《美亚工潮始末》，曾得到当时目睹斗争现场的老难友骆之正所提供的工会传单等资料的帮助。记得《中华日报》也同其他各报一样，按新闻检查的反动规定，于后半夜一点送审，如遇删禁，报馆只好“开天窗”（即被删禁处作为空白上机印出），以免次晨报童无报上街叫卖。我那篇《始末》就有几处“天窗”待遇。这时我们也有不遭恶运的一面，它可吸引更多读者注目去揣度问题。斗争实践是最好的学校，这个机遇使我知道以后该多写什么经济时论，以及如何运用曲笔来战斗。

这里也叙一下我是从《始末》起，一般用“骆驼耕漠”的笔名发表文章。我深知自己文思迟钝，运笔笨拙，但当时有股韧劲。为了替死难烈士报仇，为了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在不能用剑时，就尽量用笔来作战，发挥一兵一卒的作用。“骆驼耕沙漠”既是我的自嘲，也是对自己的奋勉和鞭策。近年来我用它来督促自己的科研工作。

本书收录的后四篇，是皖南事变后，我从浙皖转移到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做实际财经工作，和以后自卫解放战争期间在山东、豫皖战场上参加部队后勤供给工作中，



挤时间写成的东西。因为近年来受到征集党史资料和党史访问的推动而翻出来或设法找到的几篇文稿，其中可能有点部门性的参考价值，也就收在这个《早年文录》中。

以上十六篇文章，都是当年刊出过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认为，其中的往事记录、数字资料和分析，对财经院校今日的教学工作来说，仍有相当的用处，敦促审定，以便安排出版。蒙此关注，我在原订科研写作计划之外，编成这个“鸡肋”味的文录，其中除《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一文的第一节作了几处删改和少数地方作了个别修辞外，均按当年原作刊出。这里谨向出版社同志们深表谢忱。

老战友、著名书画家赖少其同志闻讯后，还特地挥毫为《文录》作诗画加勉，我应努力多发余热奔征途，尽自己的本份。

书中不当和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美亚工潮始末*

一、美亚织绸厂内容一瞥

1919年，浙江湖州乡绅莫觐清与蔡声白投了3,000元资本，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开了一个织绸厂，当时只有织机十二台，规模甚小。这就是美亚厂的起源。

嗣后，赖工人之力及大战后之机运，年年都赚得厚利（1928年与1929年，生意尤好，每年净利达200万元）。所以在十年以内，他们就以赚来的厚利，在沪上各地开设美伦等等九个织绸厂。去年（1933年2月），他们为了便于管理，就把以前个别经营的以“美”字起首的各个合资厂，归并成现在的美亚，采用近代的股份公司的形式。它现在有经纬总厂一，织绸分厂九，染练厂与纺织厂各一，此外还附有织物试验所、厂员训练所、发行所与总管理处。它一共有职员四百余人，男女工人四千余人，织机一

* 本文在当年《中华日报》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1934年）内。



千二百余台（百倍于创办之时），已收资本为 280 万元，总计资产在 1,500 万元以上，所以在目前的上海，它可算是最新最大的织绸厂了。

主持该厂的人们都是欧美留学生，不消说他们对于如何使营业发达，如何使利润加厚，是异常精明的。

参加这次工潮的美亚总厂及其九个分厂，在沪上的分布是这样：

总厂……………马浪路	六厂……………斜土路
二厂……………交通路	七厂……………瞿真人路
三厂……………胶州路	八厂……………斜徐路
四厂……………胶州路	九厂……………徐家汇路
五厂……………鲁班路	十厂……………八字桥

二、工潮的起因

在去年3月2日，即寒假期满工人回厂工作的第二天，该厂以营业不佳，突然宣布实行减少工资。工人本在各厂急转的机轮旁边工作，这意外的消息却惊扰了他们善于忍受而安静的心灵，于是不到五分钟，轧轧的机声就相继静息了，历时二月许的美亚工潮就这样掀起！

关于减资原因，厂方这样说：

“敝厂减资之原因，完全由于年来绸市一落千丈，绸价已跌至成本之下，而工资仍占售价10%（例如最普通之和合绉，昔时每匹售价二十余元左右，而工资为一元二



角，占售价5%，最近每匹只售十元左右，而工资依然未减，故占售价10%），每售一匹，即亏折不费。其他丝织厂早已纷纷减低工资，以轻成本，敝厂为维持公司生存及各职工生计，免亏折净尽而停工起见，不得已于3月1日宣布减订工资，但所减订者仍较其他各厂现年工资为优高……”（美亚厂上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书）

但据美亚罢工委员会所印行的《罢工日报》，当“其他丝织厂早已纷纷减低工资”的减资运动中，美亚厂亦不落人后地“早已”参加在内。它于去年2月减资一次后，又于当年7月借口营业不振，再将厂内工资打个九折，不过当时是风平浪静地过去，原因大概如工人们自己所说：

“只要我们能支持生活，只要资本家不停止我们的生存，我们是愿意忍受痛苦、压迫……我们不愿在压迫与剥削之下说句抗辩的话！”（3月9日美亚罢工宣言大意）

真的，在重重压迫之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确是忍受着他们在应有的生活水准以下的生活！

对于美亚厂年来营业的盈亏，上述宣言有如下的剖解：

“根据厂方的报告，1933年公司的营业总额竟达六百万，是公司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试问：这是营业萧条的结果吗？在前只有两个厂开夜工，而去年增加到四个，同时据新近的报告，公司所有的十个厂在今年都可增添夜工，这是营业不振的情况吗？”

同时，在其他资料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据美亚厂去年的报告和估计，他们的成本中原料和材料占六成，制



造费用占二成，营业费用占一成，工资只占半成到一成。譬如，一匹普通的绸缎的成本：

原料材料费	10.00元
制造营业费	5.00元
工资	1.00元
共计	16.00元
批发价	17.50元
每匹净利	1.50元

资本家在每一匹上虽只净赚一元多钱，但是美亚厂有织机一千多架，去年生意清淡，每天也可出700到1,000匹，就是说每天起码也可以赚1,000元，一年起码也要净赚36万元，这还是去年的情形。其他各种产业如丝业、棉织、面粉等都生意不好，但是美亚还是赚钱的”。

至于工资（这当然是指去年7月减低后的工资而言），在前述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厂方认为“不合理”，务须加以再减。这“不合理”的真实内容到底是怎样呢？

“按照厂方的布告，去年的工资总额是百万余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8%。靠了这百万余元，每个工人在去年一年中所领得的为260元，即每月收入20元。试问这样一个数额，对于终日劳动并有家小待养的每个工人，是否是过多的给予？同时还须说到，这百万余元因为包括着较高较大的职员之月薪，因此实归工人的还需大打折扣，则任何人也能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是怎样了！所谓‘不合理’的工资只有站在工人的观点上，才是确实的不合理！”



“此外，厂方又进一步地这样宣布说：伴着运用机器能力之加强，工人现在还是能够增多工资之收入，可是他们忘记指出：这对于公司也能提供更多的生产，同时机器的结构也是随着技术的熟练而更复杂，譬如从前只织简单的经纬，而现在却要织造繁丽的花纹。所以归根结底，工人实际收到的是比从前少！”（九月罢工宣言）

关于这点，另一处说得更具体：“如华丝葛，从前是八十梭一时，现在加到九十六梭或一百梭一时；从前是单梭厢，现在是双梭厢；从前用单轴，现在用双轴；现在的机器管理较前麻烦四倍；即现在的剥削程度比从前加高四倍……。”

所以3月2日厂方宣告再将工资打个八五折，同时又限制每人每日至多生产五匹，这无异将他们的工资再从二十五元减到十五元了！假使再估计到种种的损失与赔偿，他们只能实赚四角一天，在高度的上海城市生活威胁下，他们全体四千余工人就相继地宣告罢工。他们说：

“我们所要求的是生存，而我们赖以生存的是我们的体力劳动。今工资再减，生存是无可维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日一日地受苦呢？在这种被迫的情势下，我们只好诉之于我们的最后武器——罢工！”（罢工宣言）

三、3月11日

在3月2日至10日的九天之中，厂方除了布告二次，力



说减资之合理和必要外，还迭派人员分头“忠告”工人，但于事无济，罢工依然继续着。沪上各报，除了10日的时事新报载有美亚工人于9日散发罢工宣言的简短消息外，都未注意到4,000工人罢工九天的这一事件。可是两三日后的报纸就稍有不同，原因是美亚工潮发生了惨剧：

“美亚织绸总厂暨各分厂工人四千余名，为反对厂方减低工资，宣告总罢工，并与捕探发生冲突，造成惨案。”（3月14日《时事新报》）至于“惨案”的真象如何，该报却未详记，其他各报也是一样。3月24日首次发刊的《罢工日报》，对于惨案才作了较详细的补述：

“3月11日，我们工友推选代表，约定在马浪路美亚经纬厂与总经理蔡声白直接谈判复工条件。蔡不但避而不见，而且关闭铁门，通过电流，意图将厂内的工人代表软禁起来。同时勾结法帝国主义，派大队武装巡捕，将厂外静候消息的男女工友包围，用木棍殴打，手枪扫射，显现出帝国主义十足的残暴，我们手无寸铁的工友，好象是他们的泄怒器，我们工人受伤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脑部破裂，性命已很危险；有的牙齿全部打落，饮食不能下咽。哀号震天，惨不忍睹，这种借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暴行，不禁使我们回想起过去的五卅惨案，更觉痛心！”

据说当时的女工们，为了可以更坚决勇敢地迎着木棍和手枪的射击而冲向前去，大家都手挽手地向狞恶的巡捕挣扎，这些就是沪上各报略而未详的惨案经过。



四、第一次请愿

惨案的经过是这样，但是工人们“把受伤者送入医院却遭了拒绝，照相馆也不愿拍照，报纸上也一字不提”，因此，他们乃于3月13日传发“三一一惨案”的宣言，并分批出发，在闸北五卅公墓集合，全体步行，齐赴市政府请愿。市政府恐生意外，“当即通知市保安队飭派保安队二大队，同时五区公安分局飭派长警多名，到场维持秩序。工人步行时，沿途均有军警‘保护’，抵达市府时，由该管七区一分所全体长警武装戒备”。他们的一致请求是：

1. 向法当局提出抗议；
2. 飭厂方收回减低工资成命。

市政府的答复是：第一，事关刑法，可向法院起诉；第二，劳资纠纷，待令社会局查明调处。工人因为要有“确切满意”的答复，然而所得的却是“官僚式的官话”，于是就“鹄立不散”。直至下午六时，总工会闻讯，立派干事再加劝导，并为代雇搬场汽车多辆，将工人分批载回。《罢工日报》说：“原来向市政府请愿，是得不到好结果的，只是一幕悲剧罢了！”

五、公安局前之一夜

3月14日早晨，厂方布告，限工人于17日起一律复



工，否则，决依市社会局核准之工场规则二十六条三、四两项，作自动解雇论，另招新工，然而到了17日，催工钟虽然打了三次，工场中仍是寂无人影。

当日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公安局又派了督察队员，分向五、六两厂逮捕工人，结果五厂里有一位姓柳的被队员带去，于是全体工人就开会决议，齐向公安局请愿。他们因为局方的答复不确，就一直守到天黑，再等到第二天天亮。当晚担挑食物来慰问他们有金织公司、元丰厂、和兴厂、宝丰厂等等的工人，那夜的情景，《罢工日报》这样记载：

“一夜的痛苦，静静地坐在草地上过去了！大家都感得疲乏，朦胧的睡眠都发了红，气候虽到了春天，但夜半的寒风还是吹得逼人，使我们都冷得发抖。有许多柔弱的女工友都患了病，凄惨呜咽的景况，见者无不予以同情的悲动！”

到翌日（18日）的上午九点钟，姓柳的工人才放出来，他们兴奋地放了不少凯旋的鞭炮，忘记了昨夜的疲劳，一同整队回厂。

六、党政调解无结果

因为厂方不允收回减低工资的成命，工潮还是向前发展。工人因为生活无从支持，组织了各厂的募捐队。同时因为各报不愿详载他们的消息，他们自己编印《罢工日



报》。他们希望社会了解，给以同情的援助。他们希望达到“不减工资”的目的，以支持他们仅有的生存！至于厂方，则“恐此纠纷短期难以解决……拟呈报党政机关，宣告停业”。

工人以罢工为武器，厂主以停业相要挟，对立局面是日趋尖锐。到了4月5日，四五百名的练习生与艺徒又参加罢工，形势更加严重。据厂方说，他们底加入罢工，乃受各厂工人的要挟。然在实际生活上，他们也和各厂工人一样受着苦难，这短短的记述足以说明这点：

“对于艺徒的待遇，除了要出保证金和伙食以外，还有不近人情的剥削。譬如艺徒已经学好了，当然同等工作应受同等报酬，但是艺徒的工钱是由厂方临时核定的，有的五折、四折和三折，甚至有的干脆揩油。这种把戏不仅使老弱的职工随时都有被开除而毫无抚恤的危险，就是在艺徒的本身上，资本家就认为是一笔好生意！”

工潮既然这样扩大了，于是社会局乃于4月6日召集调解委员会，再行一度调解。调解委员共七人，其分配如次：社会局一人，为当然主席；市党部与公安局各一人；美亚厂二人；美亚全体工人四千，只推二人。

调解的结果怎样呢？4月17日的《时事新报》这样说：

“……劳方代表申述要求厂方恢复1933年上半年度之原薪，厂方代表当时宣称……厂方现实资金已无法流通，准有宣告停业，经主席再三向双方劝导，直至下午五时，仍无结果。”



七、第二次请愿

因为“直至下午五时，仍无结果”，社会局乃宣告4月10日上午十时再集合调解，拟于会议厅上和平解决这工资问题，可是到了10日，情形比前更坏，因为：

“届时总分各厂工人代表均到局，惟资方代表未到。据资方呈报不到理由，因该厂已决计停业。今日召集之调解会，系以调解减低工资为目标，该厂既欲停业，则工资之减低与否，已属不成问题，故无庸推派代表出席。”（11日《时事新报》），所以会议是“不开而散”，工人代表是带着失望与恐惧回厂。同时，厂方除宣告停业外，更决定只给工人的伙食。这样，全体工人就感到受生命的威胁，不得已乃于当日下午三时，陆续赴社会局请愿，要求：

（一）维持伙食；（二）制止减低工资。当时“社会局一方面以工人愈聚愈多，人声嘈杂，力劝不散，乃电呈市公安局当由该局派保安队三十余名及警察二十六名到场弹压。另一面派员劝导工人，先行归去静候解决。然工人方面以此事延宕月余，仍无结果，况各厂工人生活堪虞，势非立时解决不可。故虽经社会局多方解释，而包围（社会、教育、卫生三局）如故，不肯散去。其中有许多女工，捶胸大哭，情形甚为凄惨。”（11日《晨报》）

嗣后的情形，该报又接着这样写：

“及至下午五时许，有工人方面之慰劳团多名，携有



大批面包及大饼油条等食物，分送各工人充饥。其时适值三局下办公室之际，（因工人横卧出入要道），致被四面包围，无从越雷池一步。至九时许，资方仍无代表到来，工人因而再进社会局询问，然仍不得要领。斯时除一部分工人因要求未遂而痛恨外，秩序仍整齐，不消紊乱。当记者问讯往查时，至社会局门前，一般工人即拥上前，疑为资方代表也，及经记者报告来意，众工始失望而散。时天雨蒙蒙，泥地潮湿，男女工人沐雨栉风，不稍畏怯，态度极为坚决。”工人“沐雨栉风”地等待着资方代表，部分女工因要求未遂“捶胸大哭”。至于厂方则曰：“与其派代表而无结果，不如静候党政机关之处置”。他们非实行减资不可。

那末社会局怎样解决这当前的争议呢？13日的《大公报》较详地这样告诉我们：

“自经社会局再三劝告工人无效，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及保安处长杨虎，奉市长令派大队警察及兵士一律徒手用竹竿，并备救火车二辆，于今晨（11日）五时集中向市中心区出发。及至上午八时，首由徒手警察及兵士，分路驱散工人，而工人众多，以至工人被挤，受微伤。乃至上午十时，始将工人驱逐离社会局，至十二时始完全各自散去。”

所谓因“被挤受微伤”的，该报又有这样的记载：“受伤工人共计男女约十余人，大部分为轻伤；惟其中有男女五名，伤势较重，各送公立上海医院医治，姓名如



下：美亚九厂女工吴常娟，年二十四，浙江人，伤头面右腿；又九厂女工王玉英，年二十五，绍兴人，伤左眼；七厂女工于秀珠，浦口人，年二十六，头面右臂受伤；八厂男工周田福，年二十四，宁波人，人事不知；八厂男工任贤，年二十八，浙江人，腰背头面受伤。以上五人，周田福恐有性命之忧。”

这次市府派遣军警驱逐请愿工人，与前月同日法界工部局指使武装巡捕毆击扫射美亚总厂前面的请愿工人，正相呼应，不过这次除派兵警驱逐外，“市长吴铁城对美亚工人不服党政机关劝告，捣乱地方治安，除将为首工人拘去外，并将各厂代表十余人，通知市公安局七区二分所，派警捕去，闻当押送警备司令部惩办”，这样，社会局之包围乃告解散！

八、工潮的结束

接着驱逐与拘捕，淞沪警备司令部复于11日发出制止工潮的布告，中央又于14日特电沪市党部迅予处置美亚工潮。经过这样的“调解”，总厂工人遂于17日“先复工后谈条件”地到厂工作，其他各厂也陆续复工，到二十五六日，美亚在为沪上各报大登广告，说该厂织出了一种最新式最华丽的“绉縐”，最宜于镶饰“摩登少女的旗袍”。美亚工人的汗血又已变成商品，在光耀夺目的玻璃窗内陈列了！



不过，事情最后也几经周折：4月11日沪上党政机关会衔布告，训令厂方开车，工人复工。厂方就于12日晨将这布告分贴在各厂门前，大打其催工钟，附近各公安分所还加派警士“保护工人复工”，然而全体工人依然拒不复工，他们希望党政机关能制止厂方减低工资！于是厂方一面“以工人违抗党政机关命令，拒绝进厂工作，决定于今日（13日）备呈请求市社会局市党部核办（一律开除）”。同时厂方又于17日布告：

“本厂兹已布告，限令各工人于即日起向本厂厂长登记，克日上工在案，凡本月17日起仍复违抗党政命令，延不上工之工人，显系别有企图，甘为反动，应予肃清，以分良莠，即于该日起，一律不准寄宿本工房，并停止其膳食。除分别呈报党政外，合亟布告通知，切切此布。”

到17日，虽有工人数百，齐往市党部请愿，但他们所请求的是释放被捕代表与制止开除工人。工潮是终止了，而减资成命并未收回。

现在拘禁在牢狱里的工人代表，共有四十余名，被厂方认为不良分子而拒其进厂复工的工人，共有一百五十余名。所以罢工后的美亚工人生活，除开忍受减资的痛苦以外，还遭遇失业和入狱的苦难，至于惨死工人的鬼魂生活还未计算在内。美亚工潮这种现实的归结，不能不说是惨痛的。

本文作于1934年4月29日



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

在今年（1935年）开端的一月间，东北方面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也不算坏的好消息！当时上海各大报纸都载着这样的电讯：

“抚顺煤矿工人 2,300 人，因工头 2 人为日人凶殴，16 日全体罢工，矿警开枪，击毙工人一。工人八百余聚众拥入总经理室交涉，日总经理明古江召矿警三百，包围开枪，死 87 名，捕去六百余名，死伤在矿区内枕藉，无人过问。矿方强迫未罢工者复工，因矿井水满，迄 17 日未复，顷日指其中 28 名为煽惑祸首，将予枪决。”

这事是发生在“我们始终否认”其业已沦亡的远远的东北；同时比起“我们始终否认”的东北沦亡来，这事又是“一件不关紧要的小小动作”，因此，被捕的六百余工人怎样，被击毙的 87 名工人怎样，那些将予枪决的 28 名工

* 本文在当年《中华日报》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二集（1935年）内。



人又怎样，我们就统统不得而知了！我们更这样想：国内定有不少“贤哲”的人们早已忘去这一事件，同时他们还更希望其他的人们一样容易忘去这“不快”的记忆！

最近，山东淄川方面又发生了动因不同而结果是同样悲惨的惨剧：

“5月14日济南专电：13日早11时25分，淄川鲁大公司煤矿第二坑七十五号开煤处发生大水，势甚急，坑内工人约四百余名，至晚未能救出，十九号开煤处有二百余工人亦未救出。六百余工人证明已全淹死，家属环井呼号，哭声震天。现积极打捞死人，约一周可捞出，实空前惨剧。”

鲁大公司名义上是中日合办的，实际上全在日资操纵之下。现在因为“工人家属五百余人包围事务所，怒号‘还夫还子’，几有暴动之势”，日本领事遂电请鲁省府派队前往弹压，以保全他们底生命财产。丧夫亡子的妇女们还不能为死者自由哀号呀！

不幸事件的一再出现，实在使我们难以忘去中国的煤矿工人是生活在死亡线上！

资本主义愈到东方愈野蛮，中国的工人原在极残酷的条件之下生活，而这次相延六七年的世界经济总恐慌，更加深了他们所受的苦难。失业、减工、减薪和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是普遍地展开于产业底各个部门，煤矿业丝毫也不能例外。不得已为了生活的挣扎而对资方有所要求的时候，工人们所得到的亦往往是无理的迫害，这



对于煤矿工人也绝无二致。去年开滦矿工潮的经过，以及前述日警的杀戮和弹压，就是现实的例证。而煤矿工人或一般矿工，因其所特具的工作条件之异常险恶，比起一般产业工人来是更与死神为邻。譬如河南彰德矿区，在今年4月份内曾发生两次爆炸：

“彰德讯：六河沟煤矿和顺井，于7日晚5时突然爆炸，声大如雷，重伤14人，皮肉焦烂，截至11日，陆续死去11人。”（4月14日《新闻报》）

“本县西北小寨煤矿，于27日工人正在工作之际，石头洞内突然透出火星，轰然一声，浓烟满布，火势甚猛，工人躲避不及，致死李黑只等十余名。身肠焦烂，骨质为灰，其状至惨。”（5月3日《北平晨报》）

这种不测的横祸，据我们从零星各报所已见到的，在去年（1934）一年间有如17页表所载（遗漏当属不鲜）。

各地煤矿工人所以这样迭遭横祸，虽说与他们底特殊工作条件有关，就是他们要沿着狭隘的地洞，坠身到深深的地壳之下去。但是，所谓因井水的突发、煤气的充塞以及烈火的爆炸等等关系而致他们于死地，这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矿主或公司之唯利是图，而不注意于矿内的设备或安全。中国的劳工大众是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下，相对的人口过剩的现象在中国比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显著，这使苟且偷安的民族企业家，不愿改进技术以相对地增殖其财富，只会无情地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出他们的利润。按矿业



月	日	遭祸所在地	死伤人数	原因
4	26	安阳马室沟	死十九人	失火
4	—	安阳马室沟	死伤七十余人	失火
5	28	开滦矿井	死百余人，伤五十人	电滚走火
6	17	焦作中福公司	死伤三十人	因火爆炸
6	21	开滦马家沟	死伤数人	煤洞塌毁
7	24	长兴煤矿	已知死五人，余未详	爆炸
8	5	开滦马家沟	死一人，伤十余人	—
9	19	开滦马家沟	伤八人	—
9	—	陕县民生煤矿	死伤七十九人	凿井发水
10	14	安阳新庄村	死伤十一人	出水

而言，购置安全灯在矿主看来是不屑为的，因为炸死一些矿工，与他们无甚影响。现实的利害关系限制着他们，他们只愿在极落后的极野蛮的形式之下来进行煤矿的采掘。浙江长兴县的矿区，其经营方式在中国还算比较完备的，我们就从那儿调查所得的材料作为例证吧：

“矿区工人大部分是河南省的农民，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井上作工的和井下作工的，生活最苦的是煤井下面的工人了。他们的生命在在可以毁灭；煤气、井水、坍塌等等灾害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每一次上工，要在井中住上8个小时，8小时内，一些



饭食都不能进口。黑黝黝的地狱里，只有一盏暗淡的电石灯，才是他们唯一的侣伴。他们每次拖着沉重的脚步，成群结队地走向井口的电梯，十几个人一次的就给那个怪物吞下肚里去，及至出来的时候，只见到三四人一次的在洞口伸出头来了！各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沉沉的死气，一点血色也没有，浑身黑黑的，活象书本上见到的黑夜叉。”（1934年2月6日《杭州民国日报》）

前述“在在可以毁灭的生命”一旦毁灭掉以后，又怎样呢？前引报纸又这样告诉我们：

“有些工人为了要多得一些工资，每每做了上午六点钟至下午二点钟的工以后，晚上的十一时又在做着第二次工了，但是他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往往要害病。如果是死在矿外的工人，谁也不会有一点怜恤；万一在矿内给煤气、井水等等灾患害死了，工人的家属可向办事处领取180元的恤金，这就是一条命的定价。”

象河南焦作矿区方面，一条命还只能卖100元。那儿矿工们之间有一个流行的歌曲，就是用来刻画这一事实的：

“成神不成神，一两天登云；

下去一百块，上来千三文。”

这就是说，矿工们下井的时候，就要有去死的决心，预备他们的家属去领100元恤金；万一井水、煤气没有把



他们葬送，上来也只能得到1,300文（每元一般合3,000文）的微薄工资。当矿工们唉声叹气地哼着“下去一百块，上来千三文”的时候，其情景是多么凄惨呀！

因为矿方并不致力于矿内的安全设备，并不积极设法来控制防范煤气、井水、爆炸等等意外的袭击，使矿工们在在有“丧命的权利”，因而一般矿工无可奈何地只能乞助于神鬼迷信了。在山东博山矿区内，因其“坑道简陋狭隘，阴湿黑暗，吾人入之，不分南北，森森然真与地狱无殊。”一般矿工迷信崇拜井下的老鼠，无敢伤害，且饲以粮食；“据谓坑下出水，鼠能先知，矿工每见鼠沿绳而上，是即水之将至，因知所逃避，尊之者盖亦有由来也”

（见1934年7月26日《大公报》，载《山东旅行》第九信——博山矿业概况）。目下谈“保障劳工”的圣人哲士很多很多，然而象博山的矿工，他们实际上除了得到老鼠的一点保障以外，什么也不曾得到。但是迷信是不可靠的，井水、煤气等等横祸一旦袭来以后，工人底哀号跪拜当然救不了他们。譬如山东淄川的矿工，因平日最怕水灌矿中，全遭灭顶，所以相互斟酒的时候，“满了”反说“干了”，以冀祸患之消除。但是最近他们却遭灭顶了，他们淹毙在矿中凡八百余人！

其实，他们就算侥幸而不遭横祸，现实的生活也是万分苦痛难受，我们且不说那地下的八小时或十二小时是如何难以消磨，单就工资的微薄而言，也就可以想见一斑了。近年来的经济恐慌使矿主力图祸患转嫁。譬如开滦煤矿



公司去年5月厉行紧缩，将矿工工资减低25—30%；淄川矿工的工资过去是每日两三元，现在低至五六毛或八九毛；博山方面的情形也一样；河南的焦作和安阳亦无二致。据说博山有一个名叫上河滩的市镇，除集日外，很少行人经过。因为有许多矿工，眼见到工资的收入有限，而生活的压迫以及旧债的追索却一日严重一日，所以都在那儿的树林之中吊死，以致一般人都迷信怕吊死鬼出现，不愿轻易前往。与这同样，开滦矿务局西墙外，一片无际的旷野，除掉有一些稀疏的刺槐外，就全是死去的矿工们底垒垒的青冢，它们十分显著地反映出那儿的矿工们底凄惨命运。在浙江长兴，更有这样一个显明的对照，揭示出矿工们的生活是如何地不合理：

“煤矿办事处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占地很广，里面有会客室、办公室、食堂、职工宿舍、俱乐部、花园等公共处所，内以职员宿舍和俱乐部的设备为最讲究。宿舍和一些大学校的宿舍相仿，一间间的有砖墙隔开，有电灯，有浴室，职员可以带着家属同住。俱乐部是十字形的建筑，里边有台球、弹子、无线电、桌上高尔夫、乐器等等娱乐设备。金黄色的地板，雪样白的墙壁，完全是一个小型的跳舞厅，置身其间，几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办事处的四周，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工人的住屋。那些住屋，一律用几根竹梢及稻草架成，都为着年久失修的缘故，倾斜的程度实在有些骇人；有一些连稻



草也没有了。竹条编成的墙壁穿了许多孔，根本失去了抵御风雨的作用。每间屋子最大的面积不过二十尺见方，一扇矮矮的竹门，进去的时候要低下头来才能过去。有的在里边点缀着几件简陋的木器，有的连卧具都铺在地上。为着不通空气、少见日光的缘故，打从每间屋子门口经过的时候，就可嗅到泥土和污物混合的臭气。但是，工人及其家属是在这里边起居饮食着的！”（见前引《杭州民国日报》）

矿工底汗水变成乌黑的煤，变成在矿主手中闪耀着的金和银，变成浴室，变成高尔夫球，变成跳舞厅，供矿主和高等职员消受享乐，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恶臭的茅屋里！不，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被炸死或者溺毙在千万丈深的矿井之下，就连他们底妻室要捞寻他们底尸骨也万分困难。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底生活就是这样!!!

本文作于1935年5月19日



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结束之后*

一、纠纷的经过

说来都是为了改善人力车夫的牛马生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人力车业公会之间，曾掀起了种种争辩、暗斗，甚至准备直接冲突。这次相延六月之久的（自本年（1934年）2月底至8月初）人力车纠纷，其经过的大概情形是这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去年7月开始，并于9月完成人力车委员会的组织，该会委员共四人，主脑为西人麦西（P. W. Massey），该会职权和使命，是“将公共租界内通行之人力车所有一切方面情形，调查报告，并提出改良革新现时通行人力车制度之各项建议。”（见该会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为了完成这种任务，该会除掉作个别口头的和多方书面的调查外，还专派调查员3人，实地考察租界内55名人力车夫的生活境况，结果使我

* 本文在当年《新生》周刊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内。



们也可看到一束具有相当价值的报告书，可说是这次纠纷的唯一成果了。该“报告书”是今年2月7日提交工部局董事会，其中有“建议之摘要”十六条，与这次纠纷特别相关的是如下四条：

1. 招致愿遵守上述规则（主要者即为减低车租，改良车辆，车主车夫登记）之一团体，向工部呈请发给人力车执照2,000张。自1935年1月1日起，此项执照系自现有之领照人中，除去不及5张执照者外，以其持有之数目为比例，收回转给。领有执照之人力车，将来倘有任何移转情事，必须经过工部局核准并登记。（原“报告书”第一条）

2. 近为委员会而编辑之“真实照主登记册”，应尽量从速实行。（原“报告书”第五条）

3. 公用人力车夫所付之最高租价，为24小时小洋八角，不及24小时者，照比例推算……（原“报告书”第八条）

4. 公用人力车之式样，应一俟事可办到，即加改良。（原“报告书”第十条）

这个“报告书”——尤其是这些建议，一经工部局公布后，车商就接二连三地开会，送发谈话宣言，抨击“报告书”之不当，反对收照减租，登记换车；承放人（即大小头目）也急迫地参加着。纠纷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改良革新”的初衷，工部局也着警备、交通两处联席会议（3月20日），审查报告书并商讨对策，结果



采纳该联席会所提方案，设立人力车管理委员会。该会除专门研究报告书外，且有执行之权，主持者也是麦西。到了7月初旬，该会竟公布实施的新章，决定自7月14日起，至21日止的一周间，为真实车主的登记时期，并于8月1日起，实行将车租减为小洋十角。新章的精神依然是续着报告书，这样，所谓纠纷就由温室里移到油锅上来了！

登记时间虽因车商请求延至8月底截止，但是纠纷并没有因延期而解决。车主届时只愿按照旧章至车务处验车换照，而局方却非先领得表示接受新章的证书不可。这当然因为斡旋的中国人还未讲好妥协的条件，所以当时局方宣告准备另招新车主，车商则扬言不负交通断绝的责任，实在都是一种战术。嗣后经过五六日的奔波，条件谈好了，于是由工部局总办钟恩召集对席会议，纠纷就迎刃而解！当时所通过的改良革新的办法，共有七项，而富有“意义”的是下列三项：

1. 车租减为七角八分大洋，外缴互助费大洋七分，而车主每月则仅整解互助费一元五角；
2. 互助费保管，车主亦得参加；
3. 车商投资领照制车营业，得有相当继续之保障。

这样，车主也踊跃地接受登记了，而他们现在所遵守的“新章”也是一种新“新章”了！

纠纷本已完结，不料在麦西否认他消极的当儿，又添了一阵“放气”风潮：“车夫代表”在工部局前请愿，流氓光棍在马路上旋卸车上的螺丝，结果被捕者成群，谣言



四起。这算是这一场纠纷的余波。

二、车租与车照

现在我们要问：前述这场光怪陆离的“戏剧”到底表现一些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应先说明车夫所负担的巨额车租，以及车主对于车照的占有情形。因为减低车租，是这次纠纷的主要战术，而瓜分车照，则是这次纠纷的真实核心。

在前节所说具有相当价值的报告书内，其甲项附件中，曾载有可作全体代表的55名车夫所负担的车租，以及每日每月净收入的具体数字，今实录于下：

车夫之最高最低及平均收入数目表（单位元）

	最低	最高	平均
拉车每月所得收入……………	5.10	28.11	17.11
所付车租后之每月净收入……	3.41	17.50	10.46
拉车每日所得之总收入……………	0.47	1.77	1.12
所付车租后之每日净收入……	0.33	1.16	0.75
车租占总数率……………	29%	65%	47.5%

作牛马式之奔行的人力车夫，每月劳苦所得的几乎一半是以车租的名义滚到车主头目的荷包里去！这种残酷的剥削方法，其结果之一必然是饥寒交迫着车夫和车夫的家族。“报告书”说：调查开始时，曾询人力车夫之财政情形，55人中之45人承认负债，并无一人将款项借与其同



业。在调查一个月内，非特并无进步，并且除13家外，余均负债更多，其状况详见下表：

拉车所入超过家用数目者	1人
家用数目超过拉车所入者	54人
家用总收入超过家用数目者	13人
家用数目超过家庭总收入者	42人

这表说明：就是车夫的妻子儿女也一同担负洗衣帮人等项苦工，他们一家还是解脱不了饥寒交迫，结果还是做印子钱、皮球钱或是死神的俘虏！这样的事实是如何地真切确凿，我们只要想起车主自己也不得不说车租“诚有酌减之必要”（参看3月21日《大美晚报》），就可完全明白了！同时车主们于本年三月间，为了对抗工部局的“减租”呼声，高唱“新村计划”，这本身固然是一种虚伪的骗术，但对于车夫生活的凄惨情境，也作了忠实的招供与反映。

但是驱车夫于绝境的47.5%的巨额车租，却养肥了不劳而获的车主和头目。报告书曾引进一位过去车主的报告，其中一节即以具体数字说明这点：

华界与公共租界之人力车比较表（单位元）

	公共租界	南市	闸北
成本与经常维持费.....	84	84	84
执照捐费.....	5	3	1
每日所收车租.....	14角小洋	5.5角小洋	4.5角小洋
每月所收车租.....	420	165	135



约合大洋·····	33	13	10.5
除去费用之净得·····	24	6	5.5
车主包放净得·····	14	2	2

这位车主的这一报告，多少有点疏漏之处，车业公会在今年三月初给与工部局的呈文中，曾提出几点怀疑：第一是租界中的人力车成本及其每月维持费应较高于华界，第二是每月因验车修理等关系，一车并不能全月出租，每月车租应少于33元。但是一加一减之间，所发生的差异至多不过五六元；所以，无论如何，不会象6月24日特区办事处对新新社会记者所说那样，车主“每月余利不满三元”，换言之，即每月净利决不会二厘或三厘的。一般说来，除大小头目的承放利得外，车主从车租所净得的总有很可观的。

巨额的车租确使车主获取厚利，我们单就车照价格的飞腾上也能得到明白的佐证。车照原是工部局给予车商的营业证，初因收捐便利关系，发生所谓代捐人；后因车利奇厚，车照成了长期独占的对象，且可私相买卖，关于车照的买卖与获利情形，报告书告诉我们说：

“近年来曾有大宗之执照买卖，……或将执照之价格提高，售与他人，或将执照出租若干时期，而仍保留其所有权。执照委员会所得消息，人力车业同业公会所定出租执照之价，为每一执照每月10元，但原有之执照持有人，每一执照只向上海市政机关共纳税5元1角8分，故其每月所得每一执照之利为4元8角3分……委员会所得证据又经



证明，近数年来之人力车执照之价，已经增涨。1927年至1928年之某某数起出卖契约，曾经查验，知当时所付之价为200元及300元，但近时之价已达750元。”

车照价格所以这样飞涨，就是因为47.5%的车租保证了车主可以获取厚利。报告书说得好：“人力车业若非经证明为极端有利可图，则垄断价值显然无从发生。”真的，事实已使车主们没有强辩的余地了！

三、纠纷的真因

现在我们很容易指出纠纷的真因与过程是这样：大部分都是由破产农民转化来的人力车夫，他们一无所有，不拉车就没有饭吃，这点保证了车主可以任意榨取巨额的车租，同时，车主一经向工部局领得车照后，就可长期独占，自由转卖，这又保证了车主垄断厚利的机会（参看“报告书”执照之买卖）。前者使工部局及一部分洋化华人眼热，后者则使他们可乘机发不满之言。你看“报告书”说：

“无论何人，得有人力车若干辆之执照者，每以为可永久保留该照。此种情形，委员会认为系完全错误，因此委员会郑重声明，执照为工部局之所有物，仅在准予给照之时期内，借与领照人。

委员会以为领照人利用工部局之所有物，不正当而从事于‘垄断’，极不合理，无论如何，必须制止……”



所以人力车委员会所提建议之一、二两项，即首先规定于1935年元旦和1936年元旦，各收回执照2,000张，以后则“由工部局按照所得经验斟酌办理”。在洋人麦西后面，实有不少“拜金”的华人，他们很想包揽这些收回来的执照呀！7月30日的《大美晚报》，有一节是直接说明这点的：

“据人力车商发言人谈……现有某西人，现在从事组织一新会，故人力车商方面，颇感不安，盖在人力车“报告书”未发表前，该西人之公司已组织就绪矣；因此彼等乃受其排挤。此外，人力车务委员会不顾人力车间之提议，而运行施用所谓新式标准车辆。该车式样，亦系由该西人所计划者。该西人之办公处，现设在某银行之楼上，并已向各华人招收新股，每股洋200元，代表车子一辆云。”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工部局要车主登记，是为收回执照打算；改换车辆，主要乃为刁难车主，以便另招新主；至于提议设立互济会，并力主减低车租，则在骗取车夫大众的同情以为另招新主的临时烟幕。工部局及其豢养的华人——期望中的未来车主，实与现有车主一样铜臭，他们将一样凶残地榨取车夫的汗水！

除掉这种十足铜臭的动因之外，工部局设立人力车委员会多少也有点改良市政，加强帝国主义统治的意欲。譬如废除大小包头制，强令车夫直接登记等建议，就是朝向这一目标。



关于工部局这次并不是真正为车夫谋幸福，其目的乃别有所在，8月1日《大晚报》的社评中，曾有一种侧面的抨击：

“新章规定每班车带征该项经费（即互济会经费）小洋半角，（其他处作一角，此处为误）。……专用在车夫福利所需，决不挪作别用。然车夫福利所需，不能在车租中以及车夫生活起居所负担的一切租税项下筹拨，而必需另加征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剥削……为了外国大人先生们欢喜跑马，租界当局不惜在界内最高价的地段辟上这样一块空地做跑马场……可是我们并没有听见租界当局曾经向这些特殊享受者征收过什么跑马捐啊！……”

此外，一部分外侨，也指责工部局应减低对人力车之课税，才能符合反对车商的步调。因为本年度公用人力车税收预算为24万元，远在电车公共汽车之上，实在太重。然而减低人力车税却非工部局所愿高调了！工部局与车业公会在维护各自利益一点上，实是半斤八两。

车主也与人力车委员会一样，在暴露对方的矛盾和欺诈的方面，也是十分雄健。他们非常真实地公布一、二西人及不肖华人为发财观念所衡动借救济车夫和改良车务之美名，攫取每月千余金之月薪（见7月25日《申报》所载车业公会之宣言），并详论征收互助费之欺诈（参看6月19日《申报》）。但是说到车租，他们就只好隐讳、歪曲和抵赖了！在山穷水尽、无可辩解的窘迫之中，关于减租一点，惟有说出这样没理由的反对理由来；



“但救济车夫不尽在车租之多减，而确在增进其智能。查车夫每拉得车资后，必为挥霍罄尽而后已……充其量，即不取车租，终无积蓄之可能。”（3月21日《大美晚报》）

我们真不知道这“可能”是从何“可”起！而且就算退万万步讲，车夫不知积蓄，那么他们拚命拉的车资，就不应自己享乐，而必需贡奉给你们坐汽车、玩姨太太吗？

不用说，这当然是他们的脑筋所能构成的最蠢最蠢的理由，谁都知道他们反对车务委员会的报告书，反对减低车租，收回执照等等建议，无非是要想保证人力车夫的汗血能继续为他们所吮吸！独占人力车二千余辆的飞星公司老板、车业公会主席委员顾懋松，在本年三月间所领导串演的话剧——建立车夫新村，办理慈善医院等等“伟大”工作，原与工部局高唱减低车租，设立车夫互济会一样，是想蒙蔽大众的视听，但是也一样可笑无效。

四、结语：人力车夫解放之路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了谷物条例废止与否的利害观点不同，曾掀起一极大斗争，其情境与前述的人力车纠纷不无类似之处。他们相互间在当时也都需要相当暴露对方的罪行，而且也都需要设法骗取劳动大众跟他们走。不过这两种运动或纠纷，除意义大小不同外其，配角（劳动者与人力车夫）所起作用也大



相径庭。英国劳动者在当时已经有相当的独自存在，他们扩大了并加深了大宪章运动，揭开自身解放的序幕；至于在这次的人力车纠纷过程中，四万余的人力车夫，还没有发出独自的呼声。他们多少为工部局的减租口号所迷惑，他们被笑里藏刀的新敌人利用。他们缺乏彻底的全般的认识，把握时机，加深运动，更谈不到自己的健全的独立的组织。因此，在半年来的纠纷结束以后，他们还是深深地陷在人间地狱之中，还是为着车主头目所强求的巨额车租在马路上作牛马式的奔行！

自觉与组织，是被压迫阶级斗争求解放的两大杠杆，然而在这次纠纷过程中的人力车夫却缺少这两大武器，以致串成纠纷中的一幕怪剧，就是车委会与车主双方都雇用了一批无耻流氓，冒充车夫代表，将车夫本身的口舌湮没。我们且举两个实例吧：

第一，是关于减低车租的，例如3月25日《时事新报》所载，陈国栋等所发表的反对减低车租的理由：

“规定每日车租小洋八角，承放人毫无利益，将来将无承放人，人力车夫势必无处存身聚集之地。”

这不象为重租所苦的车夫所吐出的声音，而是承放人自己所高喊的语调，这一看下列承放人公函的对照，便知分晓：

“……近闻该报告书由钧局警务车务各处会议考虑，先将车租提前讨论，业已接受小洋八角之议，惟尚未确定耳。代表等于此不胜骇异，窃有所顾虑焉：甲，人力车领



放制度，历有年矣，倘减租过甚，则承放人之地位，势必因之取消，……乙，车夫与承放人，休戚痛痒相关，至为密切。设承放人制度忽焉终止，不独数千人之生计发生危险，即车夫亦必有难言之苦……”（3月14日《时事新报》载承放人呈工部局函）

第二，是8月8、9两日的车夫代表请愿团：“车夫工会委员”陈国栋，因小菜摊贩，由郑发珠、罗致，冒充车夫代表请愿，特备函向工部局声明，函内提出证明的理由如下：

“……车夫登记一项……，一旦登记，将增多六万余人之失业，此则似非救济车夫应有之举。今该自称代表者，竟要求登记……其非代表可知……”（8月11日《申报》）

“陈委员”的这一抨击不无理由；但是承放人向以盘剥车夫为生，今“陈委员”竟谓承放人不可废，其非代表亦可知矣！关于“陈委员”的为人，6月25日工部局车务处所收到的一个呈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陈国栋为显著的人力车夫的煽动者，与车业同业会很接近，据查得同业公会每年支持他1,000元……”

署名这一报告的据说是六百余名车夫；但是无疑的，实际干这工作的，一定是那些受“新车主支持”和冒充车夫代表的恶棍。

其他如8、9两日轰动一时的“放气”骚扰，主要也是失意的新车主指使他们的爪牙，对于旧车主的一种泄怒



行为，我们不难从这次的审结中推见其大概（请参看8月23日《大美晚报》）。总之，车夫本身是沉默着，或者观望着，或者被无耻流氓愚弄着；他们没有扮演着他们应该表现的独立脚色！

不过所有这些缺陷，当然都是一时的现象，不是没有被克服的明天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一是他们的暂时的落后性，他们所受的封建羁绊（如大小头目或帮会组织）特别浓重，甚至还带有“温存的”家长式的拢络；第二是他们的职业的流动性和涣散性，维持着或竟加强着他们之间的分离倾向。概括言之，是因为他们不象城市工人而象乡村中的零工。在这种种情态没有克服之前，他们是解脱不了自身的痛苦的！关心人力车夫解放问题的人们，首先应注意的就是这一点。舍此而论其他，不是欺人之谈，便是不着边际。譬如3月6日《新闻报》社论中所建议的办法——车夫本身合资购办车辆，以及3月29日《大晚报》社评中所供献的对策——人力车归市经营，就是深有此病。当然，克服以上缺陷，对于现有的车夫而言，固然是一种难以速成的工作；不过这是真算解放的始点，他们终将拨动这历史的机轮，来探求他们的唯一出路。

本文作于1934年8月17日



水旱灾的“交响曲”*

——中国水利经济的解体

你假使能够同时装两个听筒，一个接到永定河上或者汉水流域，一个接到苏、浙或者皖、赣的田野之间，那末你一定可以听到一种离奇的复合的歌曲：一面是汹涌的洪流冲毁堤岸和农庄的滔滔之声，而另外一面则是火样的烈日逼得稻田龟裂作响。当然，这不是赞扬美女情人的欢心曲；相反地在这错杂的音调中，却有成千成万的农夫农妇，还有他们病老的父母和稚弱的儿女，凄惨地哀呼，绝叫，啼哭，饥饿，死亡……

真的，整个的中国差不多已经陷在水旱灾的交迫之中。作为永定河之源的山西和察哈尔的一小部分：滦河，南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所经过的冀北全部；陕南与鄂西的汉水流域以及湘水附近的衡潭等十县；广东的东西北三江及

* 本文在1934年《中华日报》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内。



其发源地带；以及赣闽江的一小部分——所有这些地方的人民是在洪水泛滥“惠顾”之下。黄河的大汛已经惊扰了两岸的居民，潼关对岸的平民县以及河南的黑岗口，且被洪水冲刷，大有陆沉之虞。这是中国最近的水灾之地理上的分布。至于蒙受旱灾的区域则更广大，苏、浙、皖、赣、闽可说是全部或大部，冀、鲁、豫、鄂、陕、湘各省除水灾区域外，什九皆以烈日为苦。一言以蔽之，水旱灾笼罩了全中国，使在列强的封建的各种剥削关系之下，更添了对农民之自然力的迫害。

但是对于这种自然力的迫害，人们往往采取非社会的解析，这是绝对错误的！水旱灾的同时并作，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幅员广大，我们不难从下列的记载中看出：

“清江系赣省产米区域之一县……今年国历6月中旬，山洪暴发，一片汪洋。水退后，继以时雨，致池沼湖泽，储水饱满。县属东西南三乡农夫，莫不喜形于色，庆为年丰朕兆，意谓即从此半月不雨，亦不愁无水可戽也。惟北乡地素低洼，向有水乡之号，当水涨时，早稻概被淹没。环乡私筑圩堤，数以十计，其被水冲倒者，至今犹半成泽国……至东西南三乡，则因近来天久不雨，储水用罄，无水可车，有坐以待毙之势……”

（1934年7月20日《申报》）

在一县之中就有水旱灾的两种祸害，这完全因为平日对于水的调节太不注意。申而言之，鄂南的蒲圻、咸宁等县苦旱，鄂西的襄阳、潜江等地苦涝，以及长沙以南各县闹



水患的时候，岳阳却在祈神祷雨等等，也完全是同一因果。现时，人们往往将水灾归咎于山洪，旱荒则诿罪于骄阳。其实，中国的农村经济所以任凭天时作弄，每逢久雨或久旱，农民只得跪拜呼救者，都是因为现实的种种剥削，使他们丧失了与自然斗争的能力。我们固然没有方法使气象改变，但是我们可以用植树治河引渠等等方法来缓和或消除久雨或久旱所给予我们的威胁。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却在前述的各种关系之下断送了；因而水旱灾就普遍全中国，甚而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之内也同时表现出来！

河水的泛滥，什九皆与河源的山洪有关，而造林事业与疏浚工程的疏失，则为其根本原因，这不难从各地的水灾之中看出。譬如：

“西江潦水，发源自桂省。上月桂省抚河大河水患，梧州一夜水高三四丈，因此粤省西江同时潦水大涨。上游如德庆都城、连江口等，均成泽国……”

（1934年7月12日《申报》）

“6月下旬，鄂北襄樊均郢等县，大雨不绝，陕南雨量亦多。雨水集中，襄江陡涨，竟超过二十年最高水位，因之形势突趋严重，除潜江……最先受灾外，沔阳、汉川、汉阳沿河堤岸，被水冲激，亦危险万分……”（同上）

“冀北一带，连日大雨，白河、潮河、箭杆河，因上游山洪暴发，均陡涨……下游北运河两岸低洼处，多被淹没，稼禾损伤极重……”（1934年7月11日



《申报》)

其他如永定河、北运河以及赣江的溃决，其过程也大体一样。

说到旱荒，其近因固在久晴不雨，但是假使早有防旱救旱的设施，旱荒至少不会象目前这样深入可怕。诚如7月20日《上海民报》的社评所说那样，直到旱灾进入生死关头才来采购辟水机，足见平日防旱设备之一无所有。此外，如7月14日的《申报》也有一段地方记事，充分指明水的调节之不完善如何影响到旱灾的延续：

“武邑天旱不雨，灾象已成，县府特组织防灾委员会，筹谋救济办法，经议决请求省府准予开放东坝，以济眉急……省方对于开放东坝事件，自经宜兴县请求后，即派员前往东坝察看，结果因东坝水位较往年低一尺，若开大坝，则大水泛滥，危险堪虞，将来再行堵筑，需费二三百万，如此巨款何从筹集；若开小坝，则仅溧阳一县受益，他县不得分润，是故东坝以不开为宜。”

东坝既不能开，该县则继续想出这样的救济办法：“一，将江河之水汲入内河；二，将内河之水汲入支流；三，将支流之水汲入农田灌溉”。这种三湾九转的汲水办法，苏、浙两省已有不少县份在纷纷主张。因为“江浙地势卑下，河流密。”从这里，我们不难见到：这种引水工程（目前各县能否如实进行，暂置勿论），假使平日已经设置完备，那末天灾之为害江浙，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严



重。

水利的维护与改进，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赋有决定的意义。因为米谷是我们主要的农产品与食料，而“水的不足对于米比较总合其他一切灾害，给予更大的损害。但是，和水的不足一起或在他之后，水的过多使米受到的损害也甚于一切。”（见中译《马扎亚尔中国经济研究》第54页。）同时中国内部虽然江河纵横，但主要如黄河、淮河以及冀北的滦河、海河等等，皆需筑堤防泛，辟渠道水，才能有利于两岸的耕作。现在因为历年的政治问题，重重的经济剥削，以及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之因循从事甚至弊端丛生，中国的水利经济更迅速地崩溃了，于是近一月来的水旱灾便显著地展开在我们底眼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水旱灾夹攻下的中国农民是如何地破家荡产，和如何地挣扎死亡！

“恩平县（在粤西江之南）于上月24、25等日，突告水灾，水涨二丈有奇。居民向无防水设备，故一旦潦至，交通梗塞，各户绝粮，哭声震天，塌屋三十余间……县属圣堂、均堂、船角等乡，尽成泽国……”（1934年7月11日《申报》）

“海州属赣榆县青口城，突于30日破晓，因连朝暴雨，山洪暴发……居民房屋被水冲塌数百间，器具随波漂去。居民于梦中惊觉，逃避不及，随水流去，还发现男女尸身22具……在城垣眺望，但见遍野中一片汪洋，田禾尽没，水光接天，巨浪横流……”



(1934年7月7日《东南日报》)

这是说水灾下的农民如何遭难的大概情形，他们（幸而未死的）底归宿只有进难民收容所的一条路，或者还要活活地饿死。此外，还有那些因为河水行将决堤为患，临时拚命抢险的乡民，也有一种难逃的恶运：

“距省十里赣江西岸乐圩溃决十余丈，水势涌入，如万马奔腾。抢险船一艘被冲覆，溺毙十余人，圩内田禾悉化乌有。”（1934年6月26日《申报》）

途来黄河告急，当局只有临时抱佛脚地命令抢险，那群抢险的乡民当然也有“溺毙”的危险；可是他们为了生活，为了租和税，更为了那强制的命令，又焉能不“慷慨就义”呢？

旱灾下的农民处境也同样凄惨，

“各处乡民，近以旱灾将成，莫不忧形于色；一般迷信者更倡导扎草龙求雨……但迄今数日，仍未见效。乡民仰首望天，惟有涕泪纵横而已！”（1934年7月4日《中华日报》）

“海丰县地方，自入春以来，因无雨降，天患旱魃……田禾均晒枯毙，旱季已成绝望，……一般劳苦农人，日只食一餐，面有菜色。农民莫不呼天抢地，状极可怜……”（1934年7月3日香港《工商日报》）

“浙东各县，近山田稻已大部枯死，无可挽救……如再数日不雨，全省禾秧惟有什九待死。据报新昌县西塩村有某农夫妇，以天旱收成绝望，竟在田头



同时自尽云。”（1934年7月10日《申报》）

除了这类坐以待毙的惨状之外，我们又可见到纯良的农民，如何为了庠取点滴之水而互相殴打，甚至流血伤命；以及饥馁如何逼迫着他们愤激不安，致遭非命等等情节。我们且引一些记载，以供参考：

“崇德县乡民，因祷雨心切，特抬偶像进城求雨，并将龙王偶像抬在县府内，俾乡民至县求雨。18日有农民千余，欲县长亲自拜揖；迨县长出外，有人大声喊打。县长无奈，逃入上房，乡民又蜂拥而入，顿时秩序大乱，警士阻止无效，遂用枪开放，击毙两农民，伤多人；乡民闻枪逃避时，又踏伤多人。”

（1934年7月21日《申报》）

“嘉兴因旱灾已成……20日又有五区东北、东南、官滩、保福各乡民千余人……均手持枯干稻苗，沿铁路步行至县，请求救济，要求免租赋，散仓谷，请姜县长赴乡复勘灾况。经姜县长出见，劝慰各乡民归去……尚有小部分乡民，因饥饿迫急，拥至二堂，要求县长准给午膳，被在场弹压之警察队及县基干队等阻止前进，致将二堂（现为大礼堂）之案桌及左旁之木板等，均被农人捣毁……”（同上）

此外，象浙江长安镇最近竟因天旱米贵，已直接发生抢米风潮。无疑地，这类行动必将随着灾荒的深入而日益扩大；同时，中国农村因为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对立关系，原在极度的动荡之中，灾荒必更加强这种不安的趋势。所以



政府当局为了社会的安定，对于当前的旱灾和水灾，自不能不谈救济。因此，各地政府当局对于水旱灾都在想各种临时的防救措施，譬如发款抢险以及筹谋购置戽水机等等；不过这种临时救济，其效果是很有限的。譬如购置戽水机，第一，实际行施的，在目前只有毗连京、沪、杭路的几个县；第二，因为平时大无准备，甚至无机可买，只能用救火机或其他机件来权宜替代；第三，有些地方竟干旱得无水可抽，非经过所谓“自江而河而支流”等等的曲折不可。试问，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戽水机的筹谋购置，对于业已普遍化和深刻化的旱灾，能有什么挽救的力量？所以7月6日杭州《东南日报》的短评中，在肯定浙省临时防灾委员无能有相当成效以后，重又提出这样的怀疑：

“不过政府过去办事，颇有难叫人相信之处。即如造林一项而言，这也可以说是防灾的基本工作。政府年年植树，年年有数目字向人民报告，可是树长成了多少，树长大了多少，却始终只有当局自己明白！……”

因此，深陷在今日水灾旱灾之中的中国农民只有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是闭塞不通的，那就是祈求老天爷的仁慈了！中国的农业经营，因为水利工程的日益瓦解，实在经不起水旱的轻轻一击，那末在现条件之下，还有谁能担保中国农民底明日呢？

本文作于1934年7月22日



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

中国的农民是在两种压迫与剥削之下：内有苛捐杂税、高额地租以及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等等封建式的榨取；外有各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宰割。这样，他们就加速地破产流亡！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史迹，早在前世纪的九十年代就已猛烈地表现；不过到了近三四年来，其姿态就更显著，其程度就进一步深化与普遍化，其成问题就更严重！

在这儿我们务须注意到：随着1929年全面的世界经济总危机的爆发而产生的两大特殊的契机：即帝国主义者为了生产过剩，特别是为了内部的阶级对立之日益尖锐化，不得不扩大他们的倾销战，不得不加紧对于弱小民族的掠夺，以缓和它内部的险恶形势；同时中国内部的封建残余者，在长期不景气的威胁之下，又将他们所遭逢的种种损失与打击转嫁于农民肩上，用种种方法来加重对他们的盘

* 本文在当年的《中华日报》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内。



剥，以苟延残喘。中国的农业恐慌，就是在这些特殊契机的交织之下，带有全面的与莫可挽回的倾向，同时采取着空前尖锐的姿态表现出来。

问题既已这样严重，所以国内各界人士都群起交谋挽救之策。他们因为各有其动因和观点，所取方案也就互有差异。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国内银行界对这问题所实施的对策之一，即一年来，特别是近三四月来纷纷活跃着的农民借贷所。它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它给予农民的实惠有多少？

农民借贷所的设立，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信用合作运动的继续，上自国府，下至县府都同样地加以推行，他们希望稍稍改善农民底境遇，以恢复部分的纳税能力，以缓和紧逼着的财政危机。但是当局底“希望”，建立不起农民借贷所，这尚有待于富有的上海银行家来担起这“重担”。譬如浙江的临安，不但以“农民银行基金，为数较巨，筹募不易”，就是“较易举办之农民借贷所，其基金还要由治虫及建设经费节余项下拨充，不敷之数，再行设法向杭州农工银行商借”。再如浙江的永嘉与镇海，因为与外界银行的资力尚未全部沟通，就需采用“田赋带征”的方法来筹备“复兴农村”的农民银行与农民借贷所。所以年来农民借贷所的实现，其关键全在银行界的愿意投资。

银行界为什么表示愿意投资农民借贷所呢？

银行家与各地当局同样，除掉救济农民与复兴农村的



口头标语以外，都还有各自底实际的动因：当道者希望增加人民的纳税能力，他们则为其游资追求着厚利。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知先觉”地设立农业合作贷款部，并于全国各地设立分部，使在一年以内，“成绩斐然可观”以后，于是上海各银行都纷纷仿效。而且各省各地还接踵地筹立农民银行。从事此种大好经营，其情势很象1921年沪上交易所的纷纷兴起。厚利驱使着他们，这是事实的一面。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金融停滞于城市，特别是窒息于上海这一事实。关于这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既有数字的证明，且有原因的分析，本文可不加赘述。资本最怕休闲，特别是高利贷式的中国银行资本，所以为了本身的利益计，他们必须将畸形地集中于城市的游资，用人为的方法流回农村，恢复其生利的机能。上海银行界领袖张公权氏开发内地的演辞，以及亲自入川考察的行径，就是为了答复“游资底呼吁”。在这儿值得附带指出的，就是上海银行界踊跃加入银行公司，也与这种呼吁直接相关。

4月2日的《时事新报》底这段记载，虽未道破“资金数量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游资必需投入农贷机关以图厚利，则已十足地刻画出来：

“人民以邮政储金局系国家交通机关所办，信用卓著，虽利息有限，而均乐于储蓄，故积年以还，储金数量逐年增加，自局长唐宝书接任以来，认为此项储金，徒以汇押生息，不如用以投资实业，调剂农



业，较为得计。”

农民借贷所所以蓬勃兴起的原因既已证明，我们再进一步来观察它实际所起的机能是怎样，换言之，农民到底得到了多少好处？

在这儿，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能与农民借贷所发生关系的是怎样的农民。因为农民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体，他们有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等的差别。有时人们甚至把地主也算在里面。在时下的中国，他们已构成一座巴比伦的高塔，他们在农村经济中所起的机能是完全不同的。银行家投资农民借贷所是希望本利兼收，所以他们十分留心“农民生活状况，工商业情形与农民关系，农民银行之贷款利息及手续”，尤其特别注意到“平均田亩数量，及贫苦农民家庭负担等等”（见4月2日《时事新报》）。因此，如众所周知的，农民借贷所就必然地成为农民抵押所，没有相当财产作为保证，农民是无从借贷的。这样，贫农——尤其是流为半佃农或纯佃农的贫农，以及一无所有的雇农，对于借贷无异是一种绝缘体。人们说，农民借贷所底设立，是为了救济农民；然而他们却正是农民中最需救济的阶层！

农民贷款，不仅要“具有相当动产抵押品，或其他确实保证”，同时还“须由该村村长，出具保证书，以保证该抵押品之毫无纠葛”，这不仅绥远平市官钱局附设农民借贷所的办法是如此，就是全国其他各处也大致相同。譬如据我们调查所得，浙江于潜的农民借贷所，一方面要将



所内的资金放出生息；一方面又以借户经济情形之不熟悉为忧。于是部分的放款就是通过区乡长之手而再分放出去。从这儿，我们可以见到两点事实：（1）中国银行业的活动不但要借助上层的政治权力（譬如农民借贷所之设立，都是直接由财实纳部和经委会以及各县党政机关发动），而且还需结纳各乡区的豪绅，以资媒介。（2）贫农大众就算有一点米棉之类的积储，但是为了要抵押五六块钱，他们也要被豪绅从中“播弄”，加深他们对豪绅的隶属关系。

现在我们更进而考察借贷所的内容，第一先看利率。

“在乡间金融周转不灵之时，以前借贷款项，利率甚高，甚至有月息三分至四五分者，贷款部成立后，人民得免重利之压迫。”（4月11日西安《西北文化日报》）

“东台大丰境内农民，于需用资金时（多以衣物至典当押借用款——典当中不但利息较大（月息二分），并加存箱等费一成。大丰村合作社之抵押贷款，本行仅取月息九厘，其他手续概免。”（以上均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村贷款报告）

农民借贷所“降低”乡间贷款利率，取息较低于“典当”，使农民免受“四分的重利”之盘剥。所有这些事实，都不失为有“相当根据”的事实，然而所有这些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且是极表面的一小部分。因为，第一；低于四五分的或仅低于典当业的利率，对于贫农或中农



并不是一种福音，特别是在各种农产物都卖不起价钱，凡百事业都很难兴旺的这样不景气的年代。何况他们因为缺乏作为保证的动产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并不能与富农一样地来求助于借贷所。一般说来，农民借贷所的利率总在月息一分五厘左右，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记载。譬如绥远平市官钱局所规定的农村贷款办法，其第八条就是这样说：“本办法之贷款利息，以每百元月息一元五角为限；但该县利率在五分以上时，至多不得超过月息二分”。此外如：

“安庆：建厅设立枞阳仓库……以经营农产物之储押为主要业务，……照市值贷款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不等，依品质之优劣为差别，抵押期限规定六月，月息一分五厘”。（1月6日《上海晨报》）

“嘉兴农民银行鉴于米价日跌，一般农民因急于用款，贱价出售，于农村经济大有关键，……先在王店、新篁两处，设立仓库。王店仓址设在恒锡当址，新篁仓址设在辛昌当址，低利受抵，规定糙米每石抵洋三元，合作社社员月息一分二厘，非社员一分五厘”。（1月31日《新闻报》）

仓库的目的据说亦是救济农民，借贷所底业务又同样是受押农产物，所以我们尽可直接从仓库而推知借贷所。

但是实际上，农民——特别是贫农大众，对于借贷所的贷款所负担的利息，一般说来，决不止月息一分五厘，下列两点，特别值得指出：

（1） 借贷所底放款，什九是抵押放款，对于农民的



抵押品，借贷大多设有栈房，叫农民自己担送上门，存储在那儿，因为不这样就有倒帐的危险。栈房虽然设在公屋或祠堂里，但是栈租却什九征收，或二厘或一厘，或者高至五六厘。这种“栈租”实与当铺底“存箱费”毫没两样，真要分出他们的区别，至多不过名义不同罢了！

(2) 如前所述，为了安全的保障，借贷所往往将一部分的资金，用“批发”的形式，先贷与区公所里的豪绅们，同时他们本身也愿自动地请求贷放。在这种交互协助之下，事实上往往要发生“二房东”那种作用：他们或者将自己的利银负担转嫁到贫农大众肩上，或者从中获取额外利润。总之，农民所负担的利息，没有不另加重的。

至于实施田赋附征以筹集农民银行或农民借贷所的基金的各县，那儿的农民能得到农民借贷所多少实惠，就更成问题了！不过农民中间，确有获利非浅的，那是乡村中的富农者众。他们可以接受农民借贷所的资助较顺利地推进其经营，加速对贫农特别是雇农的剥削。至于贫农大众，以至在风雨飘摇中的中农，则因农民借贷所较普遍的设立以及眼前抵押较易的刺激，以及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对此种农民借贷所の利用，就更快的破落下去。不消说，他们的告借（正确言之，即典当），并非为了他们可怜的再生产，而是偿利，而是纳税！所以，中国的农业恐慌与农民问题，岂能由农民借贷所来解决！

然而农民借贷所对于银行资本家却有莫大的功能。借贷所一方面有党政机关当先锋，乡长区长作眉目；一方面



又有三月或六月满期以后，农民若不持款取赎，就可将其抵押品拍卖补偿，不敷之款，尚可追索补缴等等办法作保证。这样，就使充塞在银行金库帐面的游资有膏血可以吮吸了。

因为半殖民地性窒塞了中国工业的正常发展，中国的银行资本也就带有一种背离生产的特性，以投机性的政治性的公债与地产底买卖为主要业务，这种倾向到最近就更明显。虽然银行界巨子声明银行业年来的经营路向，已从地产公债之买卖转到各地棉麦丝茶等商家之放款，更转到各省各县农民借贷所或者仓库之设立（见5月19日《申报》），但是银行家自己也说，这种转变只是一小部分*，表明它并没有放弃了地产公债之经营。同时，投资商界与借贷所，实际上并非改转易撤，而是继续发展背离生产的特性。这就是说，中国的银行资本要进而篡夺旧有的钱庄与典当的宝座，首当其冲的典当业者毕竟容易看清这点。譬如江苏省典当业于今年4月16日开联席年会的时候，“武进县同业公会提议：上海银行拟设典当之农民抵押借贷所，有碍各当营业，请呈建厅转令停止”。“江阴县同业德昌等五当提议，上海银行分设变相典当，当押衣饰，侵及典当营业，应予取缔”。其他如宝山、无锡的典当业，当时也有同样要求。（详细请参看4月17日《时事新

* 林康侯谈：“本人对于银行业投资内地农村，藉图复兴农村经济，非常赞成，但目前银行界在内地之投资，仅数百万元，此数殊嫌太少”。（6月9日《申报》）



报》。）

农民借贷所是银行业典当化的渔利机关，而不是救济事业，我们从汪叔梅先生这种责难中，也可明白见到：

“顾其（指国内各银行——作者按）所作为，颇多交相模仿，绝少创造作为……譬之一家办理保险，则无一家不相率以为之。甚至贷款农民，提倡国货，……一家优予为之，转瞬间即如群蝇逐腐，争相效颦……”（《中行月刊》8卷，1、2期39页）

本来好的“模仿”，不一定劣于坏的“创造”，尤其是关于作为救济事业的贷款农村的效尤。不过这儿的“贷款农村”是有十足的铜臭气，所以汪先生底“群蝇逐腐”的责难，仍不失为中肯的肺腑之言！

金融资本家在国内银行这样典当化的过程中，不用说，是可以变得肥胖一点，但是被农民借贷所救济的贫苦农民，则依然在苦难之中！



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

一、引 言

在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方面,有两件事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第一是高利贷资本继续加强对劳苦农民的盘剥,这是因为事实本身太普遍太露骨,使那些意想蒙蔽这种盘剥的人们已经无法掩饰;第二是政府当局以及一般银行家最近两三年来,对于信用合作事业的推行。这种事业的推行,是构成他们“复兴农村”、“救济农民”这类运动的重要的一环,据说是为了免除或者减轻贫苦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并使涸渴的农村金融复活起来。它所以在一般人们的观感之中留有相当印象,主要是由于发动者的呼声之过分高涨,因此使一般人们往往不能适如其份地认识它的实际意义,以及这一事态的发展前途。然而这些问题之合理的解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造却是十分必要的。

* 本文在当年的《中国农村》杂志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二集内。



当然，国内已有不少人们注意这些问题，而且也有不少报章杂志登载阐述这些问题的文字，然而真能指示我们从了解事实真相的实在还是很少。有些甚至还带有不少事实的倒相，使我们率直的理解平添种种障碍。在现社会之下，官场机关或者华洋义赈会，或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等机关所提供的关于投资农村、推行信用合作的调查或报告，是不会也不能怎样触及问题的症结。不过现有的材料并不能蒙蔽我们的认识；而且我们也还能从材料的侧面步登事实的堂奥。在本文，我们所采取的探讨程序，是先说明信用合作的兴起原因，而后从量并从质的方面来观察它在农村金融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影响。

二、信用合作社的兴起

在中国，调节（实际上是操纵垄断）农村金融的一向是当地的商人、地主、富农，以及他们所开设的当押。他们显出十分露骨的高利贷的姿态，控制着农村金融的整个体系。1924年华洋义赈总会员以其赈灾余款在河北香河县创办中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同时又于次年成立农利股，专门担任此种合作事业的推行。但是，第一资金甚少，第二推行范围亦仅限于河北一省，所以当时信用合作社对于农村金融的调节作用是很有限制的。1928年江苏农民银行成立，1929年浙江省政府与中国农工银行合作，创设杭州分行。它们对于农村贷款的经营虽较一般银行为注意（比如



截至1930年为止，前者已在江苏完成605个信用合作社），但是信用合作社这种组织在中国农村金融中起着比较显著的作用，那还在1932年以后。1931年华洋义赈总会受南京政府之委托，前来皖赣湘三省组织赈灾式的互助社与合作社，去年（1933）3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添设农村贷款部，同年4月四省农民银行成立于汉口，这些可以作为信用合作社在中国农村金融中渐渐起着较强作用的指标。下表所列九省是合作事业比较发展的区域，合计合作社数（信用合作占其中70%以上）1933年比1932年激增4,181社，同时有合作社之县份也增加119县，就是证明这一事实。

最近二年来主要九省合作社统计表

省 别	合 作 社 数		有合作社县数	
	1932年	1933年	1932年	1933年
江 苏	1,609	1,897	50	54
浙 江	686	882	32	39
安 徽	16	1,742	5	24
山 东	114	255	24	47
湖 南	8	31	3	7
湖 北	3	117	2	14
江 西	12	335	5	21
河 北	285	1,605	37	61
合 计	2,733	6,864	158	267

注：摘自1934年《申报年鉴》合作事业篇

合作社——特别是信用合作社这样崛起，一半是由于政府当局提倡，一半是由于上海银行家的资助。然而他



们对于合作事业为什么到最近一二年来才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可以从同一时期的中国财政和金融两方面所发生的种种事态之中来探求解答。据说今年4月初浙江财政厅长王澄莹在纪念周上报告浙江财政的山穷水尽，并征求开发财源的良法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在从前只要加税加捐，省库还能随之增多。但是现在却不行了！无论怎样增名设目，捐税总是收不起，因为乡下老百姓已变成赤贫如洗。”真的，在浙江各县常有不能还粮的农民拘押在牢房里，他们甚至情愿坐牢，因为在外边就是终年勤劳，还是难图一饱。浙江如此，江苏如此，其他各省更不用讲。这里给我们以问题的答案之最重要的提示。政府当局说，推行信用合作社是为了调剂农村金融，使农民一方面可以避免高利贷的剥削，一方面还可购置农具种子，改进并扩大农耕。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恢复农民的纳税能力，以挽救当前的财政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内政治的不安以及农村社会的动荡，也是政府当局着力倡导信用合作社的重要契机。如短短一年之间，安徽增加一千七百多个合作社，江西增加三百多个合作社，湖北增加一百多个合作社，绝对不能说与阻遏所谓“赤祸”的蔓延无关。再如豫皖鄂赣四省农民银行的设立，也决不是偶然的凑合。

至于上海银行家独立地或者附随地投资农村，办理信用合作社的动因，大体上亦与政府方面相同。同时，我们还得从年来金融动态之内部来理解银行家投资农村的意义。年来资金大量地窒塞于城市，同时银行家又疯狂似地利用



这些游资，作公债、标金、外国股票等等投机买卖之竞赛，这使他们的另一重人格不得不颤栗起来。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上海约翰大学演讲“内地与上海”，力言投资农村之必要，就是因为想起游资充斥与公债繁荣都是畸形的、虚伪的，而中国农业危机之再度深化却是真实的，对于金融总危机的爆发具有莫可抗御的决定力量。肥利因为银行家之大欲，但是更要紧的还是自身存在之维护与巩固。

总结起来，信用合作社忽然蓬勃于最近一二年内，主要是由于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两重威胁，以及由这些威胁所产生出来的政府当局和银行家的切身的“自卫”要求。说得更大或更周密一些，则与延续四五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这一危机所给予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打击自有因果联系。

三、信用合作社的量的考察

现在我们要继续探讨：这样兴起的信用合作社在中国农村金融中起了多大作用。

如前所说，政府财政已陷穷境，现以自行投付巨款推行信用合作事业，无疑地是绝对难能的。政府非靠有钱的银行家不可。银行家手头固然有大量的窒塞游资，但是他们也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内战，怕匪乱，怕农民无力偿付本息。所以投资农村的事实，是远落在投资农村的呼声之



后。比如此种呼声的主要先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今年1月至7月中农村贷款部的贷款总额，一共不过754,741元（见8月25日《时事新报》所载该行总经理陈光甫之谈话）。同时银行家林康侯也说年来银行界对内地农村的贷款，一共不过五六百万元甚至一千多万元。有人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实是中肯之言。

记得7月4日国府公布施行储蓄银行法的时候，因为该法第八条规定储蓄银行或银行之办储蓄者，应以其存款额至少五分之一作为农村贷款，于是曾有许多近视者流，以为从此以后，农村合作事业可以大大发展。其实，不说别的，单就该法事前遭到银行家的反对，后来遂将草案中的四分之一改为五分之一，并包括有价证券及不动产的押放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明白该法终于只是一纸具文，一定不会促进银行家贷款农村，而当前的事实告诉我们的，亦正如此。

前面所引用的合作社统计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江苏等九省，在一年之间增加了四千多个合作社。就数字本身而言，固能说明信用合作社年来已有相当发展，但它并没有指出这些信用合作社在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中能有多大作用。去年12月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江浙陕甘等省举行全国农村借款来源的调查，其结果有如下表：



全国农民借款来源分析表

种 类	合作社	亲 友	地 主	富 农	商 家	钱 局	其 他	总 计
现金贷款	1.3%	8.3%	9.0%	45.1%	17.3%	8.9%	10.1%	100%
粮食借贷	—	10.9%	13.6%	46.6%	11.3%	—	17.6%	100%

注：据该所第二年第四期农情报告，报告县数为850县。

这表告诉我们：信用合作社在农村借贷中（且仅限于现金借贷）只占有1.3%的地位，农民依然深陷在地主、富农和商人的高利贷盘剥之中。当然，因为信用合作社在中国各省的分布是有很大的数量上的差异（比如据1934年份《申报年鉴》所载，江苏占全国合作社27.31%，而陕西仅占0.13%，山西仅占0.04%），前列百分比无疑地只能代表一般的情势。不过就是按江苏浙江和河北三省，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中所演的角色也极不足道，我们且引一个现成的记载来证明这一事实：

“先就江苏省来说：全省社员数为38,280人，全省人口数为34,000,000人，约合千分之一强。若以户数比较，则江苏户口数为6,438,036户，就中与合作社有关者占千分之六弱，即江苏有千分之六的人口是与合作社有关系的。”

“次就浙江而论：浙江社员数为11,909人，人口数为20,643,000人，占万分之5.7；但就户数来说，全省共有户数4,559,540户，则占千分之2.6，即浙江人口中有千分之2.6与合作社有关。”



“更就河北来说：该省社员为25,633人，人口为31,233,000人，和社员数比较，约占全人口万分之八；但全省户数共4,928,695户，合作社员所占者为千分之五强，即河北全省中有千分之五的人口是与合作社发生关系的。”（见《合作月刊》5卷1、2期合刊11页）

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的体系中占着这样微小的地位，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于合作运动历史之短促，这当然是有关联的；不过我们更应明白：银行家的裹足不前，实是此种结果之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还得补说的，就是信用合作社在地理上的分布关系。按全国而言，它们是集中于江浙冀鲁和皖赣；按省而言，浙江670个信用合作社，有90个在嘉兴，88个在崇德，76个在杭县，62个在德清（《申报月刊》3卷9期第53页）。再如江苏共有1,897个合作社，丹阳占159，江北的高淳占143，萧县占125，镇江、江宁，如皋和松江所占亦皆在80以上。这是表示什么呢？很简单，原因就在这些省（赣皖更有特殊情形）和这些县，都能部分地或全面地具备着这些条件：商业比较发展，社会比较安定，离上海的金融势力圈比较迫近，比较大数量地生产十足商品化的丝或棉。当然，我们不是说前述那些省县的农村金融不需要调节，事实上这些省县的农民是和其他各地一样，为着经受不起高利贷者及其他种种剥削而亟待救济。同时，在某种情形之下，办理信用合作的，先从比较中心的区域入手，而后推及比较偏僻的地方，也是一种必然的程序，但是银行家的农村投资所以局



限或者集中于前述那些省县，却不是为了这类关系。为了明白起见，我们再介绍一段消息：不久以前，上海中国金城等六家银行与经委会棉统会合作，投资陕西。他们对于“关中区之交通便利或水利兴办之各县”，已相继放款，但是对于“灾情较重，农村破产尤甚之各县”，倒寥无贷款（请参看9月27日《西北文化日报》）。这自然因为交通便利，水利兴筑的地方，更能保证本利的收回。银行家是矛盾的：他们一面要图救济农民之名，一面又要图获得利润之实，权衡轻重，后者自然比较前者更为重要。这样无怪信用合作社不会出现于破产特甚的农村中了。

四、放款与各农民层的关系

前节是就数量来说明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如果再进一步将信用合作社的放款情形分析一下，那末此种微小的程度就更明显。事实上在信用合作社比较发展的几个县里，一般贫苦农民的日常金融关系还是难以受到怎样的影响；真能受到此种新的金融组织的某种便利的还只是地主富农。因为一般说来，合作社放款给社员——特别是非社员，什九是要索取抵押品的。这样没有余谷或者房屋田产的贫农和雇农自然借不到钱；侥幸借得到钱，也是少得可怜。而且就是有了一些抵押品，事实上还常常要受乡村长的支配和操纵。例如绥远平市官钱局办理农村贷款，就明白规定：“农民具有相当抵押品而向本



局贷款时，须由该村村长，出具保证书，以保证该抵押品之毫无纠葛及其用途之正当。”（1月25日《绥远民国日报》）其他各省也是这样。贫农是乡村中最待救济的人群，但是银行家为了本利全收，自然要让他们留在苦难当中。关于这，江苏农民银行有一个统计报告，可以给我们作较具体较普遍的说明材料。该项统计是说明1932年该行所指导的信用合作社贷款给社员的情形。详细请看下表：

信用合作社社员向社借款统计表之一

分类（单位元）	人 数	百 分 比
未 借	1,822	5.37
20以下	19,945	58.80
20—50	5,203	15.34
51—100	4,710	13.89
101—150	956	2.82
151—200	859	2.53
201—250	299	0.88
251—300	100	0.30
301—350	22	0.06
351—400	3	0.01
合 计	33,919	100.00

骤然看来，这表好象告诉我们：江苏农民银行所指导的信用合作社，是和一般中农以至贫农大众发生的关系比较普遍，因为20元以下至50元的小额借款的人数，占全社员74.14%。这样的论断，假使单从人数的观点来说，可以说是适当的。但是，研究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中起了多大作用和何种作用，我们就更应注意农民阶层的不同



和他们分别所借得的金额，即贷给富农的有多少元，贷给贫农的又有多少元。我们假使根据前表，将所借得的数额推算出来，并求出其百分比与前表之人数百分比相比较，那么所得结论就很不同了。

信用合作社社员向社借款统计表之二

借 款 等 级 (单位元)	人 数		借 得 款 额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未 借	1,822	5.37	—	—
10	19,945	58.80	199,450	18.20
33	5,204	15.34	171,699	15.60
75	4,710	13.89	353,250	32.20
125	956	2.82	119,500	10.90
175	859	2.53	150,325	13.70
225	299	0.88	67,275	6.14
275	100	0.30	27,500	2.51
325	22	0.06	7,150	0.65
375	3	0.01	1,125	0.10
合 计	33,919	100.00	1,094,274	100.00

注：此种借款等级乃前表首栏各组之中点值，当然只能揣出一个大概情势。

从这表，我们不难看出：74%借款在50元以下的人，只借得33%的贷款；而18%借款在50元以上和200以下的人却借得56%的贷款。这完全因为前者是中农贫农者群，而后者在大体上则为地主富农者群。合作社在什么人的



手中，什么人能顺利地从合作社借得贷款，这些问题是用不着我们再来分析了。

说到这里，我们觉得需要把陈家骥先生的一段话拿来讨论一下。他在南开半月刊《中国经济专号》所著的论文内，对于前引江苏农民银行的统计，曾有这样一段话：

“信用合作社社员，向社借款，其所借金额，以25元以下者为最多，占66%。其借款之在100元以下者，竟占总数88%。其借款额超过200元者，实微乎其微，可知需要合作社组织之农民，均系中小农人。彼等对于巨额借款，并无需要。”这里有许多亟待商讨的地方：第一，问题不在需要与否，而在需要能否实现，比如巨额借款所以微乎其微，全因贫农大众无法告借。第二，若以第二表所列借得款额之百分比来说，需要信用合作社贷款而又能如愿以偿的，还是地主富农。中小农民固然也是需要的，不过他们的失望，已由借得款额的百分比证实了。（注一）

五、利率高低的相对看法

其实，就算信用合作社在数量上已相当普遍了，同时一般贫苦农民亦能比较顺利地借得款额，可是因为此中还有利率关系，是否即是福利，尚待我们继续分析。

自最近一二年信用合作社相当发展以来，银行家常有一句自慰而又自豪的口头禅，那就是他们对于农村中的贷款，其利率比农村中所通行的低了很多，而且他们的放



款还间接压低了农村中的利率，使农民得益不少。前面说过，信用合作社的放款只占农村现金借贷 1.3%，那末，一般说来，“压低”一层自是瞎吹的狂语。事实上就是“较低”一层，也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宣传。银行的农村贷款，其所取利息较低于乡村中的高利贷，因而在某种情势之下能使农民多少得到一点“实惠”；但是他们那样笼统地大声自诩，却不禁使人们想起英国的资本家，在他们的曙光时代对于劳动者所说的那些佳话，他们宣说现今劳动者所享受的物质生活，远非中世纪的农奴所能梦想，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社会，他们更忘记了自己的生活高过过去的封建领主千倍万倍。与这同样，中国的银行家只看见他们的农村贷款所取的利率，比农村的高利贷低，而将高过于城市中所通行的利率这一点却偷偷地放过。他们自己心底当然明白：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利率上的显著差异是他们很好的赚钱机会，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曾用以获取相当可观的利益，比起农民所偶然得到的一点点“实惠”来，真有天渊之别。银行家对于利率的注意，实远过于合作事业推行之本身。比如从前上海、中国、金城三银行与华洋义赈会对各合作社搭成放款的时候，该会所感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其中利率……定来太低，银行不干；定的太高，合作社不上算”（《合作通讯》100期2页），就是很好的明证。

有人或者要说：且不管银行家的利率和城市的利率的关系，银行家的低利放款，对于农民总是救星，其实这还是



有条件的，而且带着虚伪。银行贷款给合作社，大概取息月利一分左右，而合作社贷给农民，因种种手续及中间用费关系，取息总在月利一分五厘左右，押米放款为一分六厘，而且还是在极“合理”、极“公道”的情形之下方才如此。试问：当这国民经济极度衰落的恐慌年头，按月息一分五厘贷与一般农民又能有几多好处？不说别的，我们就单以善于经营打算的商人为例吧。在过去开一布庄或者南货店，可得红利三四分，现在就是一二分也很难了（尤以内地为然）。那么善良的农民，其不能藉借款以获利，就更无疑义（注二）。何况利率在月息一分五厘以上的，还是一般常情。例如河南新乡县农民借贷处章程第五条明文规定借贷利率为月息一分五厘之后，其第八条又规定借贷处对农民抵押品应收5%的栈租。浙江于潜县农民借贷所亦有此种规定。有许多地方更因银行贷款给合作社，或者合作社贷款给农民所取利息较低于乡间的高利，就发生一般豪绅包办转借的黑幕。谁都知道，银行家投资农村所需要的是安全，因此他们上要依傍党政机关的政治势力，下要与当地的豪绅勾结。这样，合作社就变成豪绅控制劳苦农民的新武器，放款利息也因经过豪绅的手而间接提高。有位左其浚先生，在8月22日的《镇江苏报》上，推崇丹阳合作社的优点说：“四乡农民皆系聚族而居，大多数社员均属同姓，一旦选举职员，当选者皆系族中长辈，毫无竞选情事。一切决议案件，各社员亦莫不欢然遵守”。其实这差不多是普遍各地的情形，所谓长辈什九就



是豪绅。不过这与其说是优点，毋宁说是劣绩。不用说，此种黑幕已经相当普遍，使得人们不得不加以注意。例如奉四省农民银行之命而赴陕西兴办合作社的邱文清先生，曾对当地边闻社的记者谈及这事，他说：“办理农村合作社亟应注意之事，即为组织问题。若组织不健全，则弊窦丛生。为农民谋利益之机关，可变为剥削农民之机关。故合作社之组织，绝不容土豪劣绅以及社会化的绅士等入其间。”（7月9日《西北文化日报》）杜岩双先生在其所著“浙江之农村金融”中，且指出浙江已办的合作事业的流弊之一，是“乡之豪强，常假名组织合作社，乃向农民银行借得低利之借款，用之转借于乡民，条件之酷，实罕其匹。此种合作社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申报》月刊3卷9号53页）他如对于合作事业比较严密办理的华洋义赈会，事实上也相当普遍地发生这种流弊。这正说明，在起点上还勉强能够算为低利的贷款，经过中间种种剥削，结局还是乡村中的高利贷。因此，所谓信用合作社的低利放款，假使真是低利而有益于“农民”，那实际得到该项利益的只是富农和豪绅而已。

六、农民银行基金的征收与挪用

我们假使要彻底认识年来信用合作运动对于农村金融之全面的意义，那么农民银行基金的征收及其使用实况，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这点，我们且以江、浙和



四川三省为例来说明。

1932年12月，南京政府为了企图复兴农村经济状况，曾令财、实、交三部拟具设立农民借贷所的办法，为来日创办农民银行的基础。不过推行比较有效的还是江、浙两省，它们（尤其是江苏）早在1932年以前且已筹办，或者推广了一番。江苏农民银行的成立是在1928年7月，其基金与军阀孙传芳有关。因为1926年，孙传芳为了抗御当时的北伐军，需款甚急，于是下令江苏全省各县征收田亩附捐，每亩二角。可是军事的迅速失败，使他不及用去，而且也来不及带去这笔民脂民膏，而这笔款子就做了后来江苏农民银行的基金。前述田亩附捐在各县有征收完全的，有未开征的，国府奠都南京以后，江苏仍令各县征取，俾可遍设农民分行支行。浙江于1929年6月曾与中国农工银行合作。成立该行杭州分行，但因调度不够顺利，嗣又进行省县农民银行之筹办，方法也是于田赋项下就地丁每两抵补每石带征银元二角至五角。在四川，军人刘湘也说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痛苦异常，亟需设立农民银行，以谋救济，办法更聪明，是变形地征收田赋附加——发行农业有奖债券300万元，交各县推销。但是毕竟四川不及江浙富裕，刘湘的“头奖引诱政策”终归无效；因为一般人民已因捐税太重，无法为生了。筹办农民银行或者其雏形的农民借贷所，说来是很动听，乃为农民着想，——因为他们没有购买种子农具，因而受高利贷的无情榨取，假使有了农民银行，他们就可摆脱古老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桎梏，云



云。然而这样为农民着想的机关，却要先伸手向农民讨取附税！这正和数月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了改善人力车夫的牛马式的生活，先向他们索取互助费一样，真是十分玄妙，十分离奇！有人或者要说，一般贫苦农民并不是重要的田赋附加的担负者，但是这样说的人应该知道：正如狡猾的商人会将种种货物税转嫁给消费者一样，贪婪的地主也会将附加转嫁给贫苦农民。假使农民银行筹办完成以后，真的为贫苦农民谋福利，那么担负一下倒也罢了，然而按照前面各节的分析，这多半是梦想，多半是骗术！而且事实的不幸还不止这些。例如，江苏农民银行在章程上是规定为农民求幸福，放款以农民所组织的合作社为限，但是放款之轨外发展，依然是无法掩饰。据该行1932年统计，省机关和县机关的移用挪借，共计亦占全放款额的23.65%。这种借款在移借的时候，或者也部分地声言与乡村建设有关，但其实际没有不是用于填补省县财库的亏缺，所以往往不能按期归还。

江苏农民银行放款分析表

	合作社	借联会	个人	省县机关	储押	其他	合计
1931年下期	53.88%	0.93%	12.06%	23.85%	8.21%	1.08%	100%
1932年上期	53.56%	5.19%	10.66%	23.56%	6.12%	0.92%	100%

此外县府官员以及地方豪绅，常常还要将这种血汗的基金擅自挪用，或竟加吞没。例如“海宁前任县长何鼎



仁，竟将该县征存农行股本，擅自挪用（见1月5日《杭州国民日报》所载民财建三厅之通令）；“平湖县长将农行基金私自挪用，其数竟达万元左右之巨，而该县及海盐两县之农行基金征起款额之帐目亦多不清”（5月29日同报）。浙江建设厅为了防止种种流弊，曾颁发各县带征农民银行基金总报告表及月报告表，令各县填报，但是迄未造送的县份仍属不少。在江苏尚未征收或者尚未征足二角田亩附捐的各县，对于继续征收的捐款，积压挪用的弊窦亦同样普遍；所以该省财实两厅曾令各县组织农行基金清理委员会，以事清理。在挪用公款、侵蚀农民的汗血这一点上，地主豪绅并不后于县府的官员。比如浙江浦江县农民借贷所主持人曹某，竟将该所基金挪作私用，因为他一方是该县浦钟公路的负责董事，而该路因为营业亏蚀，正需大笔填款，这样农民的汗血就变成汽车的润滑油！

七、结 语

信用合作社（其他各种合作社也一样）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体制，它不过是某个阶层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社会经济的改造过程中，它起何种作用，主要全由主持的或者控制的阶层来决定。比如在农奴解放后的帝俄时代，合作社主要是被新兴资产阶级用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帮助富农扩大农耕，使整个农村也全在资本这怪物的控制之下。它绝不象当时的民粹派所说是扶翼



贫农的，当然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可是在1921年所实施的苏联新经济政策之中的合作社，其意义已完全改变，它是帮助中小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问题的关键就在统率这种合作事业的，在从前帝俄时代是与贫农大众相对立的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则为与贫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无产阶级。

中国的信用合作社究竟在什么人的掌握之下，我们不难从它所表现的各种事态之中看出，这在前面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现在我们要补说的，是这种合作事业给予农村金融之综合的影响。年来上海银行家对于内地信用合作社的（此外还有运销生产等等合作社的）投资，多少是以复兴农村为目标的，因而多少也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希望农村金融松动一些之后，农业生产可以恢复起来。他们还企图用运销合作社来统制农产品，并透过这样的统制而直接统制生产过程（注三）。不过中国农村长满荆棘，银行家实难迈步前进。社会秩序固甚不安，农业恐慌也太可怕，他们怎会大量投资呢？结果资本主义式的改良成份很少很少；他们微不足道的贷款，实际上只有利于农村高利贷的活跃。不用说，这当然也是银行资本对于农村统御力加强的另一形式。而且就是在这些仅有的作用中，我们还要注意帝国主义者的狞恶面目。前述银行家的希望，多少也是帝国主义者的希望。不论是稍稍改良也罢，或者继续扩大原有古老的高利贷剥削也罢，帝国主义者也不会让中国银行资本独自活动。除了美麦借款之一部



用以办理江西的合作事业以外，我们虽然还较少看见帝国主义者参与此种合作事业的直接表现；但是华商银行的各种活动，实际上是很难摆脱作为列强资本的触手的作用。帝国主义者的金融资本常常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著银行资本乃至高利贷资本，使他们受制于自己，而对农民大众实施普遍的榨取。说到这里，那么，还有谁能高喊年来的信用合作事业是中国农民的福音呢？

本文作于1934年

注一：以上划分，当然不能说绝对正确，只能说是大体无误。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借款，即在一般的农村金融关系中，至多只能说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中农范围。若就主要还在试办中的新兴信用合作社而言，则此种可能程度当更减少。所以与其如陈家骥先生那样，将100—50元的借款作为中农范围看待，倒不如归入富农范围之更为切合事实。

注二：一般贫农大众向信用合作社借款，根本就不是为了生产，哪里还谈得到生利之多寡。他们借钱，总是为了还债和纳粮。譬如京市殷巷和汤山两处的借户，为了还借纳粮的占全借户40%—50%。江苏农民银行指导下的信用合作社，其放款以还债为原因的，竟占全放款的72%。

注三：假使要说明年来政府当局和银行家对于投资农村的全运动和全意义，以及帝国主义者如何透过他们的手而加



强对中国农村的统制作用，那么除掉信用合作社探讨外，我们务须同时解剖运销合作社（尤其是关于棉花方面）的兴起和动向；这只好留待以后的机会了。



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

一、新趋势底构成

自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炮弹粉碎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以后，中国的农民大众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社会成员了。他们不但要将自己的农产品献现于市场，以换取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工业品，而且自己日常所必需的，同时也是自己所唯一生产的米麦之类，有时也要仰给于市场了。他们一天密切一天地联结于国内的乃至海外的交换过程，构成无可脱离的世界经济底一环节。固然，从某种意义说来，这也是代表着一种前进的过程，但是第一因为这种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各国推销其过剩商品，同时又以不等价的交换法则吸收中国的农产品这类条件之下进行；第二国内又有许多封建桎梏使这种商品化的过程不能畅达地推移，中国农民大众在这蜕变之间所受的痛苦真是万分深重。他

* 本文在当年的《中国农村》杂志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二集内。



们不但要受社会向前发展的苦，而且还要经受社会不能迈进一步前进的苦。

第一，中国的农村经济还是半封建性的小农经营，仅就数量而言，他们底生产成果是很有限的，对于市场绝对不能采取趸售的形式，这当然替代中间商人安排好了自由盘剥的大好机会。

第二，中国的国民经济，一般说来，是非常落后，交通组织以及度量衡制皆亟不完备，同时上层的政治机构亦极割裂。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不是使农民更隶属于商人买办等，而一任其操纵垄断。

第三，中国的农民是世上有名的贫穷，他们往往等不到农产品收获就需将农产预押或预售。就算能够勉强挣扎而不预押预售，若要多存数月以待善价，那还是绝对难能的事情。贫穷使商人更多获得榨取农民的机缘。

以上乃是显而易见且与本文有关的几点，中国农民在农产品运销过程中陷于如何的绝境，我们已经不难借之推见一斑了。最近几年以来，即世界经济总恐慌给予中国的破坏影响开始表现得特别显著的那1932年以来，中国农民在这方面所遭遇的苦难，不用说更是日深一日。列强底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他们备尝“丰收成灾”的苦难；而地主商人底祸患转嫁，则更使他们多受一重“光顾”。真的，他们底“无以为生”，使那些“赖以为生”的人们也觉得非加以深切的注意不可了！

最近两三年来，政府当局救济农村，银行巨子投资农



村的呼声非常高涨，主要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推行信用合作事业，调节农村金融；一是办理运销合作以及农业仓库，提高农产品价格，说来就是为了解除农民所身受的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底残酷榨取。关于前者，我们已在前文* 剖解过了；关于后者，因与前述问题直接相关，我们现在再周密地加以检讨。在论述信用合作事业那篇文章中，我们曾经如实地指出信用合作事业特别兴盛于最近两年内的原因是：

1. 政府当局想借之复兴农村，恢复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民底纳税能力，因为年来农村激急破产，财源已告涸竭，甚至于影响到政权的维护。
2. 银行巨子除了这种安全问题以外，还想透过信用合作事业，袭取着旧式高利贷资本的机能，以博得相当的余利。

不用说，我们当然也可用这两种原因来答复运销合作以及农业仓库为什么蓬勃于最近一二年内。如前所述，中国农民在农产品运销过程中是受着中间商人底种种盘剥，日趋赤贫，而年来因农产品价格狂跌，进行就更迅速。所以使农产品运销合理化，实是政府当局和银行巨子的共同要求。固然，在这种改进农产运销的事业中，银行家的确不能获得象经营公债或者外国股票那样的肥利，但是原来为各地中间商人所赚取的余益，却部分地窜进了他

* 指《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一文。



们底荷包，也是我们不应忘去的。

在这里，有两位银行家底谈话值得我们加以征引，因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问题之更特殊的部分。一位是中国银行包头分行行长郑相臣先生，他说：

“余前年在包市二次设立办事处，所抱宗旨专为辅助工商业，繁荣西北。因年来包市商业萧条，农民破产，其原因虽多，而经济压迫，不能发展其事业，却要十居八九。加以本年农产品价落，转运困难，绝少问津。殊不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余本此宗旨，采取有进无退之精神，凡工商业缺乏基金，不能进展者，余充分接济之；凡皮毛货物因无金融帮助，不能维持相当价格者，本行设有押货栈，尽量调剂之；旧式金融业，一时周转不灵，决抱同舟相济之心”。（1934年1月13日《包头日报》）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比较雄厚，组织比较完备的新式银行，如何在这恐慌年头傲然独步，他们如何紧紧抓住“饥易食，渴易饮”的良机，来替代原有商人办理皮毛抵押（即农业包库之一重要工作）。这与其说是为了“尽量调剂”，毋宁说是为了“趁机牟利”。年来银行家对于运销合作或者农业仓库感到兴趣，这确是一种很好的自白。还有一位是交通银行经理金国宝先生，他在今年上半年曾应桂省当局之邀约，亲赴广西一行，对于投资该省农村一节，返沪后曾发表如下谈话：

“沪市日来存银激增，投资乏术。银行界早有投资



农村之心理，惟因缺乏仓库，故对于抵押农谷，均怀戒心，不敢尝试。盖农民之财产，大部为农产，银行于放款前，可先将其收得之农产，纳入仓库，待其偿还借款时拨出。偶有为难之处，随时可将存谷变卖。桂省对于设立仓库，以作银行界投资农村之先决条件，业已承认，正在积极计划中。”（见《中华日报》）

银行家对于贷款农村是如何审慎、精明，因而也是如何偏狭，在这谈话中是毕露无遗了。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业仓库对于银行家投资农村之先决条件”的作用，我们可从而了解年来农业仓库以及运销合作之兴起，是银行家控制农村的第一步，以备将来再作进一步的控制。

二、新趋势底现状

我们在讨论信用合作事业的时候，曾经指出它不能普遍发展的原因，除了时间短促这种次要的关系以外，主要是财政竭蹶，社会不安，以及银行家为着打算本利安全而起的种种顾忌和畏缩。与这完全一样，年来兴起的运销合作以及农业仓库也就是因为这类关系而不能迈步前进。譬如八省市粮食运销局筹备处虽在蒋委员长训令之下成立，但因各省市筹款不易以及其他阻梗，结果终成泡影。财部虽然接着以全国粮食运销局名义规划此种事业，并迭派人员赴汉口、长沙等地调查粮产情形，但是“不久即将实现”云云，总是我们累月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政治不安，基



金无着，实是可以压倒一切整天价响的呼声。至于银行家方面，除掉上海、中国两银行，以及四省农民和江苏农民两个专业银行，稍有相当资金投放于农业仓库以及运销合作事业以外，其他的几乎就很少顾问。

对于中国农产运销底这种新趋势，在目下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程度，我们如果需要一个真确的认识，自然须从农民所组织的运销合作社和银行家在重要各地所设立（有些与政府方面合作）的农业仓库这两个体系来观察。有人说运销合作社比信用合作社容易发展，因为它不需很多的基金，只要农民将各自的农产收获集合拢来就可成事，这当然是错误的说法。固然，从基金的观点来说，运销合作社底成立，的确较易于信用合作社，但是它必须取得市场的相当联系以及运输上的各种方便，有时自己还需设有储藏农产的仓库，然而这些不是一定区域内的农民所能办到的。同时，银行投资运销合作社，其周转略较信用合作社方面为迟缓，自然也是前者在发展过程中远落在后者之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信用与运销以及其他合作事业，在中国农村中的发展有如中国合作社按种类分配表（见下页）。

我们晓得，信用合作社在中国的现金借贷中仅占1.3%的地位，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现在从表中，我们见到运销合作社还不及信用合作社的八十分之一，那末抛开其他一切实质不讲，它对于将农民从商业资本的盘剥中解救出来这一工作所能尽的功能，也已很难使人想见其轮廓了。在



中国合作社按种类分配表
(1931—1933年)

类别	1930年		1932年		1933年	
	社数	%	社数	%	社数	%
信用	1,379	87.5	2,213	80.1	5,720	82.3
运销	15	0.9	36	1.3	61	0.9
生产	86	5.5	204	7.3	304	4.4
消费	54	3.4	122	4.4	125	1.8
购买	32	2.0	54	2.0	129	1.9
其他	10	0.7	134	4.8	607	8.7
合计	1,576	100.0	2,763	100.0	6,946	100.0

注：见《合作月刊》6卷1期13—14页。

交通比较方便，市场关系比较密切的江浙一带，情形亦正如此：在江苏，信用与运销之社数为1,159个和12个（1932年6月统计）；在浙江，为988个和37个（1934年4月统计）；其他内地各省，其情形当更可想象。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各地的信用合作社，因为放款十之八九皆需抵押，往往也直接地或间接地含有运销作用，和银行家所办理的农业仓库接受农产押款一样。虽然如此，前述结论还是不会受到若何影响。

其次，我们要说到银行家所经营的农业仓库，从前述



运销合作社特别不能发达的原因看来，我们晓得若欲明确估计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全赖这类农业仓库的估量。因为谈得上将农产品用储藏或抵押的形式集合拢来，越过内地商人和银行的种种中介关系，而直接运销于中心市场（姑不论其动因若何），除掉银行家在各地所经营的农业仓库以外，实在再无他属。他们说，他们筹办这类仓库是为了便于农民以及运销合作社储藏或抵押（实际十之八九都是抵押）农产品，以静待来日的善价，同时也替代他们计划运销，免受商人榨取，实际究竟如何，我们且留待后面再说。我们现在要晓得的是农业仓库底发展现状。

1. 江苏农民银行方面——据该行今年上半年载之报告（见1卷5期《农行月刊》），该行自办及委托代办之储押仓库计有97处，其中自办者计39处，委托当地机关代办者计34处，由合作社或农民教育馆代办者计24处，分布于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丹阳、江阴、常熟、吴江、嘉定、松江、天津、徐州、盐城、如皋、金坛、溧阳、宜兴等20余县，所受储押之农产品，按数量言之达30万石，按价值言之达1,467,169元。此外，该行又直接替代农民或合作社办理农产运销，在上海南市设置农产运销总办事处，并在无锡、盐城、如皋、徐州、清江等地分行之内酌设分处，经营此项业务，统计自本年1月至8月，该行代理运销之农产与数额有如下列：



农 产 种 类	数 量	金 额
米 稻	1,871石, 1,000斤	12,994.35元
小 麦	395袋, 608包	5,354.62元
猪 只	197头	1,302.62元
土 布	163匹	980.90元
除 虫 菊	10磅	8.96元
共 计	—	20,641.45元

2. 上海银行方面——今年为首七个月内，该行对于各地农业仓库的贷款，据陈光甫氏谈话，可分三方面来看：“A. 江阴、青阳仓库，储押者以布匹、米麦、豆饼、杂粮居多，计已贷款45,124元，所属清江分库，六月间开始，已贷款8,541元。B. 和桥仓库，储押者以食粮居多，计做抵押放款12,252元。C. 南京方面，湖熟抵押放款114,210元；江宁县所属仓库10处，贷款3,525元；农协会仓库8处，贷款4,251元；汤山贷款3,442元。”以上贷放各款，共计约20万元，占七月来该行总分行农村贷款金额27%（约70余万元）。此外，8月23日报载该行与中国银行合组湘省农村贷款团，先从八区之一的津市区开始设立仓库，并谓“现已成立容量约五万担之区仓库于津市，容量约二万担之分仓库于澧城、新洲、安乡、新安，容量约五千担之支仓库于各乡村。在今年夏季，已由银团在津市区作生产贷款22,584元。”

3. 其他银行方面——对于农业仓库的经营，中国银



行也注意，它在包头、济南、郑州等地都有运销农产的组织。该行与上海、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行等六家银行，亦拟投资60万元，建筑陕省仓库。按其计划，设立仓库的地点，“除于省府设立大规模之仓库一所外，并拟于潼关、大荔、三原、乾源、凤翔、洛川、肤施、绥德、榆林、商县、安康、南郑各地，亦多设立仓库一处。其他如各县重大之市镇，分设乡仓镇仓以资联络。”（8月30日《中华日报》）9月24日《西北文化日报》曾谓交通银行西安分行，“除营业外，并办理运销等事业，故该行积极在潼关筹设打包厂，浙江兴业银行郑州堆栈，亦于七月间派员来陕，拟在西安、渭南、潼关等地筹设分栈，专办棉花打包及运销事宜。”此外，如皖北凤阳产烟的区域，安庆附近枞阳镇的米市区域，以及浙江嘉兴、兰溪等地，皆有农业仓库之设，而且也都是就地银行的投资之下成立。

在目下要全面地知道中国有多少银行并用怎样的资力来经营农业仓库，这些农业仓库又如何地分布于各省各地，实是零星的材料和统计所难允许的。前列三项当然非常残缺，譬如农业仓库略具踪迹的鲁豫皖鄂赣浙各省，根本就不曾提到。不过，我们所想探明的一点，即农业仓库在中国农产运销过程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在前列各项论述中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江苏的农业仓库，因为得到该省农民银行以及上海银行底比较积极的经营，同时不论在政治上或交通上所享受的机会也比他处为佳，然而六七



个月内所承受的储押放款不过一百六十余万元。此外，江苏农行替代农民或合作社运销农产的数额（八个月中），一共也不过二万余元。其他各省的情形，不用说，自然更较江苏为低。陕湘两省方面的计划固极堂皇，奈何政治不宁，社会经济又日趋破产，实现真是茫茫。但是有一点也是我们应加注意的，就是农业仓库虽然也与运销合作社差不多，对于农村经济所发生的关系或影响，更比信用合作社为有限，但是就某一特定区域或特种农产品说来，农业仓库（以及在它控制或扶翼之下的运销合作社）在运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在年来各地棉花底产销实况中特别表现得明白，本文下节就是要说明这点。

三、新趋势底重心

棉花这种作物，从经济的意义说来，是十足的工业原料品，因而也是十足商品化的农产品，这是一方面。第二，中国的黄河流域即冀鲁豫陕各省，是主要棉产区域，苏皖湘鄂亦宜于棉花的栽培；而且目下因为受着国内市场（中国稍稍够得上称为民族工业的，首推棉织业）的刺激，同时又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底收买和操纵，这些天然资源也相当利用了一部分。而这两个条件就使棉花这种农产品成为前述新趋势的主要对象和重心。我们晓得：以农民所组织的运输合作社，尤其是以银行家所经营的农业仓库为基础的农产运销的新趋势，其发展（抛开其他政治等



等关系不论)是与农产品对于市场的隶属关系相联系,所以年来银行家经营农业仓库以及对于运销合作社的注意,其范围专局限于几个棉产区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他们对于这一方面的活动,往往还从运销过程而伸展到生产过程。他们一方面将涣散的棉农变成产销合作社底成员,以便接受播种他们所希求的美棉棉种;一面又以轧花机、打包厂、仓库等等设备来加工并储押这类棉产收获,而集合地运销于市场。他们互用着这类形式,综合起来,就可收到很大的成效。江苏农民银行为了经营此种业务,本年为首6月来,曾派员投资嘉定、盐城、阜宁、如皋等地创立棉花产销合作社,贷放棉种和押款。在嘉定各乡镇内成立的产销合作社计有17所,社员达三百余人,即将成立的还有五所。为了发展产销效能,它们之上更有棉联社的设置。盐城和阜宁的棉产区域也有产销社的筹备,同时为了办理储押运销等等业务,还计划设立临时仓库。江阴、常熟、南通三县接境的常阴沙一带,是江苏的主要棉产区域,该行将该区全境划分为三部分,各成立联合社一所,现经正式承认的产销合作社,计常熟县境7社,共社员119人,棉田1,154亩;南通县境5社,共社员124人,棉田1,160亩。(以上江苏棉花产销情形见前引《农行月刊》)

在山东,棉花产销合作社的发展则更形迅速,譬如该省的著名棉产区域齐东,据9月9日《中华日报》所载,业已组织美棉产销合作社联合会办事处一处,美棉产销合作社153处,共计社员898人(此数或太小,待查明改正),



棉田33,681亩（此数或太大，亦待查明改正），共向中国银行借款62,440元。这些合作社都是本年二月后开始组织成立，据3卷1、2、3期《合作月刊》（山东合作学会刊行）所载，自2月21日至3月1日成立71社，至同月14日又增为139社，真可谓飞跃的发展。再如该省邹平县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亦在积极发展之中：

梁邹美棉产销合作社发展比较表

项 别	1932年	1933年	1933年比1932年增加	
			数 目	%
社 数	15	20	5	25
社员人数	219	306	87	40
包括村数	15	35	20	125
棉田面积	667亩	3,464亩	2,797亩	419
放款额数	3,583元	24,128元	20,545元	678
运销额数	6,762斤	89,496斤	82,724斤	1,224

注：本表见前引《合作月刊》18页，运销额之斤数仅指改良美棉之皮棉而言。

济南中国银行分行对于该社业务亦是非常注意，譬如该行襄理陈隽人曾于去年9月16日莅邹，和该社主席郭俊荣氏缔结借款合同，次日起即开始贷款，截至10月10日止，共计贷款9次，达24,178元。

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之下，陕西的棉产差不多是政府当



局以及一部分银行家所最注意的目标之一了。上海、中国、金城等六家银行和那儿的棉产改进所，对于各区的棉花产销可谓非常关心。9月10日的《河南民报》，载称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对于该所指导下的棉花产销合作社力求改进，甫经数月，其棉田面积及社员人数即增十余倍之多。今根据该报所载，列表于下：

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指导下棉花产销合作社概况表

区 别	社员人数	耕地亩数	棉田亩数
永 乐 区	3,059	185,600	62,516
斗 门 区	227	102,400	45,345
广 阳 区	1,100	43,350	14,450
鲁 桥 区	412	182,062	64,801
中 西 区	1,126	35,109	12,662
中 东 区	1,483	18,744	5,790
新 市 区	468	16,800	10,750
固 市 区	408	16,543	6,530
栎 阳 区	644	37,100	11,320
下 庙 区	922	缺	6,830
高 桥 区	1,066	21,000	10,568
未 央 区	845	201,967	6,750
交 雨 区	372	22,043	9,679
合 计	12,132	792,718	267,991

至于银行贷款情形，按照上半年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和前述六行银团所许的合同看来，可分为三种：1. 生产贷款，专供种子、肥料、人工等生产用途，以5万元为限；2. 轧花打包等设备贷款，以2万元为限；3. 运销贷款，以20万元为限。9月22日上海各报载称，该项合同签订后，银团即首先拨付棉苗借款30万元，则比规定又大了许多。同



时，各报又谓新花登场以后，银团又拨款 150 万元，交与棉产改进所办理新花运销，并视运销储押之需要，还可临时增加。

此外，豫鄂湘各棉产区域底棉花产销，也一样在银行资本的经营之下。譬如河南，在该省棉产改进所指导之下，现已组织成立的棉花产销合作社，计有太康县四社，杞县、洛阳、灵宝各一社，社员共达 4,200 余人；而该所为了各社业务之推进，又向上海银团接洽借款，截至 10 月底止，已有 108,500 元。在洛阳、郑州等地，我们晓得中国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均有轧花机、打包厂、仓库等等设备，对于该省乃至陕西的棉产运销，无疑地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以上不过将银行家对于农业仓库的经营以及运销合作社的推进，在棉产方面才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的情形，说一个大概而已。这种活跃的现象，其意义是很复杂的，我们务须分析和综合观察。一般说来，调节农产品的流通过程而使其合理化，甚至直接地或透过这类流通过程来改进农业品的经营，原是银行资本企图朝向金融资本的时候所必有要求。关于这一点，中国的银行家在目下棉花这种作物的产销行程中，的确有了一些成就，是我们所不应看落的。但是我们更不要忘记，国内的政治不安，民族工业之本质的萎缩——这类使前述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根本不能长足进展的诸要素，总是使银行家只愿滞留在棉产的运销阶段上，而且还是迷恋着落后的腐朽的商业资本的形



态。不错，在某种场合，他们确是用比较好的市价收买各地的棉花，这是他们所唯一宣传的给与农民的唯一恩惠。其实，他们是在利用他们底雄厚资力，囊括棉产以完成原料品的独占，使独占的超然肥利可以安稳地滚进他们的荷包。据说今年最近一二月来，银行家已将登场的新花搜罗净尽，他们在内地各分支行底堆栈或者农仓里面已经塞满了新花。津沪的纱厂，因为抵御不过他们这种雄健的操纵，都只好准备闭厂收场。在过去，中国的银行资本有十足的买办机能，替代列强向内地收买他们所需要的农产原料品，到现在当然也不能两样。而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击中国的民族的纺织业，不但用廉价倾销其棉纱，而且用一时高价收买中国内地的棉花，使我国纺织业陷于不可超脱的原料与制成品的剪刀差的厄运中。这不是故作危言，在华北，在天津，在汉口，我们看见日本资本公然地或乔装地在干这种勾当。他们也一样需要棉花产销合作社这类组织。所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看，年来兴起的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比较发展的一隅，实际上是一把利刃，至少也是一杯毒酒，对于农民不会是可庆的福音。

四、新趋势底评价

我们对于棉花产销底新趋势的这种评价，大体上也可适用于年来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的全部。现在我们更一般地更具体地来评价这整个新趋势，以结束本文的分析：



第一，从新趋势底构成来说，它是丝毫不曾触及问题的核心。中国农民大众年来在农产运销过程特别遭受农产价格狂跌以及中间商人底盘剥的惨苦，是与国内外的经济机构以及恐慌深化相联系，因而决计不是离开生产基础的改造所能挽救。譬如无锡各乡代理农仓，因经营农产储押而贷放出去的款额1933年比1932年反减少 60,077.24 元，即从121,366.10元减至 61,288.81 元（见8卷3期《中行月刊》193页）。至于减少的原因则系：前年农民在新谷登场出货见涌时，因市价低贱，乐与农仓叙做抵押，以希春季米价逐步高涨，回赎时盼望稍沾利益，如属自家吃粮，亦可免“卖贱买贵”。但届时适得其反，回赎时米价愈形见跌，农民大失所望。以致去年新谷登场，米价更贱，农民都不愿叙做抵押，均皆纷纷出售。农仓储押是否解救农民之道，我们姑置不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离开生产制度的改善，大众购买力的提高，单说从流通过程来增进农产价格，使农民稍减痛苦，结果是怎样渺茫的一回事。说到商品剥削的解除，情势亦完全一样。在商品经济存在的一日，假使没有新的经济体系来加以调制，要想击退商人的盘剥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目下中国这种半封建性的小农经营条件之下，侵蚀的商业资本经营农产运销而论，本质上也正是代表着商业资本化的过程而已。形式的稍稍不同，是隐藏不了实质的一致。

第二，我们且退一步地将这种根本的实质问题以及第二节所述的新趋势的停滞状态搁开不论，而仅来讨论这些



有限的农业仓库或者运销合作社，在实际业务上所发生的机能。谁都知道，要能够利用农业仓库或者银行堆栈的低利储押放款，以及享受运销合作社在集约运销上的种种便利，首先要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这些农产品并不急于待售。银行家说，他们底低利的储押放款以及代理运销的种种设备如何有利于农民，如何使农民能够不因眼前需款的孔亟而去接受当前的低落市价。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大部分的中国农民，都是受着繁重的债务和租税压迫，往往在农产品尚未收割以前就以青苗的形式抵卖出去了，有的甚至一无可卖。所以象秋收储押后以待明春高价这类期望，除了优裕的富农或地主以外，他们连构想一下也是很困难的了。有一位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学生，在杭县附近一个名叫横畈桥的区域里工作，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讲到在这地方贷款吗？前已言，这地方共有三十几家，多数是无产者，所以要以不动产抵押贷款吗？根本无产可抵，事实上是不可能；或曰，农民所生产的米谷可充动产抵押放款，经营储藏合作，设立农业仓库吗？但是所有米粮，至多只能供给一年的粮食，还要缴租，所以也是行不通，或者推行信用放款吗？然自治组织的方式，以一户来担保五家，那末，35家只要7户来保证就可以了，但是这地方是普遍的穷，不是一家二家的穷，质言之，被保人固穷，保人根本也没有财产上的信用能力。所以，信用放款吗？谁也不敢保证可行无危险。”（浙江《合作半月刊》第12期5页）这个例子固



然比较极端，但是所谓两极化日益尖锐的中国农村，实是非常迫近这个例子了。因此，譬如无锡，前述1933年各乡农仓之储押放款比1932年减少六万余元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该县“蚕桑为农民之唯一副业，每届茧节，多借此款以抻会钱。但连年丝业之失败，茧价之不起，农民暗苦已深，去年收茧更失所望。故新谷登场，农民之押米观念，于需用孔亟，眼前尚难顾及，不愿储待明春。”（见前引《中行月刊》）从这些现实的条件之中，我们可以见到真能得到农产运销的新趋势之区区便利的，只不过富农者群罢了。而且银行家对于农产运销的经营，差不多含有强制性质。譬如棉花，他们一面贷放棉种、肥料等等给产销合作社或农民，因而后者就必需将收获起的棉花售与或押给前者，以清偿其债务。接着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代替合作社或农民轧花打包，因而棉花的运销市场就全部地落在他们手里，以便他们从售价中扣出他们的贷款和佣钱。上海等六家银行对于陕西方面的棉花贷款就是实践着这样的程序，只不过从表面的形态看来，比旧式的商业资本稍稍合理一点。

第三，最后我们要提一提参预农产运销新趋势之人的问题。根据第二项所分析的经济关系，能够参预和乐于参预运销合作社的人，主要只有富农，而且因为可凭合作社组织转向银行界接洽运销借款，豪绅地主常常混杂其间，实行操纵之能事，各地商人也往往改头换面利用此种组织。举例言之，譬如“浙江萧山县之东乡，有一蚕丝合作



社，该社之社员颇为复杂，包括农工商学政各界人士，在少数人操纵之下，此社舍其本旨，起而广收蚕茧，作丝茧投机事业。收买之区域，恒逾出该社应有之范围。除向农民收购蚕茧外，并强迫农民入社，由茧价内扣去若干以为其股金。复以购得之茧，运至上海，以投机之方式转售。不幸投机失败，损失竟达数十万元，其中十万元系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之贷款。”（《合作月刊》第3卷6期第1页）此种事实，只要略加修改，自能适用于其他各地。在运销合作社里面，地主豪绅以及富农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其他社员的情形，决计不会限于浙江的萧山。去年下半年，上海银行贷款部负责人邹秉文亲至豫鄂湘陕一带视察，据说陕西永乐县的棉花运销合作社办得极有成绩，为其生平所未见过。这自然与他所报告的该社主持者“李海峰部下有‘大将’三名，一即社经理王风阁，一为赵姓，一为李姓，均系商人，赵姓现办合作商店”的情况直接有关。他们自然能够极精明地极新颖地运用各种利诱方法，吸收棉农入社，以收把持渔利之实效。（“邹氏报告”见《合作月刊》5卷11期）

说到这里，年来农产运销的新趋势，其“新”的意义究竟怎样，可说是完全明白了。有位赵国鸿先生，他在1卷4期的《农行月刊》上区别着江苏农行所经营的仓库和普通堆栈，是这样的写着：农行仓库与普通商业银行所办堆栈之异点乃在：“一则以农户为营业对象，一则以行商为营业对象，一则于储后谷价上涨，利益尚为农户所享，一



则利益已入行商之手。”我们想，普通商业银行家一定会站起凑着说：“为了救济农民，我们底堆栈现在变换营业方式，直接向农民或者合作社办理农产储押和运销了”。但是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仓库以农户为营业对象”，是银行家企图排斥旧有的商业资本，更直接地来操纵农产的疏通过程。所谓“利益尚为农户所享”，这只有对很小一部分富农是稍稍现实的，而在另一面，银行家是更肥了。在银行资本作商业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大众是得不到任何福利的！

本文作于1934年



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

一、目下货币问题的特征

因为货币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了使大家容易明白起见，我们在根据中国金融制度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以及从这些特性所产生出来的全国货币制度的紊乱，来谈目下正在激化的货币问题之前，先把货币问题的一般内容择要地提一提。

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世界里面，货币好似一支测量长度的尺，各种商品相互交换的时候，非靠它来媒介和测量不可；假使没有了它，我们就说不出这种商品值多少，那种商品值多少。一支尺能够测量长度，是因为它本身代表一定单位的长度。与这一样，货币能够测量商品的价值，也是因为它自己也包含一定单位的价值。譬如我们案头上

* 本文为章乃器、钱俊瑞、骆耕漠、狄超白合著《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一书（《新知丛书》第一辑，第一种，新知书店1935年10月20日版）的第二章。



有一本书，这本书价值一块钱，这就是说，一块银洋所包含的七钱二分银子，其价值与那一本书大致相等。不过货币这支尺，在某些情况下，会与测量长度的尺不同，它一时会放长，一时又会缩短，而且变动的还很厉害。还拿我们案头那本书说罢，虽然它本身的价值不曾增减，可是假使货币本身起了变化，那末，它可能值到一元以上，或者不到一元。倒转来说，也是一样，譬如我们手中有一块银洋或其它代表纸币，在早上能买到我们案头上的那本书，可是到了下午，因为货币本身（不是那本书）起了变化，会买不到那一本书，或者买得更多一点。试问在这时候，靠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将感受到怎样一种影响呢？无疑地，它所感到的是动荡、混乱，乃至不能存在。

货币本来好似一支尺，是代表一定单位的价值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上述那样的伸缩呢？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现在用实例来说明两种主要情况。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德国的军费支出太大，在大战以后又需要偿还巨大的战债，但是财政税收因为各种原因却相反地减少。那末，怎样应付呢？在这时候，它只有拚命滥发不兑现的纸币，增加政府的收入。这样，通货就无限制地膨胀起来，纸马克就拚命跌价。因而一个纸马克的购买力究竟有多少，便无从规定。再如目下的英、美，发行纸币的金准备还是充实的，但是他们停止兑现，将镑元的



购买力人为地降低，换句话说，一个美元的纸币和一个美金已无固定的关系。再因为通货膨胀的结果，镑元的购买力也非常不定，使工商业家无法正常地进行其生产和营业。以上是因纸币膨胀而引起的货币问题。

其次，来看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命该”替代宗主国销纳过剩商品的，因此，它们的对外贸易，往往是入超。它们为了平衡入超，就非输出大批现金不可。另外，殖民地往往要向宗主国贡纳大宗的款项（象印度对英国），所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存金和存银，必然要日趋收缩。这是一种现象。另外，当恐慌到来的时候，不论资本主义的宗主国也罢，或是半殖民地国家也罢，流通于市面的货币，必然要退藏起来。有存货的厂家，无法脱售存货，有资金的银行，不敢冒险放款，资金随着恐慌而冰冻起来。在这时候，一国的资金虽未减少，但是因为资金的周转已经阻塞的缘故，市面上也会感到同样的通货收缩之苦。假如我们说这种现象是相对的收缩，那末，前一种现象就可说是绝对的收缩了。这两种通货收缩的现象，无疑地会加速物价的跌落。在那时候，国家现金的缺乏，以及财政的困难，往往使原来的货币本位无法维持，而转向到纸币膨胀的路上去。目下的中国就正在备尝这样的苦楚。

现时住在中国内地，或是住在穷乡僻壤的人，一定会发现那儿的资金枯竭。假使要在一个很大的村庄上，这时凑满十块银洋，那恐怕就是天大的难事罢。这是因为，近



年以来，内地的现金大部分已经集中到几个大都市里，农村资金的枯竭，是在意想中的，至于城市里面，有的却是钱呀！譬如上海，就游资充塞。但是，另一方面，畸形繁荣的孤岛上海，现也犯了通货收缩的怪病。第一，上海不是没有漏洞的聚宝盆，内地现金尽管流到上海，可是积在上海的现金又会运到外国去的。第二，内地运到上海的现金并不能统统流通在市面上；刚刚相反，这些现金往往以库存现金的方式，冻结储藏起来，这样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也就感到不够。实际上，这种通货不足的现象，从上海的信用收缩上已经表现得万分明显。因为银行钱庄对外放款的收缩，在工商业方面实在已有不能周转之苦；换句话说，一般企业正因为缺乏流动的资金跟流通的货币，正象鱼儿出水一样，活活地等着干死。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中国各大都市除了几个滥发纸币的地方（象汕头）以外，至少是患着相对的通货收缩病的。

通货收缩了，结果又是怎样呢？第一，一般工商业因资金不能周转，而加速了破产；第二，一般物价更因通货收缩而狂跌，结果使国内生产大众就更陷于失业和生活困难的境地；第三，通货过份收缩的结果，还根本影响到中国货币的本位，这样又会招致列强对华货币权的争夺，强使中国货币本位的完全殖民地化。下面，我们再分别加以详细的说明。



二、贸易入超与军费膨胀

从前节所论，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是由存银外流，通货收缩开始的。而中国现银外流基本的和经常的原因，就是贸易入超和军费膨胀。我们就从这点说起罢。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关税权是操在列强手里的，当列强猛烈地向中国倾销过剩商品的时候，中国丝毫也不能采取保护税利的自卫手段。此外再加以国内经济的普遍衰落，甚至米麦这类农产品，还不得不仰赖外来的供给。这样，巨额入超就成为中国历年对外贸易最大的特色。1931年以后，入超数值渐趋减少了；可是入超的额数毕竟还是很大（就1934年而论，入超额还有四万九千余万元）。它在中国国际收支上依然是莫大的负担。

不过在过去，中国国际收支史中却有一段“奇迹”，那就是贸易尽管入超，在中国的国际收支上，白银也会是入超的。比方，下面的表，就告诉我们这段值得希罕的故事：

年 别	贸易入超额（百万元）	白银入超额（百万元）
1927	146.9	101.1
1928	318.7	165.7
1929	389.6	164.8
1930	464.4	104.3
1931	816.4	70.8



为什么以往贸易和白银竟会同时入超呢？难道外国货肯白白送给中国吗？不是的。这种同时入超的现象，我们中国人是备受牺牲之后才换到的。因为：第一，列强倾销到中国来的商品，有一部分是作为资本输出的；那就是说，它们把商品变卖为货币以后，就在中国国内兴办工厂或借给政府，来就地搜刮。第二，中国在海外各地——尤其是南洋一带，有成千成万为欧美资本家所称颂的“任劳任怨”的侨民，他们每年总有一批钱汇回祖国，赡养他们的家小。这两种无形的收入就是平衡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就是使白银得有入超的原因。

这种白银入超，从1928年起，特别增多，这是因为当时海外银价开始狂跌，外国白银大批对华倾销的缘故。伦敦的银价从1926年到1931年整整跌落了一半，但是中国是用银最多的国家，国内银价较海外为高，因此大批的白银，就源源从海外流到中国，赚得大宗利益。

然而当世界总恐慌一天天加深，中国的东北四省整个沦落后，前述各种使白银入超的条件有的起了变化，有的甚至消灭。第一，华侨汇款随着华侨经济的衰落，一年减少一年。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估计，1932年华侨汇款有33,000万元，1933年渐减为20,000万元，1934年也不过25,000万元。

第二，近年以来外国对华的投资也减少了。这是因为：世界经济恐慌的加深，使得各国资本家不敢向外多多投资，因为近年来各帝国主义列强对外投资的活动，差不



多已经停止。其次，“九一八”的炮声一面已经搅乱了远东安定的局面，同时又造成了日本的独占，因此其他列强更难对华投资。据中国银行方面的估计，外人在华投资额数的扩充，1933年仅3,000万元，1934年亦不过8,000万元，比较1930年竟减少了60%。

前面我们说过，华侨汇款跟列强在华的投资，对于中国白银的入超，都起很大的作用。现在两者都大大地减少了，因此白银也就跟着从入超而变为出超。中国在1931年还有七千多万元白银的入超，一到1932年，就出超一千多万元，1933年出超一千四百多万元，去年（1934年）再加上美国白银政策，白银的出超竟达二万五千六百多万元，因此，过去“乐观”的奇迹，也不得不象梦样的过去了。

前面提到，使中国存银外流、通货收缩的基本原因，除了贸易入超和无形收入减少而外，还有军费膨胀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据财部本身的官场报告，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支出数有如下表（单位百万元）：

年 度	支 出 数	占支出数%
1928	80	19.4
1929	101	18.7
1930	217	30.3
1931	130	19.0
1932	86	13.3
1933	147	19.2

每年所以会有这样巨额的财政赤字（实际还不止此），原因就在每年军事债务费的开支太大，而且一年大过一



年，这用什么方法来弥补呢？第一，就是靠公开发行债券和债款的收入。（1931年度为13,000万元，1933年度增至18,000万元）。第二，靠无形的罗掘（例如禁烟的烟税等等税收）。而这些债款和特税，当然也与关税盐税统税一样，统统要加在国民大众的肩上，而且一年重似一年。民间的汗血是这样滚滚地流到国家的财库里去，然后再从那儿畅流到海外去。有一部分是以偿付外债本息和公开购买飞机大炮的形式，流到外国的财阀和军火商人手里，这是表现在国际收支的统计表上的。还有一部分则以私下购买的方式飞到海外去，这是一般人们所不能正确估计甚至无从估计的部分。

其次，我们再要说到国内军人在中外银行的存款，以及它和财政赤字与中国存银外流的关系。从前曾有人说张作霖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这话在名词上当然有点混淆，不过它倒明白地指出中国的军人在横行三年五载之后，是最能搜得大批钱财的人。中国财政上连年的巨大赤字，以及还未表现在财部报告里边的庞大支出，一部分就因为军人大事“蓄积的关系”。譬如四川，那儿的田赋最多的已经预征到民国八十年以后，财政与人民的生计一样，竭蹶得无以复加，但是将军司令却大腹便便，而且他们更进一步准备做瑞士或纽约的哈同去了。去年4月，纱业大王荣宗敬从广东回沪，他说那儿的“富有者都迁居香港作寓公”，军老军少自然是其中的少数。这些离国求安的准备，无疑地是要引起国内存金的大批逃亡的。据汇丰银行



总行历年的报告，其存款业务有如下表：

(单位百万港元)

年 别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总 计
1927	386	170	556
1929	434	219	653
1931	558	215	773
1933	666	207	873

总计六年之间，汇丰银行所收存款增加了33,000万港元，其速度实足惊人。它的来源无疑地只有那些罗掘有方的中国军人和官僚。我们还记得1929年汇丰银行曾经宣布某某夫人在一二年间存入七千余万元。1934年报载广州某总司令的太太，因市上发现汇丰银行的伪钞，就仓卒地将留在身边的钞票亲自携去兑现，一次就有几十万元。照最近趋势看来，那些达官要人的资产，现在不大愿意存放在上海，而要直接存到香港去了。所以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是可能减少的，但是中国的军人官僚对该行的存款却在突飞猛进呀。

汇丰银行还不过是个例，实际上中国的军人和官僚，将人民的膏血存放在纽约、伦敦的还多着呢！

固然，私购军火和军人官僚将大批金钱存到国外银行去这两点，并不是新的现象，不过近年来因内战的特别频繁，政治的极度不安，它们的发展确比以往猛烈，因而对于目下的通货收缩的危机，它们确乎尽了很大的力量。



三、美国白银政策的重大影响

使中国存银很快地大量的流到外国去，使中国货币本位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的动力，当然是厉行一年有余的美国白银政策。截至现在为止，我们可以按着它的推程序，以及它在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分成三个阶段去观察。第一个阶段是美国政府于1933年底批令造币厂替代人民铸造银币起，至1934年8月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白银国有令为止，是白银政策逐渐推行的时期。第二个阶段自白银国有令签署以后，至1935年初宋子文氏敦请上海外商银行家订结所谓“绅士协定”止，是白银政策猛烈推行，它的威力十足显现的时期。自那时以后到目下为止，是白银政策依然迈进，而其威力因国内国外的各种关系，好似暂趋和缓的时期，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第三阶段，现在再来作较详细的说明。

美国政府批令造币厂替代人民铸造银币。其用意就在适应银矿大财阀的要求增加白银的用途，提高白银的价格，又便于向落后国家倾销过剩商品，这是后来积极厉行白银政策的开始。到1934年2月，上海方面的银行家曾联名请罗斯福总统，盼望他“采逐步提高方式，勿取突然涨价步骤，以减少中国银币之紊乱”。但是事实上，并未得到何种结果。罗斯福当然不会因为这一纸具文，忘掉了他国



内白银资本家和大财阀所嘱咐他的任务。不过至8月为止，他所采的步骤总算还不十分突然。譬如7月份纽约的平均银价每盎司0.463美元，虽较1933年各月为高，但是仍在1934年的平均银价0.479美元之下。在这儿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那时的白银政策，已使中国金融大受震撼，不过那时中国所受的影响，不象8月以后那样严重罢了。当时中国的存银已经因为海外银价较高，开始向外流出，而7月底上海中外银行存银总额仅较前年12月底增加一千五百余万元，这只是因为农村资金集中城市的过程，更甚于白银外流的过程而已。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情形。

可是到了第二个阶段，情势就不同了。因为美国政府积极收买白银，海外银价也就涨得更快。商人们将中国存银作为纯粹商品运到纽约、伦敦去，所能获得的利润，非常可观，因而白银外流也就分外迅速，分外有劲。

纽约、伦敦银价（每盎司价）与上海中外银行存银消长表：

年 月	纽约银价	伦敦银价	上海中外银行存银指数
1934年7月	0.4631美元	20.51便士	381.94
1934年8月	0.4894美元	21.37便士	334.31
1934年9月	0.4948美元	21.88便士	306.27
1934年10月	0.5237美元	23.58便士	278.85
1934年11月	0.5423美元	24.25便士	246.10
1934年12月	0.5439美元	24.40便士	227.34

从7月起，到12月止，伦敦和纽约的银价节节高涨，上海中外银行的存银也就跟着潮水一样地流出。当时通货



收缩的影响，可以从拆息上涨，债市下落，地产衰落，以及一般银钱业工商业拮据得无法动弹的窘状之中，表现出来。

在10月中旬，财部为了“遏止”此种恶潮，突然颁令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向外狂流。但从前表来看，10月以后，白银外流之势，不但未曾减退，反而继续加甚，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因为当时海外银价还是节节上涨，银贩报关出口，缴纳出口税和平衡税，稍待数日还是有利可图。第二，外商银行家对于平衡税不满，同时财部生怕关税收入减少，迫得它不能将平衡税对策如实地履行起来。现将10月至12月这三个月中，平衡税不曾十足徵收的差额百分数，列表如下，以供参证：

月 别	应征而未征之平衡税率%	
	最 高	最 低
10月	18.00	1.94
11月	11.65	4.76
12月	9.89	3.59

所谓平衡税既然不曾发挥其平衡的作用，那么在海外银价日趋高涨的条件之下，白银继续猛烈外流，自然是应有的现象了。在平衡税法令分布以后，还有一种现象与中国通货收缩有莫大的关系，那就是白银的偷运。白银偷运之风在1934年上半年就有，不过到了10月下旬以后，才大盛起来。10月以后，白银的外流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条是经过厦门、广州而到香港，一条是经过汉口、天津而往大连。



这两条路线的偷运，动辄数千数万，统计起来，一定大可惊人。这些偷运的人们所以能够这样自由自在地去干，主要是因为外国的炮舰能在我们的沿海内河直航。中国的存银，就在海外银价高涨不已和公私夹运的条件之下，急湍似地流出去了。它直接促进金融恐慌，间接加深一般产业的危机。

现在我们再说到第三个阶段。美国对于白银政策的推行，今年八九月来并未稍止，4月10日和25日两次提高银价的果敢行动，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最近纽约银价虽然稍有上落，但一般总在七角左右，较去年又高了许多。不过从上海中外银行的存银而言，最近八九月来却无多大的减少。因而有些人说：“严重时期似已过去”。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中国存银自去年一年继续不断地大批外流后，已经到了相当枯竭的境地，外商银行的库存更有此感，所谓“绅士协定”云云，实际上就因为外商银行存银无几，给中国当局一个人情罢了。第二，上海存银的统计，本来只是一种“不求甚解”的东西，纸面上的报告是否真正可靠，照目下情形看来，更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同时华北天津一带，白银还大批地私运出口，不过因为无从统计，也就不觉得可怕而已。

四、工商衰落与通货的相对收缩

贸易入超，军费庞大以及美国实行白银政策，这三种



动力，使中国存银不断地外流，这对于中国的金融的威胁实在够严重了，然而问题之严重还决不止此。我们在第一节里曾经提及：农村资金集中在各大都市，而这些资金又完全冻结在大银行的库房里面。这种冻结的现金对于一般工商业绝少周转的作用，实际上等于流出，因而问题也就格外严重起来。关于这一点，谷春帆先生曾有很具体的说明。他根据《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一书，观察26家华商银行的库存额和放款额的消长，并列成下列一表：

年 别	库 存 额 (千元)	库存额 比 数	存款额 比 数	库存一元应摊放款数 总计 (元)
1929	139,522	100	100	8.75
1930	156,480	112	116	9.10
1931	194,281	139	131	8.25
1932	253,352	182	136	6.55
1933	305,136	216	166	6.65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极有趣味的现象。历年来的库存额和放款额数都是增加的，不过后者没有前者那样增加得快（前者五年间增加116%，后者仅66%），因而库存一元所起的放款作用，就一年低落一年，五年间从八次的机会降为六次的机会。这就是表示银行库房中的存银，渐渐离开工商业活动，变为呆滞的死物。

同时谷春帆先生又用银钱业的票据交换来代表金融周



转的速率（因票据主要乃由工商界的买卖引起来的），指出银钱业的放款本身，在市面上的流通速度也在逐年减少，请看下表：

年 别	票据交换额比数	放款额比数
1929	100	100
1930	128	116
1931	160	131
1932	105	136
1933	82	166

从这表我们可以看出前后不同的两种倾向：即在1931年以前，少数的放款因周转灵活能够做到多数的交易；1931年以后可不同了，较多的放款却只能做较少的交易。无疑地，这是因为它的周转速度滞减的缘故。

此外，通货冻结的现象，我们还可以从近年来银行方面的存款业务来观察。今举中国银行为例：

1931—1934年中国银行存款比较表（单位千元）

年 别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同业存款
1931	243,560	174,242	44,853
1932	183,601	234,632	58,314
1933	189,769	211,200	183,314
1934	182,856	251,884	111,953

第一，活期存款一般地在不断减少。这是表示工商业的衰落，以及他们手头游资的枯竭，因为活期存款的主体多半就是商店厂家。第二，同业存款去年突减七千余万，这表示同业间借贷关系减少，同时也就是反映一般工商业



的交换衰落。第三，定期存款的继续增加，是表示富有的人们因工商业破产，投资太不安全，因而只想用定期存款的方式获得较多的利息。这是资金冻结的另外一个证据。

其次，我们再来观察近年来该行放款性质的变化：

1931—1934年中国银行放款业务比较表（单位千元）

年 别	活期放款	定期放款	贴现及买进期票
1931	110,696	188,235	35,006
1932	99,417	189,437	34,063
1933	125,844	189,183	36,405
1934	184,187	197,761	30,003

银行放款和存户存款处于相对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定期活期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譬如就放款来说罢，银行方面是愿意活期而不愿长期（即定期），因为目下工商业这样萧条，经营长期放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近五年来，活期放款大见增加，而定期放款则所增无几，对活期放款的猛增而言，实是相对地减少了。1934年贴现和买进期票的减少，又是表明工商业的往返十分萧条。从这些不同性质的放款业务上看来，信用收缩、通货呆滞的暗影，人们大概是很明白了罢。

就是因为信用收缩、通货呆滞的缘故，目下上海中外银行库存虽还较1931年的多过将近一倍，市面上却仍然感到通货极度收缩的痛苦。此种相对意义的通货收缩原是工商业衰落的结果，不过到了现在，它又反转来加速工商业的破产和促进中国货币本位的危机了。



综上所述，中国通货的收缩，是在绝对和相对的两重意义之下，成长和加深起来。目下它正随着经济恐慌之后，使国内的物价越加狂跌，财政越加支出，工商业越加没落，而且更进一步造成中国当前十分严重的货币本位问题。而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利用中国当前的难关，争夺中国的货币权，这必将促使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和加深殖民地化。



「中國要信倒反共制高生」！造成了日下中國「全民」的問題——問題要到了要人應付的地步！全民二字用的話，有錢的人要了解這個問題，藉款可以在穩妥的安排他們的錢財，也許再可以來博擲一點進財，沒有錢的人也去了解這個問題，因為這影響他們的吃飯問題。有點理想的青年們要了解這個問題，因為這和民族解放的前途，有深切的關係。

新加坡是抗共救國問題的重要，我教寫一本小冊子。幾經有答應了，然而畢竟是因為時間分配不出，不能不另外請幾位朋友幫忙。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幾位僑胞和抗共白二對寫的；第二章是材料寫的；第三章是幾位記者寫的；第四章才是我寫的。寫法仍是分工，而編製和內容，我們却都已經事前商量妥協了。所以，我包那中間不敢有太多的矛盾。

大體，這本問題固然是「全民」的問題，而這本書，未必能均供「全民」的緣故，我們對於有錢的人應該如何安排他們的錢財一點，是比較忽視的；對於沒有錢的人的吃飯問題，和有些理想的青年們的民族前途問題，比較說得重一點。

06382

伍乃謙 44.10.26



工业日本与农业中国*

一、“友邦”寄给我们的“贺年片”

“友邦”很讲“礼义”，在去年年底，他就关照他所御用的电通社发一个“贺年片”给我们。在那张贺年片上，他曾告诉我们一个可喜的消息，就是日本外务省已经决定把对华的文化事业费，由每年600万元增为700万元，借以更积极地来促进华北农民的“更生”；第一，它要在华北设立农事试验场，指导“更生”的具体计划；第二，为了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能有确实销路，“更生”的对象暂以日本所需要的棉花和羊毛为主……总括说一句，就是用日本的先进技术来“帮助”开发落后的华北农村，造成“工业日本与农业中国”的亲善集团！

但是载着这样“亲善”的消息的贺年片，对于我们已

* 本文原载于《中国农村》第2卷第2期，后收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三集。



经不能算是很新的东西了。因为就在去年，我们也曾收到同样的礼物，不过是在旧历的年初。当时（1935年2月13日），日本外务省听了刚由上海归国的横竹商务参赞的报告以后，就决定提出“中日经济提携”方案；这方案的主要内容也是“对中国之农业方面，予以技术的援助，奖励中国棉花之大量生产，由日本大量购买之”。而且就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止，国内中外各报，还不断地披露日本军部和外务省迭派经济调查团到山西、到绥远，以及“兴中公司”和“中日贸易协会”搞怎样成立起来等等的情报。试问：我们的“友邦”这样“多情多义”，念念不忘，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去年旧历年初，日本外务省将那第一张贺年片寄给我们的时候，国内曾有少数权重位高的伟人，以为“中日经济提携”是完全“互惠”的方案，中国并不会损失什么。去年七月间，前行政院长汪精卫氏接见日本记者的时候，就公然承认这种说法。他说：“中日两国不仅在地理上人种上有其密切的关系，就是在经济上也有合作的必要，因为用日本的技术来开发中国的富源，是与中日两国都有利益的工作。”有的甚至提出比这还要乐观的解释。以为这是日本帝国“悔过自新”的表示。他们说：日本自以武力霸占东北以后，不论在国际关系上，国内财政上或是对东北本身的统治上，都感到不合算和威胁，因此他不得不改弦易辙，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亲善”政策来。“敌乎？友乎？”的作者徐道邻先生，就是在事前



指出这点，“警告”日本快点伸出友爱之手来的“预言家”，然而这种说法，除了表示自己害着严重的丧心病狂症，或是代表某一阶层有意欺骗大众以外，是不会再有更多一点的意义[

固然，日本自以武力霸占东北以后，也有不合他的愿望的。英美因为他在东北的独占行为而对他加深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他积极防范起来，这些是他原来预料得到的。还有他国内的经济恐慌和财政危机，原想在霸占东北以后就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他国内根本矛盾依旧，东北在义勇军抗击之下，对他也有阻碍，所以他国内经济依然陷在特种萧条的泥泞之中，财政赤字也因东北的军务费和开拓费而节节增高了，这是他所意料不到的。但是，他为了排除这许多障碍，再也不会象无耻汉奸所说的那样，来什么“悔过自新”，而是更进一步地来加强他的军国主义政策，兼并整个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当他开始向这第二步迈进的时候，所以同时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来，一方面是要利用当时“徐道邻式”的中国外交路线，来替他宣传“友邦”之爱，麻醉一般大众的抗日意识；另一方面是更主要的一面，就在企图将东北方面所发生的各种阻碍迅速地克服下去。

总括一句，日本提出“工业日本与农业中国”这个口号，在现阶段的意义，是以比较“九一八”时代稍有不同的手段，将整个华北变为他的殖民地，一方可以补偿国内金融资本家的“夙愿”，使国内经济恐慌和缓下来；同时



使他对英美列强以及社会主义苏联更有战争的力量，藉以完成东亚霸主的野心！

二、日本的大炮和华北的富源

我们这样论断，完全有现实的根据。这可分成两部分来说：第一，华北在其地理的经济的条件上，恰巧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渴望的殖民地；第二，他又是用那不折不扣的殖民化的手段来开发我们的华北。现在我们且先看第一点。

日本为了独霸远东，排挤英美，反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仅仅霸占了东北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走第二步，夺取察绥宁夏乃至整个的华北，才能相当威胁外蒙和截断西伯利亚铁路的中部。另一方面，当太平洋大战爆发起来的时候，他也必须攫得整个的华北，才有比较完善的陆上根据。这是从地理形势上所做的观察。至于从经济来看，华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目下所必争的肥肉：

第一，华北有广大的棉田（主要在冀鲁两省），其产量占全国60%以上，这是东北所不能够大量生产的；

第二，华北有优越的畜牧区域（主要在晋察绥三省），全年所产羊毛占全国90%以上，这几乎是东北所没有的；

第三，华北还有占全国总产量50%以上的小麦，和占全国总储量80%以上的煤矿，这虽然是东北所有，但是感到



异常不够的。

至于华北这些产物，就日本本国而言，都是无法生产或是不能大量生产的必需原料。固然，日本是世上最大棉纺织业国家之一，在过去两年间，他的棉纺织品已在南洋、印度、非洲乃至整个世界市场上与英国的曼彻斯特正面冲突起来；但是他为了棉纺织业的原料——棉花，却不得不向英属印度和金元王国叩头。为了羊毛，也不得不同英国去争夺澳洲的资源。至于他想在食粮方面或是重工业方面有所活动，也是处处要受英美的控制。尤其当这大战的前夜，列强备战空前猛烈的时候，他的各个经济部门这样不能自给自足，这使日本帝国主义所感到的不安自然更加厉害。过去他是想靠着东北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四年来的东北并不能满足他的这些要求。因此，华北的棉花和羊毛等等，就深深地打动了为进一步掠夺的野心了！

那末，日本帝国主义用怎样的方法来攫取这块肥肉呢？那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比较隐蔽的使华北殖民地化的方法。我们晓得，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建筑在不曾完全成熟的金融资本之上的；他主要还是靠分外野蛮的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来生长的，而在现阶段（即大战前夜的阶段）更以战争准备战争为其特征，这在本次华北经济的开发中也充分表现出来。我们不妨把它分作三个段落来回顾一下：

第一，在去年上半年，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主要还是作为一般的方案，在中日朝野之间起蒙蔽人民的麻醉作用。同时，土肥原将军也还不过用那贪婪无厌的鼻子嗅



遍了华北华南和华中。可是到了第二个段落，即到了五六月间，河北事件和察哈尔事件被土肥原将军无端煽起，二十九军撤退河北，华北战区从冀东伸至察东以后，情势也就一变，即一般的“中日经济提携”，推演为更具体的“开发华北经济”了。为了这，他们曾迭派专员调查晋绥的矿藏和羊毛，并在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协助之下，成立了经常的调查机关。同时，在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协会”，“东亚惠通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等组织，又以买办或经纪人的姿态纷纷成立起来，“引导”日本军阀财阀来开发华北。因此，华北经济的殖民地化，就急速地具体化起来。

但是我们晓得，“华北独立国”假使不能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财政赤字与日俱增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来“开发”华北的棉田和矿山的。所以土肥原将军接着又更积极起来导演华北自治的怪剧。到了去年11月底，这幕怪剧已经相当完成以后，华北经济的开发也就随着进到第三个段落。酝酿已久的“兴中公司”——满铁会社开发华北的前锋，遂于去年12月20日在大连开成立大会；同月“满蒙毛织会社”决定在天津张北等地设立分厂支社，满铁又在天津设立主办华北水利铁道的“福昌公司”。本月10日天津来电，又说山西“大同矿业公司”和“西北实业公司”的经理，已被满铁邀来天津，商谈该省矿藏的开发。日本在华纺织业领袖津辰一郎，也由东京返华，准备在津青济三地作大量投资。总之，日本军阀财阀对于华北经济的开发，



已经随着他们在华北的军事胜利而节节前进了！

这样看来，日本在这时提出“工业日本与农业中国”的意义，无非要将华北首先变为他的原料供给地和国内过剩商品的独占市场，使他能与英美争霸，这完全是以日本为本位的殖民地政策呀！

三、互惠呢？还是侵略？

然而国内竟还有许多无耻学者，硬要把敌人说成朋友，把侵略说成互惠，以掩饰他们自己的罪恶！有些人现在还这样辩解：“日本派员研究并指导华北农民种植棉花，同时他又担当收买的责任，在经济上总有真正互惠合作的意义的”。然而，我们应当拆穿“担当收买”这四个字的实际作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对于山东、安徽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烟叶，很多年前就负起“包买”的责任。他起初用资本的力量将其他收买烟叶的商人打倒，或吸收了来做他自己的掮客；然后就用一致的低价强迫农民出卖。农民第一因为穷，第二因为烟叶市场已被“大英公司”垄断。就把烟叶挑回不卖，也不能够把它烧来当饭吃。于是，种烟农民就被这个“包买”剥削得只剩一身的皮骨了。

日本商人早在去年以前，对山东、河北等地的棉农玩过这套把戏。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从事“复兴”农村工作，办理合作社的人们，在客观上都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来用“统制”的市价“包买”棉花。上海各大银行领导



下的河北棉业改进会实施河北棉花五年计划，自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欢迎的“农业中国”工作。

在土肥原将军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相当完成以后，日本的财阀就可不必借助经济力量，而直接利用政治力量来完成“担当收买”的工作。东北的伪满成立以后，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满洲棉花公司”就用“统制贸易”这种口号，强制地垄断着东北的棉花市场。现在东北的各种农产，无论原料或是粮食，都已经在“统制贸易”政策之下全部受着日本财阀的支配。他们非但替日本工业保证廉价的原料，还要利用这种垄断地位来实施更残酷的剥削。在粮食收获的时候，他们就用最低廉的价格来收买粮食；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又用高价来把贮存着的粮食卖给东北农民，这样酿成了去年极严重的“春荒”。这就是“农业中国”的最好的榜样！

“农业中国”的内容还不止此！譬如说，日本帝国主义运用经济政治的力量，将棉花“包买”到手以后，到了必要的时候，就可将棉花市价任意提高，使中国脆弱的民族资本纱厂买不到便宜的原料，不能够同日厂竞争。譬如去年，上海三十一家华商纱厂有六家倒闭，武进和无锡各有三家，青岛、芜湖各有一家；而在华日厂却能日夜工作。将来华北棉花如果根本由日人“指导”开发，那末民族纱业也就只有完全毁灭的希望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贯的政策，是要使整个中国变成一个专替日本工业生产廉价原料的农场，由于这种廉价原



料，再加上日本国内乃至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他们的纺织工业可以去同英国争夺南洋群岛、澳洲以至印度和非洲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垄断中国的煤铁生产，并摧毁中国的各种民族工业，来使整个中国变成销纳日本过剩工业品的广大市场。所谓“工业日本和农业中国”他的全部意义就是这样！

本文作于1936年1月18日



惊动全球的华北走私问题*

《字林西报》特约记者5月2日天津通讯：记者曾与新自北戴河返津之某商人谈及私运事，据云：“余并未见私运情事，所见者只有各式船只38艘，停泊于北戴河海湾，用舢板多只，却运货物至海滨起岸，其忙碌情状正不减于货运繁多时天津外滩各码头。君不能再称此为私运，因其实为自由贸易矣。就目下之情形而观，不仅北戴河为自由贸易之口岸，甚至其沿海一带，亦均自由开放也。”

到现在为止，关心华北走私问题的已经不仅仅是直接负责应付的政府当局，亲自受着私货压迫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各个阶层里面热心救亡运动的爱国同胞，而且已经惊动了世界列强的执政者，尤其是大不列颠的朝野。华北走私问题所以会发展成为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对内又是全民

* 本文在1936年第4卷第6期的《世界知识》半月刊上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三集内。



性的问题，决不是由于少数人或一部分人主观上的夸大，而是因为它在客观上确实包含着许多可怕的因素，而且一天危迫一天，使我们不得不加以全面的注意。现在为了挽救整个民族的危机，我们对这个问题需要加以充分的和深入的探讨。

首先，我们想对华北走私作一个史的观察，指明它的严重程度，以及它的影响，然后再来讨论对付的方案。关于这一部分，有一点是我们最不应忽视的，那就是华北走私的开始和发展，是跟近年国难的加深以及外交上的种种失策节节相应的。譬如在四年以前，因为东北沦亡在敌人之手，而当局又不起来武装收回，人造丝和毛织物这类奢侈品的偷运便接着在华北登台了，不过当时还不敢横行无忌。到了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走私因有冀东战区为其大本营，来势更猛烈起来，对于缉私关员竟敢加以公然的抗拒和殴辱。不过华北走私竟然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注意，那还在去年（1935年）8月以后，因为当时于原有的“塘沽协定”以外，又补订了“何梅协定”，使华北战区范围格外扩大，同时也就是使私运格外自由和广泛。等到冀东伪组织与“冀察政务委员会”两个傀儡政权相继出现以后，就连走私这两个字本身也很难适用于华北了，因为从大连、营口来的私货可以公然在北戴河、秦皇岛起岸，并可自由运抵天津，这样就难怪从北戴河回到天津的一位商人要告诉《字林西报》的记者说：“余并未见私运情事，因其实为自由贸易矣！”



现在我们来看看华北走私的惊人的具体数字吧。据海关所发表的报告，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25日，由冀东战区转入天津的私货如下（单位包）：

	人造丝	卷烟	匹头	白糖	其他
8月	3,052	226	—	—	—
9月	4,020	510	680	—	—
10月	3,978	842	2,609	4,410	329
11月	11,063	1,041	2,265	1,859	993
12月	14,674	424	1,055	71,529	416
1月	5,082	252	944	65,143	185
2月	1,262	561	1,151	40	428
3月	63,039	1,812	4,796	10,975	1,193
4月	23,447	507	7,631	208,601	7,503
合计	89,617	6,171	21,131	479,296	11,052

从这表我们可以明白看出，华北的私货正与天津的日兵一样，正在那儿不断地增加，而且愈来愈多。同时我们还得深深注意：这滚滚而来的私货几乎畅达地由天津而遍及全国了！西北因为无法缉私，人造丝、白糖这类私货得以蔓延，是用不着再说了。现在就是直通国都的京沪线上也充满了私货。据1936年5月19日南京专电所传，其被缉获的就有数十起之多。此外比较小的县份，也有私货出现，例如江苏北角的沛县，素称交通梗塞之区，然据5月12日该县通讯，近来却有许多远道小贩，肩负着人造丝织品兜销，每匹十元，比市价便宜一半。从这里我们又可看到私货的无孔不入。这样，就难怪华北走私要成为举世瞩目的非常问题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地来考察一下：这日益猖獗的走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大家晓得：我们的“友邦”这样热心偷运私货，并运用各种方法把私货倾销到内地去（这里我们要同时注意“友邦”在华南方面的走私活动），是抱有很大野心的。它不仅仅是为了关税上的一点点便宜，而是想根本推翻华北的海关权，使华北经济更露骨地殖民地化。换言之，它要借走私漏税来动摇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借私货倾销来摧毁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以期压迫中国政府屈服，来接受中日“满”经济同盟的全部计划。这些阴谋，东京的御用报纸几乎是公开宣传的，它便是广田三原则的侵略精神，现在幸赖“友邦”驻华军人数月来的努力，已经很有成就了。第一，据海关当局统计，自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因受华北走私影响，中国海关税收已减少2,556万元（统税因华厂出品被私货压倒，亦显著减少），使南京当局和英美列强都感到很大的威胁。因为中央税收40%，和偿付外债本息基金90%皆有赖于关税收入。英国驻华专使罗斯爵士因不胜其威胁，且于四月底兼程北上，和华北日当局磋商妥协办法，并提出减低中国关税的具体条件。第二，一般工商业者因经受不起私货倾销的压迫，也悲惨地从国内市场上相继败退下来。关于这点，我们愿意多举一些实例，使一般工商业者对于当前的困难，能够有一个普遍的切身的认识：

第一，糖业方面：据上海该业同人说，华中和华北所销用的糖，有洋糖和粤糖两种，全由上海进口，一般市价



(连关税在内)为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和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全为私糖所霸占，京沪一带亦大受影响，上海六十余家糖行都有停业之虞。据4月18日《时事新报》所载：“金利源码头，公和祥码头等处堆栈之华糖，均无法出清。”

第二，人造丝业：据上海该行同业公会报告，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在去年有兴昌、鼎源等二十一家，丝织机数计达二万部，现仅留六七家，机数三四千部，这主要也由于私货倾销。譬如从天津运来的绉葛绫，每匹（计18码）只售3元至4元，而本埠厂家所出的，其最低成本就要合到6元，这样就难怪后者只好关门大吉了。

第三，海味业：据上海海味业同业公会主席葛维庵氏谈，华北一带的海味销路，远在“九一八”之后，即为某国进货所独占，现在走私扩大，上海海味在徐州以北的销路已告绝迹，长江一带的市场到下半年海味旺月以后，亦必为私货所侵夺。上海的海味业，目下亦已受到陆续运来的私货的打击。

此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则早已受到私货的迫害，这在天津方面尤其表现得明显。至于内地的手工业者以及一般商家（假使不甘当汉奸，贩私货）所受私货倾销的摧残，自然比城市里的大企业更难承当。从这些具体的事实教训之中，全国民众尤其是一般工商家，实应彻底醒悟：走私是摧毁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最毒辣的手段；主持走私的，是我们应该一致反对的敌人。



※ ※ ※ ※

那末，我们该怎样来进行我们的反抗呢？敌人的阴谋计划是快要全部实现了，我们还能再迟疑片刻吗？

然而事实上，政府当局对于这日益严重的走私问题，和过去对于其他各种中日外交问题一样，自始即未采取坚决应付的办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譬如3月18日，津海关与北宁路局在财、铁两部的策划之下，公布了北宁路在天津东、总两站协助海关查缉洋货暂行办法，共计六条，其内容是：凡是没有报过关的洋货（即私货），路局得让其补报，否则拒运。一望而知，这办法已是大大的让步，因为它已承认秦皇岛乃至天津是日人的自由港，在那里我们不能征收应征的关税。同时这办法又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为财、铁两部明明知道北宁路早已随着冀东伪组织和“冀察政委会”的成立，而落在敌人控制之下了，哪里还敢执行上面的命令呢？再如4月27日，政府当局又开始实施另外一种“有效办法”，即于津浦线的沧县，平汉线的长辛店，增设新税卡，同时又于津郊南北运河和子牙河汇合处添设检查所，以期从水陆双方来堵止私货，但是打开地图一看，这里所谓“有效”，只是对走私作更有效的让步，因为这个办法主要是由傀儡政权“冀察政委会”发动而经中央同意的，它使私货公然活动的范围更从冀东伸展到津浦和平汉线上来。同时堵止私货南下，还是不能有效，最近，中政会又通过了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财政部又接着公布了稽查进货章程。条文不可谓不严厉和不周密；但



是谁都知道：中国海关的缉私制度，靠了英人的策划，其严密“已堪与世界列强媲美”，而华北走私目下还所以那样猖獗者，是因为我们的“友邦”竟运用更强的武力来策动走私，并驱使冀东和冀察两个傀儡政权来替它助长走私。所以这次的条例和章程，无疑地将与过去两次的对策一样无效。固然，我们并不否认以往和现在政府当局所苦苦计划出来的缉私、防私等办法，是可能发生一点作用的，同时也是应该提出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于敌人前前后后的各个方面的侵略行为，我们要彻底地给以正面的反抗，这样，前面那些辅助的缉私、防私等办法才能发挥它们可能的辅助作用，否则，就是空话。这是负责当局应该深深反省的！

说到这里，我们务须谈一谈减低关税的主张。因为日本军部这次主使华北走私的借口，是我国关税税率太高。英国方面为了想对日妥协以保全自己的种种利益，就派遣其驻华专使罗斯北上对日提出减低关税的意见。但是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这是应该加以勃然的反对的。因为以较高的关税率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何况我们的关税税率，因过去种种束缚，还比世界各国的低许多。所以我们有权要求当局彻底拒绝这种减低税率的自杀办法，要晓得走私是敌人无耻加残酷地侵略中国的一种方式。所谓“中国关税过高”，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借口罢了。即使税率一度减低以后，“友邦”还是要秘密输入“国货”的，它非使华北经济完全殖民地化，



使中国完全接受中日“满”经济同盟的方案不可。所以，同意减低税率，便无异自杀！1934年7月新税则颁布以后，对日货税率本来就已经大大地减低了，然而其结果仍是今日如潮如涌的走私，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

现在全国民众都在沸腾、怒号之中，大家都期待武装抗敌！这是必需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譬如拿眼前的走私问题说吧：华北走私所以会一天猖獗一天，它全是因为我国丧失了土地和签订了“塘沽协定”。目下政府所提出的各种缉私法令先后皆归于无效，也是因为不能建立起彻底的抗敌外交，这些在前面都用事实来说明了。所以，真正有效的缉私方法，与真正有效的救国对策一样，只有以暴力制服暴力。

目下，上海一般工商业者，因为如前所述，亲身受着私货的打击，也痛感到困难的严重了，并起而共谋救亡之道了。连日来要求严厉缉私的有下列几个团体：

1. 华商纱厂联合会于1936年5月7日电请中央严厉缉私；

2.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于1936年5月8日开会，电请中央严厉取缔走私并维持原定税率。该会钱承绪先生并提出联业统制，各业统制，地方统制等具体办法；

3. 中华国货维持会于1936年5月12日举行第二次执监联席会，即电请中央严厉缉私；

4. 电机丝织厂业同业公会亦于同日召开会议，电请中央采取有效办法缉私并维持原定税率。



此外总工会和糖业海味业等亦有同样的要求。市商会更于1936年5月16日分函全市各业公会，征求具体的缉私、杜私方法，棉布业公会且即于20日函答唯一有效的杜私方法，在“团结商民拒购私货”。

这些表示，固然是很可喜的现象，然而可惜的，是他们对敌人的走私仍没有彻底的认识，仅只要求用头痛医头的方法，空口喊叫“严厉缉私”，而没有坚决的行动。

从上述那些事实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一般工商业者还依然没有奋起拒购敌货，维护民族工业的决心。

※ ※ ※ ※

最后，我们还要揭露一种有害于救亡运动的幻想。自从华北走私于四月间特别猖獗以来，英美列强也被惊动了：英美驻日大使都正提出抗议或诘问，比、德、荷、法等国亦非常焦急。因而国内就有一部人幻想英美列强会与日本冲突起来，于是一方养成机会主义的等待心理，同时就减弱自力的抗敌精神，这是应该加以严厉的批判的！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英美列强这次反对华北走私，是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保全英国在海关行政上的统制权和英美在华北的煤油市场，还有最重要的即保全原有的关税收入以偿付外债本息，并非为我国存亡打算，我们且问：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给我们利用？固然，自华北走私特别猖獗以来，英、美、日（尤其是英日）之间的冲突确是比较显著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掉太平洋上列强对立的基本形势，即第一，美国因路途遥远，在军事上还很难



驾御日本；第二，英国因苦于欧陆问题和地中海问题的应付，在远东只有与日本攀老同盟；第三，英美是帝国主义，它们联合制日是很少可能的。因此，期望英美列强怎样积极起来干涉“友邦”走私，是没有现实性的。譬如上月底罗斯爵士兼程北上，只是向驻津日总领川越氏提出减低中国关税的折冲办法，这是损害中国，以利日本，而保全他自己，就是英国对于华北走私问题的基本态度。克莱武之对日诘难，乃至目下罗斯之鼓励南京当局进行缉私准备，主要那只是虚张声气，使前面的妥协方案容易得到日本军部的垂许而已，所以我们要彻底解决走私问题，不能幻想英日的冲突，只有依靠自己真正抗敌自救啊。

本文作于1936年5月24日



中日经济提携*

“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公开地、意识地提到中日外交的议事日程上来，到现在差不多快有两个年头了！一开始我们就晓得它是一块有毒的饴糖，吃下去不特中国的下层大众要被毒死，就是一般民族工商业家也要性命难保。不幸的是两年来的事实却正中我们的断言，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现在不是已经奄奄一息了吗？然而更不幸的是两年来的事实教训还不够惨痛，直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有少数人士和当初一样，相信“中日经济提携”是使中日经济“共存共荣”的方案，甚至进而鼓吹另辟蹊径，于英美资本之外，更吸引日本资本来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建设！我们现在愿意根据国内外的客观情势，对这问题加以严正的、周密的观察，促请他们注意：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日本帝国主义总是中华民族不能丝毫亲近和宽容的最大敌人，同时使一般同胞更能迫切地执行民族抗战的任务！

* 本文原为钱俊瑞主编的《黑白丛书》第2册，1937年3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这本小册子要切实讨论到的方面是：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淞沪、热河、长城等处强暴的军事侵略之后，为什么要积极地提出“温和”的“中日经济提携”的方案？这方案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中，究竟占了怎样的地位，起了怎样的作用？第二，日本帝国主义怎样推进这个方案？在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碰到了什么困难？日本军部与财阀间对这个问题可有什么矛盾？列强与中国当局对这个方案又起了如何的反响？第三，在过去两年中，“中日经济提携”有了怎样的结果？中国的人民大众和一般民族工商业家所受到的是幸福还是祸患？第四，在日本内阁这次改组以后，“中日经济提携”会有怎样新的姿态？利用日资建设中国国民经济是否可能？我们现在就根据这样的程序，提供我们研究所得的若干结论，作为全国上下考虑对日问题时的一种参考。

第一节 “中日经济提携”的诞生

1. 二十一条与往日的经济提携
2. “中日经济提携”诞生的三大原因
3. 一块“以华制华”的有毒的饴糖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不过过去的历史可以作为后代的教训的地方倒是很多。我们现在且先举一段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来帮助说明“中日经济提携”的诞生。

早在1915年，中日外交上曾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件，



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于当年5月9日提出二十一条条件的最后通牒，限中国当局于当日下午六时前作肯定答复，否则即采取最后的必要手段。结果中国当局竟不顾民族的生存，全盘接受了下来。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因为二十一条的内容全是侵害中国的主权的，对日就立时燃烧起一阵仇恨和反抗的怒火；英、美、法诸列强虽然受着欧战的牵制，但是对于日本的这种猖獗行为，心里总是非常妒忌。这两种情势对于当时的日本是大大不利的，它非设法扫除不可，那怎样扫除呢？最合理的方法，当然是日本自动撤消二十一条的要求，然而这是靠侵略中国为生的日本所万难办到的，所以它又非另觅途径不可。那末它所觅得的又是什么途径呢？我们且让当时的日本执政者自己来说吧：

“寺内内阁最初之试验，即为对华政策之变更是也。大隈内阁之对华政策为有名之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谓其侵害中国主权，惹起非常反抗……列国中，尤其美国，深信‘此即日本侵略中国之恶魔手段’，强烈加以攻击。寺内首相组阁匆匆，夙夜焦思，务扫去此种误解……于是予说首相曰：‘干涉中国主权，虽宜避免，惟中国之经济的开发，不特为中国之利益，亦为列国及日本的利益，日本对此不可不着先鞭。’（见寺内任内日本藏相胜田主计所著西原借款真相）

这就是说用隐讳的“经济开发”来代替暴露的“二十一条件”。日本对华政策这样的转变，在当时究竟起了如



何的作用，胜田主计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说：

“……寺内氏起而组织内阁，以对华经济发展为一大政纲，以期实现中日经济之提携，因此该内阁存立中，帝国所获之权利，远过前代，乃于对华关系上画一新纪元。”

（同前）

这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开发”或“中日经济提携”帮助“帝国”从我们中国携去空前的权利，它的侵害中国并不下于“暴露的二十一条件”。

当然，这是过去的事实，不过它能很讽喻地显示出：相隔二十年以后（！），即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军事侵略之中，忽然又唱起“中日经济提携”的调子来，到底是怀了怎样的心愿呢？它可能产生的真实结果又是什么呢？两者前后虽然相隔二十年，但在许多方面确有类似的地方。

现在就来让我们看看这新的“中日经济提携”是怎样诞生下来的吧。

我们晓得，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的激变，揭开军事侵略的序幕以后，它的铁蹄曾继续蹂躏上海，并进而霸占热河和长城各口，直到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才告了一个相当的段落。固然，自“塘沽协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华北并未完全放弃它的军事行动，不过和“九一八”时代相比，在许多场合毕竟只是一种威逼利诱的陪衬手段了。比如1934年下半年为了华北的通车通邮问题（实际等于承认“满洲



国”并将华北的一部分主权割让给日本的生死问题），日兵在北宁路沿线的出动确是非常频繁和紧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达到最后目的的手段，在当时毕竟是着重在与中国当局的“外交谈判”。我们认为“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本侵华政策这样地转变（即只以军队作后盾，以战争相威胁，与中国当局进行外交交涉，使后者屈服其要求），可以作为“中日经济提携”方案的先声和基础，因为“中日经济提携”将如后面所说，不是别的，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新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罢了。

“中日经济提携”正式出现于中日外交的议事日程上，是在1935年一二月间。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换上这副“亲善”的面貌，实际并不是放弃或和缓对华的侵略，恰恰相反，是为了加强对华的侵略或使侵略本身更能生效。这从当时的三种客观情势推断就可以明白。现在分述于后：

第一种情势是属于国际方面的——我们晓得自1931年—1933年间，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也和过去的二十一条一样，在国际间曾激起极大的反感，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尤其反对得厉害，前美国国务卿斯汀生就是主张联合国联，对日制裁的健将。不过法国特别是英国，在当时却暗中支持日本的暴行，反使美国陷入孤立，所以日本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上还感觉不到1915年代的那种威胁。可是自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长城以南侵入以后，这种有利于日本的局面就渐起变化。因为英法两国，过去在实际上同意于日本侵占



东北，主要是希望他以东北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而不希望他再向南侵入。现在的日本既然避实就虚，专向好欺的中国乘势推进，他们当然要踌躇起来了。1934年日本外务省的天羽声明，以东亚主人翁自居，排斥任何国家投资中国，自然更刺痛了英帝国主义的心。固然，大英帝国并没有因此而即放弃它的联日以制美的传统政策，但是国内反对的呼声确比以前高昂。例如1934年11月斯默兹将军（南非联邦首领）在皇家国际协会的公开的演辞中，就坚决指明“在我们大英帝国的未来政策中，对美国关系一定要比对世界任何集团为密切”，并说“自治殖民地亲美的倾向更甚于亲英”。同月东乡勋爵（Lord Lothian）也说：“如果日本领袖采取军阀的政策，那美国与大英帝国的联合以抗日是绝对当然的事，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美国是不用说了，他对日作战的准备是一天积极一天，美国的军事专家密采尔团长同年十月在联邦航空委员会演说：

“日本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们的飞机应当准备去攻击它！”在这种新的局势之下，日本帝国主义虽然不曾放弃田中奏折所规定的大陆政策的迷梦，但是在口头上总不得不对英美一再宣说“日本对华北绝无领土野心”，事实上也不得不稍稍缓和华北方面的军事侵略。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要宣扬“共存共荣的中日经济提携”，一部分也就是为了缓和国际间的反日空气，使它侵略中国可以少受些窒碍，这和1915年以后，日本寺内内阁策动中日经济同盟相类似。不过同时我们还得注意：1934年美国的白银



政策已在远东作祟，1935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考察团又在福勃斯的领导下遍游中国，英国的哈蒙德将军，又替他的祖国巡视中国一条一条的铁路，国际大借款问题又重新提到远东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一切证明英美资本的魔掌，都在向中国大起作用。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初提出它的“中日经济提携”方案，在经济战野上还有对抗英美资本，以独占中国经济利源的积极作用。

第二种情势是属于中国国内的——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横蛮，但是它的脑袋毕竟清醒。过去的二十一条条件激成中国民众以每年的5月9日为抗日的宣传节，“九一八”以来的军事行动又促进东北健儿、十九路军、海外华侨以及各地民众的反日战争的运动。这些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在心底里是牢牢记住的。它晓得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而暴露的军事侵略容易引起中国民众的普遍反感，而且还有一个最坏的结果，即使他不能利用“以华制华”的毒计和阴谋。因为在众目昭彰的军事侵略之下，在全国民众愤起反抗的情势之下，中国的军政当局一般地会远离日本而走向英美集团甚至苏联方面去，反而使中国能够停止自相残杀和自相猜忌，而结成一条巩固的抗敌阵线，使“以华制华”政策只好原封退回日本外务省的公文柜里去！然而“以华制华”政策却是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骨干，所以它必须仿效过去的寺内内阁，相当变更“九一八”以来的军事暴行，使亲日分子有继续发挥作用的机会，使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更易实现，于是“中日经济提携”的新方案



就从霞关广播出来了！记得周宪文先生在《申报》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论中日关系的长文，其中说欧美各国是以买办的资格看待中国，日本却以茶房的地位看待中国，因此中国仇视日本的心理就特别猛烈。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初倡导“中日经济提携”，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少数的亲日分子可以在“买办”的拥护之下，多做一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工作。同时自称为黄帝子孙的中国人，在当时也有不少自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买办”，并迫切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把自己从“茶房”升格为“买办”，也是“中日经济提携”得以提出的一个条件。这点是千真万确的，日本外务省有名的“四一七”声明的起草者天羽英二，在其所著日支关系的调整一文中，就明白提到少数黄帝的子孙“业已相信：救济中国目下经济的破绽之道，除了即时停止自杀的排外运动，使与支那在经济上最有密接关系者的援助与协力变为可能，就没有别法了。因此该国的识者遂停止排日运动，要求与日本再行展开正常的经济关系。”（译文见《世界知识》2卷1期）要晓得，过去两年间，假使没有天羽口中的这群“识者”，“中日经济提携”是不可能替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夺去许多战利品的呀！

第三种情势是属于日本本身的——这种情势是寺内内阁时代的日本所感觉不到的，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说明：

一、日本帝国主义在主观力量上不可能再继续庞大的军事行动，而必需来一个转变。我们晓得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对华的军事行动差不多继续了两年，镇



压东北义勇军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不曾片刻停止。这频繁战争当然需要庞大的军费，这对于日本的财政的打击已万分严重。日本的财政当局为了应付这庞大的军费，除掉增加租税和增发公债而外，当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过就是这两种办法，在1934—1935年间亦已迫近绝境。比如据1934年调查所得，日本国民平均收入每人仅50.4元，而每户一般所负担的租税，农村里已达到56.7元，城市里竟达111元，所以人民大众早已“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已发的公债在当时亦早已充塞各银行、各保险公司的准备库，超过全国储蓄银行存款总额约一、二万万元，这表示民间的财富多半已为公债所吸取。所以慢说日本军部与财阀之间有矛盾，日本的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有对立，单是这种脆弱的财政基础已足使日本军阀要放胆地对华再来一次“九一八”或“一二八”，就不能不大费周章了。日本松室少将在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关于侵华政策部分曾经这样说：“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日本主观力量薄弱的反映，同时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改弦易辙，侧重“中日经济提携”的这种侵略方式的原因。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改变态度，又是由于他发觉过去三年来武力侵占东北的结果，有许多地方是失算和失望的。东北的义勇军在当地农民和中国爱国民众的拥护之下，一天一天地扩大，1935年二月间日军南总司令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义勇军有五万之众（实际当时已在十万以上），



证明东北的民众跟汉奸截然不同，绝非武力所能征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政策一部分是惨败了，因为在过去三四年间，向东北移殖的日人，并不是从事耕地务农，而是从事武装反对附近的农民的暴动，日本国内的金融资本家也不愿积极地投资东北。有一次“日满经济同盟”的设计者，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少将，从东北反抵东京时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日本资本家对于对满投资的冷淡，完全由于他们没有认识环境，或者是由于缺乏企业精神的缘故。”哪知这位记者正是代表日本银行家的，他就辩护说：“如果满洲的秩序不能恢复，资本家不能在那里赚取高过于内地的利润，那么他们决不愿意把自己的资本投向满洲去。”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历年支出庞大的开拓费（即剿灭义勇军的军事费），但是东北的资源对它还是可望而不可即，东北并不如日本军阀所想象那样容易，立刻会变成“帝国”发展的“生存线”。这个教训使他们在“塘沽协定”以后不再专信武力侵略政策的万能，因而到1935年初他们也看中了“中日经济提携”的新方案。

三、日本帝国主义要采取这种新方案，同时也是由于它本身的必要。因为第一，为了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一步吞并中国，军需工业与军需原料必需充分自给，然而这是小小的日本办不到的，同时东北又未如期地满足“帝国”的要求。苏联的中国通A. Kantervich 在日本经营满洲的若干总结一文中说：“事实上在日本统治的这三年半中



间……满洲在日本进口贸易中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一减至百分之八……。就一些重要的原料言，过去几年业已惨败了。棉花未有发展，矿物资源依旧不够，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业已显著暴露。因为这一矛盾的原故，满洲任何原料事业的发展却遇着了日本国内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和出口商的反对。”所以“帝国”非向中国另觅更好的资源不可！第二，日本帝国主义靠了“九一八”这一枚强心针，国内的经济恐慌在表面上确实好了一些，即主要靠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德、意、英、美列强一样，走入特种景气的阶段。但是危险的信号还是到处存在，最明显的就是日本资本家在虚幻景气的引诱之下，竭力扩张生产设备，形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其中最厉害的要推人造丝、棉纱等纤维工业，以及洋灰业和肥料业。它们的股票市价1935年比1934年约低三成。这就是说过去的军事侵略并没有替日本帝国主义解决了市场问题，“帝国”还得继续向广大的华北市场努力。这样，我们就能见到“中日经济提携”本身对于“帝国”是如何地需要了。

综合上列三点，我们不难看出“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对于日本本身而言，还有部分地修正过去法西斯军阀的穷兵黩武主义和调和军部与财阀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不过我们绝对不要以为“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的提出，是表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没落和金融财阀的胜利，对中日外交或有真正“调整”作用，因为利用“提携”的美名来掠夺中国（主要为华北）的富源与市场，完成日本战时经



济的准备，以便将来进一步并吞全中国，也是现阶段日本法西斯军阀的要求。换句话说，“中日经济提携”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一般的需要，对我们中国是全面的横祸。

把前述国际方面和中国国内和日本本身的三种客观情势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地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倡导“中日经济提携”一方面为了缓和英美列强和中国人民对它的反感，但是绝对不是缓和对华的侵略，而是使侵略本身在和善的假面具下，可以顺利地推进。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力量的薄弱和矛盾，过去的军事侵略又得不偿失；但是“中日经济提携”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忏悔的呼声，恰恰相反，它是紧急关头的一块“跳板”，使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进一步掠夺中华民族，屠杀中国人民！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过去对华的军事侵略，还只是灭亡中华民族的单面开口的利刃，而“中日经济提携”反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快刀呀！

第二节 日方怎样实现“提携”

1. 方案的提出和各方的反响
2. “中日经济提携”在枪刺上
3. 华北经济协定的签订

“中日经济提携”，按它诞生时期的国际条件和中日间的各种情势看来，确确实实地已是一块可怕的有毒的饴糖；不过我们愿意多提供一些事实，看它怎样成长，在成



长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现象。

方案的提出和各方的反响

1935年一开幕，正当关东军在察东掀起战事，占领沽源、东栅子、独石口等要塞地带，使华北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广田外相在1月22日贵族院的会议席上却发表了一篇温和可亲的演说。他说：“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是以帝国政府甚望中国及早恢复安定，对于东方大局有所觉醒，而与帝国之真诚相符合。”接着广田更具体地说到：中国政府如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则日本政府将第一步予中国以精神上的援助，第二步予中国以人材和物质上的援助，第三步日本方面力求仰给原料于中国，同时把日本输出的精制品按照过去输出至各国比例，与中国实行比例分配制度的通商。这就是“中日经济提携”的发端。1月29日使有吉明就奉命携带中日亲善的方案晋京，和中国当局磋商具体的进行办法。于是日本对华侵略的新方式就告初步的成功。中国当时可说已由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的对象变成中日经济提携的对象，中国在经济外交上从那时起开始有孤立的趋向。

2月15日，日本外务省第一次会商中日经济提携以后，事态便更加具体化。据当时《平津报》载，具体的方案是：

（一）使中日两国的经济团体和实业家，感情更能融洽起见，奖励派遣赴华经济考察团。



(二) 使中国经济财政都能彻底改造 达到“自力更生”起见，日本有实行下列几种对华援助之意：

(a) 日本愿在农业方面，给中国以经济的及技术的援助；

(b) 奖励中国大量植棉，完成中日经济调整的基础，同时图谋增加中国农民的购买力；

(c) 为使中国的产业，实现合理的经营起见，必要时日本愿给中国以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

(d) 中日贸易关系，实行比率输入制，以增加两国商品的输入。

(三) 日本希望中国改善币制，整理和统一银行钞票以期挽回危局。

(四) 日本政府愿在上海设立一特殊银行，资金约两亿日元。借以救济中国金融产业界的穷困。二亿元的信用机关，既可使中日贸易关系在金融周转上灵活，尤使中国关税收入可因此增加。

(五) 但是这里有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求中国严密取缔排日，尤其是彻底取缔排日教育。

(六) 对于关税，尤须中国反省，此后不仅不再提高，而且要对日特别减低。

上述中日经济提携的方案至少包含这些意义：第一，是消灭中国人民抗日运动，迫令中国脱离英美的势力；第二，垄断全中国的市场，扩大日货的销路；第三，使中国成为日本所统治下的原料供应地，补救日本帝国主义的先



天不足症；第四，中国接受并且实行了这方案以后，那么无异加入日“满”经济集团，结成日满华布洛克而与英美尤其是苏联对立，专供日本驱策。所以经济提携实际上就是“不战而胜”地陷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上述方案发表以后，就引起整个世界巨大的震动，就日本经济界而言，如东京大阪工商会以及其他经济团体，都纷纷讨论，各有表示。日本财阀们自然是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个不费本钱的收获，而且外交上还可减省它们对华军事侵略的经济上的重担。至于军部方面，因为中日经济提携，在目前也是实际征服中国的有效方法，当然也表赞成。在国际方面，英国是大大着急起来，英国驻美大使就匆促地访谒美国国务卿，商议远东问题，议会里甚至讨论中日妥协是否违反华盛顿协定。然而这种着急却并不曾发生几多效力，美国在继续施行白银政策中，所以几乎不曾报以热烈的同情，英国自然只好含着敌意而静待时变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中国究竟怎样呢？2月20日（即“提携”的方案提出后数日）汪前行政院长在中政会上发表对中日关系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坦白地诚恳地声明：我们愿意以满腔诚意，以和平的方法，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一天天消除”；当年七月间，他在南京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又说：“中日两国不仅在地理上人种上有其密切的关系，就是在经济上也有合作的必要，因为用日本的技术来开发中国的富源，是与



中日两国都有利益的工作。”从汪氏的这些谈话看来，“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原则上似乎已为中国当局所接受了。

在中国人民中间，日本帝国主义也能发现他们的同道者。和日本保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买办们，与尚未感到亡国之痛的金融家，显然愿意为日本的经济提携效劳。有少数学者也跟日本外交官一鼻孔出气，大唱中日经济提携的有利。有的假装慈悲地说：“中国产业落后，正需要东西友邦高度的技术和资金的帮助，只要日本能够放弃军事的侵略，中日的经济合作和共存共荣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有的说的更加直爽，竟象律师辩护的口吻，他说：“欧美各国可以站在两利的原则上投资中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日本为什么不可能”？自然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经济恐慌和侵略战争的打击，使他们丧失了民族的意识，而存下侥幸的幻想；他们等候对日关税的减低，来增进贩卖日货的利润，特别是1934年严重的通货收缩的金融恐慌，使他们热望着日本二亿元的信用放款会解救他们的厄运。不过这毕竟是少数人的意见，当时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这种卖身的提携。比如民族实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就提醒我们注意：“中日经济调整问题是一个极严重而不可忽略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关系中国存亡的重大问题。”他更痛切指出，中日“满”集团经济，“就是要使中国和伪组织同样的受日本支配”。“附和中国经济调整，无异自愿加入日本的中日‘满’集团经济，而受日本肆意的支配”。无



疑的，日本化装的侵略，只能收买想由“茶房荣升买办”的买办官僚学者，可是必然会遭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对。

“中日经济提携”在枪刺上

就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说，他要全面地开发中国经济，是没有那样的力量的。所以“中日经济提携”，主要的目的不在向中国作大规模的投资，而是向中国掠夺一些资源和经济上的特权。我们记得，当“中日经济提携”方案在原则上为中国所接受之后，日本曾经在上海召开总领事会议，日使也仆仆于京沪道上，力催方案的实现。可是日本财阀也和他们不敢大量地投资伪“满”一样，他们并不敢向中国作大规模的投资，二亿信用放款也只是“空谷好音”，所以尽管啄木鸟外交是那样厉害，当时“中日经济提携”所能努力而且真正在努力的只能有两点：第一就是要求彻底禁止排日排货运动，第二就是要求继着1934年7月的海关新税则，再来一次更“亲善”的减价。同时日本军阀已经等得不耐烦，又磨刀霍霍地以武力来促进“中日经济提携”的实现了！

这样1935年5月便发生了河北事件，接着又发生察哈尔事件，傀儡戏的导演专家土肥原将军在二月里周游中国，高唱“中日经济提携”的醉人曲子，当时又在华北导演自治国的丑剧。华北事件的发生，我们固然可以说是蛮干的军部跟外部斗智斗力的勾当，然而中日亲善和军部的征服政策，无疑地是有相互配合的作用。我们所以要这样说，



是想提醒一般跟日本打交情的官僚学者，要他们注意，事实上决不是“只要日本能够放弃军事的侵略，中日经济合作和共存共荣是一定能够实现”，而我们的愿意“中日亲善”不仅是与虎谋皮，而且是自欺欺人罢了。

无疑的，“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当时经日本军阀们枪杆一拨，就进到更实践更具体的阶段，“提携”的总目标现在集中到华北经济的开发上。当时的天津的《大公报》更能体味彼方的进行步调，它在社评中说：“吾人以为，关于提携之范围，在原则上应包括五省（华北），然在进行程序上，却应从关系较密之冀察入手试办。盖万里之行，始于一步！从这里，我们更可看出不久冀东伪府和冀察政委会的设立，对于日本开发华北经济，又有如何的关联和帮助。

当华北问题初步解决，华北特殊地带已成雏形之后，7月3日日本就通过日“满”两国经济共同委员会条约案，15日又与伪组织正式签订经济协定，设立经济共同委员会，这表示日本资本统治东北势力的加强，并进而侵入华北的一种准备。另一方面，搁置二月的中日经济提携的声浪就重新热闹起来。7月17日召开华北武官会议。便是讨论如何积极开发华北经济，日本外务海军陆军大藏（财政）四省，又会商开发华北经济的具体方案。当时驻华日本外交官的活动，对于推动“中日经济提携”乃至开发华北经济，其功是颇足道的。

于是接着五月间政友会考察团之后，7月16日日本实



业考察团又从沈阳来北平，中日双方实业家在天津讨论经济提携方案，八月初满铁会社就决定在华设立兴中公司，专任开发华北经济的“伟业”，满铁和关东军合组的华北经济考察团也于19日至北平，同年十月间经过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及满铁三大侵略本部的决定，复经大连武官会商和中央军部代表的协议，兴中公司遂正式成立，以满铁理事十河为董事长，资本1,000万元，到了那时，日本军部支持下的所谓开发华北经济，就逐渐具体化了。在这里，我们还得特别提一提我国经济巨头对于日本军部开发华北经济的态度。自从九月起北平政委员取消华北更进一步“自治化”以后，当时中国一部分官僚和工商家，集在日本经济提携和开发华北经济的周围歌舞升平的气象，真是难以笔述。高凌霄等在天津组织救济华北经济会，据说资本全由日本国际有限公司供给，天津商会也组织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接着华北金融业领袖和平津商会合组的河北经济协会也告成立，明白宣称该会的目的在于从事调查研究，以便利中日经济提携。在南方上海金融实业界的一部分领袖，也应日本之邀，组织考察团东渡扶桑，该团抵日时所受日本朝野的欢迎和尊敬，远过于我国的外交官吏。所以团长吴鼎昌氏在神户欢迎席上的演讲，态度也特别诚恳：“本团此次考察，乃负有提携使命，故为两国经济之共同发展起见，诸待各方之援助。”结果该团毕竟满足五月间广田外相的由中日双方实业家合组中日通商评议会的提议，决定与日人共同组织中日贸易协会。“中日经济提携”过去



能有很多成绩，他们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不过正当中日双方对于开发华北经济玩得很有劲的当儿，大英帝国的财政顾问罗斯爵士来华了。英国对于日本在华北双管齐下的行动，当然是倍感威胁和不满，特别是日本有扣留华北关税的企图，这更使大英帝国分外难以忍耐。因此，罗斯爵士曾经两渡东京，企图说服过去的同盟者，实现英日两国共同对华投资，而不要由一方独占。这不但日本军部不能同意今天的英国还有资格和他在中国并驾齐驱，就是日本财阀也不愿和英国共同对华投资，因为假使这样做，日本一定赶不上金融力量雄厚的英国。这样，罗斯对日的希望断绝了。为了防御起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反攻力量起见，罗斯就策动中国实行新货币制度，美国也对日示威，与中国当局缔结中美售银协定。于是“中日经济提携”，在当时就受了相当的挫折。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金融力量虽赶不上英美，然而示弱终非帝国的光荣，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就用经济以外的行动来答复了。他首先促使冀东伪组织成立和冀察政委会出现，同时更增兵华北和策动空前的走私。这些都可以证明：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原是挂在日本军阀枪杆上的玩意，是中华民族的悲惨的血祭！

华北经济协定的签订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继着华北的政治激变和走私的猖獗，以及中国各地救亡运动的挺进，“中日经济提携”这



种名不符实的方案，在1936年上半年不觉消沉了一些，因为以前愿意效力的人现在不觉有点碍于耳目。可是自日本驻华新大使川越负着新的使命来华，高唱调整中日邦交以后，情势又起了一大转变，“中日经济提携”又进到一个更具体的阶段，即订结华北经济协定。

川越在来华途上就说：“打开中日国交，首应开发华北之经济，此意即指现在之华北最适于着手经济提携。”他在天津曾向众宣称：“以目前言，经济提携乃调整国交之中心问题。”他对宋哲元所说的话更为直爽：“今日已非讨论此问题之时期，而应早日求其实现。”当时日方所规定的计划以下列五项为开发华北经济的前提：（一）筑津石路，（二）筑塘沽大沽西港，（三）改善海河水利，

（四）开发农村，改良棉产，奖励羊毛，（五）恢复龙烟铁矿。同时传说照日本军部方面的计划，要分六大部门来开发华北经济：（一）铁道，（二）矿山，（三）港湾，

（四）棉产，（五）芦盐，（六）电气。等到成都北海上海诸案制造成功以后，日本一方面竭力压迫南京的中日谈判，一方面积极推进华北的经济开发工作，借以“促成既成事实”。自从丰台事件在极度耻辱中解决以后，宋哲元氏便有天津之行，和田氏几次会晤，传已签订“华北经济提携”协定，规定四大原则，八大具体项目。宋哲元向田氏表示，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荣”的大原则底下，一切可以进行，于是虽因王克敏辞职而一度停顿的开发华北经济，便再趋活跃。李思浩便荣任经委会主席，而曹汝霖、



陆宗舆等著名卖国人物，也成为开发华北经济中的冀察新贵了。

这以后，开发华北经济所以没有象预期那样迅速进行，完全是因为：（一）全国民众和二十九军士兵，不容许华北完全成为日本控制的“安全地带”，同时日本军部的冒险行动，仍使日本资本不敢流入，中国资本不敢效劳。（二）日本资本因为入超的增大预算膨胀与公债增发结果，剩余资本对华北的输出能力异常薄弱。（三）日本资本家和军部在意见上的龃龉。日本资本家以为开发华北经济应先设法“救济”农村开展日本商品的销路，但是军部方面却以军需要求为开发的标准，所以主张首先开发矿产和建筑铁路。（四）是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之间意见上的冲突，前者要使其指挥下的兴中公司为开发华北的主体，而后者则不愿那样做法，因之兴中和华北日军便遇事扞格。所以侵略者本身对于开发华北经济步骤不一致，和资本力量的薄弱，使日本在经济开发所能获得的成就远在他们所已获得的特权之下。

※ ※ ※ ※

把以上各节所述综合起来，我们觉得前章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日本当局所提出的方案本身就充满掠夺的内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这种“提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是双重的迫害。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在过去两年间，我们的敌人从“中日经济提携”身上，已经从中国抢去一些什么，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摧残究竟严重到了



什么地步。

第三节 “提携” 的惨痛成绩

1. 中日“提携”中的贸易
2. 中日“提携”中的工业
3. 中日“提携”中的金融
4. 中日“提携”下的华北经济

为了周密地检查过去两年间的“中日经济提携”究竟完成了一些什么结果，我们且分成中国全国和华北一部分这样两个方面来叙述，因为该项提携的方案，一面固然有关全国，一面又以华北为中心。同时分别叙述以后，我们又可借用华北的现状，作为全国今后的殷鉴。中国全国部分，我们可以分成贸易、工业和金融三方面来说：

中日“提携”中的贸易

日本在他所提出的方案中（见前章），特别着重的是中日贸易上的“提携”。比如要用日本工业品来交换中国的农产品（即建立中日间的以物易物制），并要求中国当局，以彻底禁绝“排日”排货运动为条件。不幸得很，这些有毒的香饵，在过去一两年间竟能获得大体上的成功。我们姑以中国海关报告册为根据，观察日本对华贸易的增进：

最近四年来日本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



	1933	1934	1935	1936
进口	11.39%	13.87%	15.91%	16.91%

(注：前表除日本外，并包括台湾朝鲜两地数字。)

上面的数字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从提倡中日经济提携以后，日本对华进口已大大的增加，这就是说，“中日经济提携”方案要求努力取缔排货，可说已有很大的成就。我们假使再估计到最近一年半以来日本在华公开的走私，那末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横行就更可惊了。据正确的估计，日本私货侵入中国，其数已达二亿元到三亿元，这是多么惊人的数目！日方走私货物类多棉纱、人造丝、糖、纸、电气用具、毒物和枪械，它们不仅打击民族工业，摧残中国正规的商业，而且毒害人民，制造内乱，这种情形正跟目下日伪间的贸易差不多。

中日“提携”中的工业

在这里，我们且择几个重要的部门说说：（一）矿业：“九一八”以后曾告停顿的大冶铁砂的对日输出，到1935年又复活了，1935年输出共15万吨，1936年更增至20万吨以上。1935年全国铁矿砂输出4,809,809元，1936年增至5,007,871元，几乎全部都是输到日本及日本所统治的关东州租借地。同时这些铁砂输出，都是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强迫提供的，所以他决不是“经济提携”而是“原料强劫”。前年台湾总督府人员代替福建省府开采安溪铁矿，也是“原料强劫”的一个实例。其他如湖南的锑矿，日本



曾抗议英商安利洋行的售铤合同，广西的锰，日本也竭力图谋独占。至于关东军协助泰记公司独占柳江煤矿，野蛮横暴，竟使拥护提携的国人也为之寒心。（二）纱业：日本对华原棉垄断的步步完成，棉花输日的年年增多，已经逐渐危及华商纱厂的生命，它的最后结果，又岂仅华北纱业的全部覆灭呢！譬如上海，自从1935年8月为了“中日经济提携”而开拍日纱以来，到现在华商交易所的市场，几乎已被日本纱厂垄断了。假使这种情势再因“提携”而发展下去，民族工业的中坚——华商纱业，还能生存下去吗？

（三）火柴业：自从“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喊出以后，中日两国火柴厂主活动得最有力，中日火柴联营社不久即告成立。为了中国大厂主和日本厂主的利益，这个联营社用法律和资本力量来消灭华商小厂家。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日本帝国透过“经济提携”，在经济上实行“以华制华”的妙法！难怪山东全省火柴厂家要起而呼吁，使“提携”的真实作用暴露出来！

中日“提携”中的金融

日本在中国金融上的势力，实在是很小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只能做破坏的工作。比如1934年10月中国政府禁银出口后，日本便拚命策动鲜台浪人，由平津和闽台两路，武装贩银出口。当新货币制度颁行以后，日本破坏得更是积极，除了一面用武装力量禁止华北存银南运，另一面上海日商银行又拒绝交出存银以外，后来还一再想在上海发行



日本纸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说得上设置二万万元信用，以利中国金融市场的灵活周转吗？同时在财政方面，日本一方面竭力阻止英美借款给中国，甚至不惜以武力作梗；另一方面，又竭力破坏中国的财政收入，如空前的走私和冀东扣留关税、统税与盐税，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向它退让乞援，这儿又哪里有什么真正提携的形影？

※ ※ ※ ※

以上所说三点，是属于全国方面的，现在我们要进而看看“中日经济提携”在华北方面所造成的结果，使大家明白了它比前面所说的还更可怕和惨痛。

目前华北的经济可以说已经是日本的资本和枪杆的独霸园地。参加开发的虽然有河北省经济协会等大团体，可是他们全是陪衬之陪衬，实际上一切都操纵在兴中公司手里。它是直接在关东军、华北军和满铁的主持之下，因此，它决不是一个纯粹经济投资的机关。过去因为资本太少（1,000万元），他的活动范围也很小，社长十河增资1亿元的计划，虽然已告失败，5,000万元社债的发行，虽然也不很顺手，但是兴中公司扩大的计划，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切不可因为日本军阀和财阀间有些矛盾而过分安心，何况日本帝国主义还晓得利用一部分的土著资本，而后者又极愿为之效劳呢！1936年年底关东军、华北军和满铁三方妥协，决定用“步步为营”的办法来实现开发华北的计划，其中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更强硬的态度，来压迫冀察经委会筹集民资。所以今后以少数日资强迫动员多数中国民间资



本，从事开发华北经济的这种方式一定会发展起来，这真是迫令中国人用自己的刀自杀的行为。现在我们再按着金融、矿业、交通和工业四种部门，来观察日资在华北的经济开发工作：

金 融

日本在华北金融市场上本来就有雄厚的势力，横滨正金银行在天津、北平、青岛，正隆银行和朝鲜银行在天津、青岛，天津银行在天津和北平，济南银行在青岛和济南，都设有分店和支店，其中以正金、朝鲜为最大。此外东洋拓殖会社也可说是日本控制华北金融市场的要角。它们随着私货和日本在华北的一般经济势力的增进，都有了新的扩充和发展。它们对于吸收中国的游资，特别是亲日官僚的巨款，可说无微不至。大概再经相当发展以后，它们对于当地华商银行的控制作用，一定可以达到目下正金、朝鲜等行支配伪满中央银行的程度了。

矿 业

日本军部方面对于开发华北产业所最着重的是军事性的矿业。因为假使能以井陘和保晋的煤，来炼龙烟的铁矿，那末，日本军队不但在华北可以造成一个独立自给的军械库，以供北取外蒙，南下晋豫之用，而且还可帮助建筑华北军事交通。所以龙烟铁矿是日本军部所必取的。龙烟铁储藏量占关内铁藏量29%，平均含铁达50%，为中国最良的铁矿区域。去年11月间，该矿以为冀察建委会收为国营，实际是代日本完成第一步手续。过去日方因为开办



费 2,000 万元没有着落，不能实行开采。可是自从日本内部妥协，决定旧债不还，尽先恢复铁矿和汤山炼钢厂，并规定以 1,400 万元开办以后，龙烟宝藏之被开发，已在亲日要人陆宗輿等奔走之下，逐渐实现了。其次日本军部所着重的是煤。山西的煤，是日本人顶眼红的，前年下半年就盛传日人和阎锡山接洽，开发山西煤业的消息，不过到了今日，晋绥当局决心守土抗敌，此项消息当难变为事实。目下冀察境内的华商煤矿，除临城怡立已被日资统制，柳江已被关东军强占，剩下来的只有井陘等少数煤矿，而且日本资本家也已在图谋并吞了！日本对于华北盐产的掠夺，其重要性决不下于龙烟铁矿。日本因为近年来军需化学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用盐的需要大增，每年不足食盐约达一百余万公吨。日本为着战时自己起见，除了向关东州和伪满取给，并根据所谓山东协定独占青岛盐产以外，其余的 50% 就靠长芦盐的掠夺弥补。去年日本强迫购去的芦盐达 7 万吨，今年起至少要强购 20 万吨到 30 万吨，并且预备直接向滩场盐商接洽，不再经过我国官府。此外日本还要促使“冀东伪政府”恢复昌黎废盐，由兴中公司加以技术援助，自晒自售，供给日方应用。这样，不但民食要受重大影响，就是中央财政也会大受打击。

交 通

日本军部认定：发展华北的交通，是开发华北经济的骨干。通车通邮和设关等问题早已成功，用不着再说，最近其他方面的成绩也颇可观。第一，关于铁道方面：津石



路早已决定修筑，中间曾因资力关系搁置了一年，现在日方已经决定改变办法，移用关外铁路局的旧存材料和车辆，作为津石路的投资与贷款，以促成该路的完工。此外日方并要求修筑聊济路等十线。铁道方面最重要的损失，还是四大干线全部日本控制的问题。我们都记得：伪组织成立，就截取北宁线的新榆段，在唐山成立“北宁新榆段监理处”，中国方面后来虽则破格地以每月贴补伪组织10万元为取消该处的条件，可是该段日下依旧成为调动日军和运输私货的利器。津浦、平汉、平绥三线，自华北增兵后，车务行政早受日军掣肘，车辆也不准南下。丰台事件后，前述三线事实上已为日军占领。一旦津石聊济等线先后完成之后，日军凭借华北的铁道即可进而控制长江一带，其为害决不止于华北。第二，关于航空方面：伪满航空线的延至华北，据说是塘沽协定所附条件之一，到去年11月17日，中日更合办惠通公司正式履行前约。惠通公司总计资本350万元，中日各半，飞机及技术人员全由日方供给，经营北平锦州线，天津大连线，天津承德线，天津张北线，天津张家口线，实际上等于日本军部的附设机关。冀察当局本来希望公司成立后，日本军用飞机得在华北停止飞行，可是结果适得其反，飞行得更加猖獗了！第三，关于航运方面：伪组织成立后，塘沽、大沽、北戴河和秦皇岛各口都归伪组织控制，冀察当局无权过问。日方原拟开辟塘沽为一大吞吐港。以大沽副之，由日海军出资3,000万元兴筑，同时还要根本改善海河水利，使大型军



舰可以直达天津。全部工程需款七八千万元，工事需时五六年。现在已经计划缩小，将工事费减至2,700万元至3,100万元，以便早日完工。至于华北各港至大连、营口间的航业，也早为日商所垄断，资本50万元的华北航业公司，也于去年被日商兼并。华北与中国其他口岸的航业，大连大阪两汽船会社，也有决定的势力。此外，冀东境内的电信事业，已被伪组织强迫接收，且与伪满电话电信会社订立合同。冀察境内的公路，日人也可随便强占营业。所以总括起来说，华北的交通事业到现在差不多都是日本的私产了，这就是“中日经济提携不难循着共存共荣的途径迈进”的结果！

工 业

日本对于华北的工业，因为财阀不赞同兴中公司的垄断投资，不放心华北的政治局面，投入的资本还不十分雄厚。不过目下日方所已完成和已在计划中的成绩已是足够惊人了。假使我们再考虑到开滦公司、中国启新洋灰公司和耀华玻璃公司，这几个巨大企业，现在都因冀东伪组织成立而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那末我们所受的损失就更大了。现在再详细地分述于后：

(A) 纺织业：这里已经形成日资的独占局势。去年天津华商裕大、裕元、宝成、华新四厂，先后卖给日商，日商所设的新厂也有上海、裕丰、福岛等厂。目下天津日厂的新旧纱锭全部完成以后，能有53万枚，织机1万架，而当地华商纱锭不过6万枚。青岛方面今年日厂将有纱锭60万枚，



织机22,000架。津青两地合计，日厂共有纱锭100万枚以上。所以它们不仅可以席卷华北市场，而且可以深入长江流域。这样如果华商纱厂不再急起抵抗，还能幸存吗？

(B) 电气业：天津市政府已经承认与兴中公司合办中日电气股份公司，资本800万元（已收一半），中国部分也由兴中公司借出。兴中公司并进而与北平电灯公司接洽，预备合组北平电气公司，统制北平的电气事业，计划非常宏大。现在东京五大电力会社业已合组华北电力兴业会社，资本800万元，于1936年12月8日开成立大会，企图垄断华北的电业。

(C) 造纸业：在计划中的有东洋制纸株式会社天津支店，预定资本1,000万元，厂址设在塘沽；另一为大阪合同制会社，厂址设在石河，资本500万元。上述两厂都已获得日本军部的同意，即可动工，同时据说三菱公司也有在天津设立东京造纸厂的消息。

(D) 面粉业：在天津和济南两地，日本预备设立两个大面粉厂，资本各300万元。本年2月14日东京来电，已谓三井、日本制粉、高桥三大公司所共同经营的三吉面粉厂，最近已在济南购地，创设济南制粉工厂，最近就要开始业务。此外，东亚烟草株式会社也准备以200万元资本在通州附近设立一个烟草公司，以垄断华北卷烟业，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农 业

日本对华北的农业野心很大的，这不仅是为了安定农



村以推广日货的销路，也不仅是为了统治粮食以供军用，主要在于垄断原棉，使日本纺织业在战时不会闹原棉不足的恐慌。华北冀晋鲁三省皮棉占全中国产量三分之一，就美棉产量而论，更占38%，所以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植棉区。自从开发华北经济的口号喊出以后，植棉工作便十分积极，日方决定从改良棉种、统制产户着手。天津日总领事馆且在天津设立华北农业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伪组织业已指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为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现在已经成立华北棉花会社，并在通县设立棉花试验所。日方还借助东亚棉花协会等民间团体以及冀察经委会，促进华北各地的棉花合作社。同时六家日本纱商又成立华北棉花协会，试行统制华北棉产；天津、青岛又成立棉花交易所，控制华北的棉市场。如果日本陆外拓三省与兴中公司所确定的华北植棉五年计划一一实行起来，恐怕五年之后，华北棉产全非我有了。

至于毛产方面，因为日本对察绥两省的全部占领，已经受到打击，所以要一时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恐怕不易实行。不过日本调查团对于毛产的关注，是很明显的（如去年六月初拓务省农林课和殖产课派员赴察调查察省羊毛）。同时日钟纺织会社也已投资30万元，拟在张家口设立洗毛厂，收买内蒙的羊毛了。

※ ※ ※ ※

我们根据事实和数字，将两年来的“中日经济提携”



在全国，特别是华北所形成的结果，加以周密的检讨以后，我们不能否认“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的确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快刀，它不仅破坏中国国民经济的建设运动，而且还要促使中国经济加速地殖民地化，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军事侵略，过去以为中日经济提携可以调整中日的外交，或者以为中国既予日本以经济上的利益，那末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就可适可而止，因而使中国得有喘息的余暇，来从事经济建设和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凡是抱着这种见解的人士，到现在实在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因为两年来铁一般的事实实在不容许我们再作天真的乐观论调，以为中日经济提携和华北经济开发，的确是中日经济共存共荣和两利主义的办法。不过最不幸的，是目下还有少数人士被敌人的诡计迷住自己的心灵，相信日本真能变为我们的友人！对于他们，光是指出以往的成绩如何惨痛，或者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很可能还在做着未来的美梦呢！对于他们，我们还有探讨未来的必要。现在我们就再陪伴他们巡游一趟吧。

第四节 今后的展望

1. 林首相演说辞的分析
2. 新的经济恐慌在日本
3. 中国将更成为“提携”的牺牲对象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日经济提携”这个方案，今后



的态度，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变，看了前列三章以后，大概是很少问题的了。不过恰巧最近日本政局本身起了一个激变：广田内阁解体和林銑十郎继起组阁，倡言经济外交，因而国内人士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难免又有了一番神经过敏的估计，而以为“中日经济提携”好象也要随之变质一般。所以谈到“中日经济提携”的今后，我们对于林内阁的使命就有密切注意的必要。

日本自“二·二六”政变以后，法西斯军阀的势力一天一天抬头，因而政党财阀的不满也就随之增进，广田内阁的解体就是因为“吃不消”做两方的折中人。我们晓得，政治上的不左不右是极难维持的，继起的林内阁必然要比广田更加法西斯化。就其对华政策而言，法西斯军阀决不容许林内阁不比广田更为“积极”。“中日经济提携”会不会和以往相反，变成真正的提携，或是更趋于掠夺化，在前述的前提下，差不多已是用不着再加探讨的问题了。

不过我们愿意多提供一些论点，作为大家的参考。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今后对于“中日经济提携”，一定不惜用更大的压力来促进，是不仅因为林内阁的出现将更重视法西斯军阀的军需要求，同时更有“帝国经济上”的一般根据。钱俊瑞先生在4卷8期《世界知识》上曾经发表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一文，说到“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整个地脱离了恐慌的深渊，正相反，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之下，新的世界经济恐慌却可能在年内爆发起



来”；同时他更说：“这个新的恐慌最可能首先爆发的国家就是近年以来工业生产增加最快，而且是第一个脱离这次恐慌最低点的日本。”他的论据是：

“我们的东邻日本一方面因为五年多来对于中国的肆行侵略，攫夺我原料，霸占我市场，而另一方面军事工业的大加扩充，使得国内工业突飞猛进，193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竟增到150（以1929年为100），占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然而日本毕竟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他的经济力量毕竟不能胜任长期的军备扩充，而且财政危机的加深，对外贸易的不振（最近入超极大），在在使得日本的经济有重新坠入恐慌的可能。在193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的增加差不多已经完全停止，而重要工业部门纺织业的生产简直已经大大低落了。日本这种重新爆发恐慌的危机，正因为它对于中国的军事进攻不断地加紧，战备的负担不断地加重，同时它跟别国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格外加深，正在一天天尖锐起来。”

因此钱先生更进而预断“日本在1937年一定会向中国表示更大的‘善意’，在军事和政治上实行‘共同防共’，在经济上实行‘中日提携’”。换句话说，日本的军阀财阀一定要加强榨取中华民族的脂膏，和侵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来挽救国内新的经济恐慌的爆发。我们认为这些估计，在整个趋势上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中日经济提携”今后将更为日本帝国的利益效劳，是据有多方面的论据，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预定事实。



不过林内阁登台以后，中日之间又好象散布着一种相反的即和睦可亲的空气。本月15日，日本议会重开，林首相以兼外相的资格，发表对华政策的重要演说。关于这项演说内容，据中央社记者从东京传来的消息，“林氏演说，措辞颇值注意，盖其与以前各外相所发表者不间，尤以广田有田三原则，林氏只字未提，林氏外交报告称：‘在此时机，培植中日两国友好情感及改善两国关系，相互合作，以期实现东亚之安定，实为当务之急’一节，表示对中国较前已有新观念，林氏又称：‘故中日两国应理解彼此之立场，不特政府如此，即两国人民亦应有密切之接触，以便中日提携及互助获得具体之成功’等语，亦足显示日本朝野最近心理之一斑也”。（见16日上海各大报，傍点引者加）现在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林氏的这番演说，对于广田的三原则“只字未提”是不是就真如中央社记者所评：表示日本对于中国“较前已有新观念呢”？因为这决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且先引历史上的一段评语来做参考。1935年1月22日波兰《克拉科时报》，评论日本的对外政策说：

“日本的对外政策有着两个面孔。第一个面孔便是每年国会开会时，外相在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说，这演说是一种传统的蜂蜜。不论谁做外相……差不多都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资格，都是和平的战士，都是酷爱和平的安琪儿。……日本外交要员每年的演说，总是要对中国洒点同



情之泪，你假使信以为真的话，那末便可以看出日本再没有比安定中国政局和对这个不幸的国家的统一那末关心了。但是事实上中国过去连年不息的内战，都是日本阴谋指使和资助的，而在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军舰便来袭击中国的海港了。……

“日本的第二个面孔便是实际工作，这实际工作也有两种，即仰赖强者和压迫弱者。……日本的政策有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侵略中国和最低限度不许中国强盛。日人知道当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成了正常的国家的时候，就是日本在世界政治上和远东的作用告终的日子。……”（译文见2卷1期《世界知识》，傍点引者加）。

这段评论是对前广田外相说的，不过也同样可以用来评论前面林首相的演辞。波兰《克拉科时报》的记者晓得日本的对外政策有两个面孔，和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侵略中国。林首相这次老戏新唱，是骗不过我们的耳目的。不过这是过去的时事评论，同时该报记者总是局外人，那末我们就把视线调转来吧！

林首相15日在日本议会中的演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为我们的中央社记者所未经报道，但是日本的同盟社却坦白白地从东京来电告诉我们：

“林兼外务大臣在首相演词后，以外相资格继续演说如左：余现以外务大臣之资格，陈述所见，政府以国际正义为重，确保东亚之安定，实现万邦共荣为目的，以实行举国一致之外交国策而期国际关系之明朗。因此与‘满洲



国’为亲善不可分离之关系，益须使臻巩固。至于对华对苏，尤须加意调整其关系，日本之对华，历来与中国努力，共图确保东亚安定为念，但中国方面尚未充分理解帝国之真意，以致两国间发生各种问题，诚堪遗憾。是以两国民众，应自此融和感情，企图国交关系之明朗化，互相携手，以期实现东亚之安定，最为紧要者也。因此之故，彼此努力理解两国之立场非仅政府如此，尤须刺激民间之接触，以发扬日华提携协助之实绩。同时苟有阻害者，即当进而排除之，以此项觉悟，而决心企图两国国交之调整耳。……”（转录16日上海各大报，傍点引者加。）

这节电文里面，有好几句话已能显出日本今后对华政策的另外一个面孔：第一，日本与“满洲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以后须使之更形巩固，这就是说不许中国收复失地；第二，过去两国间发生各种问题（大概就是成都事件、绥远抗战以及各地人民的反日表现），都是由于中国方面未能理解日本帝国的真意，这就是说中国应该听凭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第三，为了发扬中日提携协助的实绩，如果遇到阻害，日本就要进而排除，这就是说，日本依然要用枪杆来强迫中国和他“共存共荣”。这就难怪《申报》要说林内阁的对华政策，是“表面亲善，暗中积极”；《立报》要更明白地说他仍“含强硬的侵略方针”了（见17日两报记者所加报道）。所以对于林首相的这次外交演说，我们假使不断章取义地作浮面的研究，我们就会认清：日本对华并没有显著的“新观念”；就是有什么



新观念，也不会有什么新政策，有之，那一定是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前面我们预断日本的军阀和财阀今后更将积极推进“中日经济提携”，独占中国的资料和市场，挽救他们国内的新的经济恐慌，这些在林首相的外交演说中也可得到充分的反映！

林内阁登台到现在，虽然为时甚暂，但是已有相当的事实，足证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积极。譬如16日天津来电，说“北平日驻军部第二课长池田，已衔田代命返国报告，兼请示中日经济提携意旨，18日左右返津复命”。同日天津、北平来电，又说冀察经委会主席李思浩正在天津与日总领崛内商量一切“经济提携”问题，且已有进展。同时芦盐的对日输出，龙烟铁矿的采掘计划，津石路的建筑等问题，又在具体展开。李思浩近日在天津和崛内的谈话内容，我们所能想到的，主要大概就是希望盐价提高一点，开采龙烟铁矿的资本，表面上最好不要表现为日资独占……此外，中日消息界近日还传说日本新任的结城藏相，正拟与中国一部分金融家取得联络，派遣财界要人来华，以便通过他们的手来实现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阴谋。所有这些事实与消息，都是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今后将更利用过去“中日经济提携”这把两面锋利的快刀，它非促进中国经济的沦亡来挽救“帝国”的没落不可！

同时我们还得注意，从当前的国际关系讲，日本也不得不如此。第一，英国自近来对华贸易日趋衰落，特别自私货猖獗以来，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也力图挣扎。去年10



月英国对华贷放出口 1,000 万磅，英国出口信用担保局驻华代表柏特利克又兼程来华，目下正在沪大施活动，为的就是要恢复乃至扩大英国在华的市场。第二，德国自 1935 年以后，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突飞猛进，去年几乎超过日本，也是日本所大忌的。固然，自日德防共协定订立以后，他们在远东政治军事上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了，同时德国对华经济上的“援助”在实质上也会有利于日德对华的联合进攻，但是经济上的矛盾仍无法排解。所以从对英对德（对美当然一样）关系上说，日本亦非加强利用“中日经济提携”这把武器，与英德争霸不可。在这儿，我们还得继续注意：日本这样反攻以后，英德至少在经济战术上也不会退让，结果中国就更会变成各帝国主义的靶子，打得一个不堪收拾！

把前面所说的各点综合起来，“中日经济提携”是我们应该誓死反对的方案，因为它的为害，中国不特今后仍和以往一样，而且还要厉害百倍。所以在目前主张利用日资，来建设中国国民经济，实在是天大的荒谬！要晓得这正中了敌人的诡计和阴谋，把中华民族快点趋入地狱！何况日本目下正在大闹财政恐慌，和他谈经济提携，又是百分之一百的失算呢！

不过中日经济的真正提携，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假使我们和日本国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使日本的政治机构“脱胎换骨”，那末，中日经济的真正提携就会很快地实现在我们眼前，同时所谓东亚和平才



能真正地确定下来，人类才能踏上真正幸福的阶梯。中日两国的人民，现在就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1937年2月18日脱稿



速起扑灭汉奸*

这几天汪逆精卫，正在西尾寿造导演之下，扮演傀儡剧，丑态百出，令人发噁。伪中政会议三十名代表，全是“货真价实”的汉奸。这且不去管他，而我们所感觉最重要的，乃是汪逆在过去十六个月中，拚命诱惑的结果，所得的不过是几个“政氓”。有识之士，都反对他，痛恨他。这批丑类，我们要集中力量去扑灭。这一群汉奸，作敌人的工具，敌人何尝不知道这一群汉奸，是我们举国所唾弃的丑类，不能成事，但是，他们在过去所真正要勾结诱惑的人们，没有一个甘受利用的，才把汪逆运到南京，令他扮演这一出丑剧。汪逆本是一个富于冲动而缺乏理性的，敏于投机而毫无信念的政客，甘心作敌人的工具，不是一件意外之事。我们可断定这一幕丑剧，必然有两个结果，而无可改变的。并且这两个结果速则半年，迟到一年，一定要发生的。第一，敌人对于汪逆这一汉奸，本来

* 本文原载安徽屯溪1940年3月22日出版的《徽州日报》第一版。这是作者应报社特邀而主持写的一篇社论。现存于屯溪市安徽徽州地区档案馆。



是不相信的。他们文治派，不用说，是根本瞧不起汪逆的，就是军部中的一部分，也感到汪逆是无能力的。所以过去半年中，迟疑观望，原因在此。我们可以断言，汪逆在过去，用尽花言巧语，所勾引的，不过几个最无聊的政氓。于黑幕揭开之后，卖国阴谋，举国皆知，不但无人再受诱惑，而且已被蒙蔽的，也要和高宗武、陶希圣一样，跳出火坑。这一幕丑剧，是无从演得成的。板垣影佐，以他们无用，当然立刻会把他一脚踢开的。这时期是很快的。第二，汪逆集团，是投机买卖的结合，彼此都是以发一笔“卖国财”为目的的，分赃稍有不公，立刻就会破裂。在未演出之前，已经有了许多利禄斗争的丑态，于出演之后，斗争的进行，当然更趋猛烈。他们既然出卖祖宗，出卖子孙，可图的只有一个“利”字。汪逆也不肯抛弃“卖国专利”的。大汉奸与大汉奸争，小汉奸与小汉奸争，大汉奸又与小汉奸争，小汉奸也与大汉奸争，争来争去，必至头破血流，而鸟兽散。这是必然的结果，无可避免的。这一幕丑剧，出演之后，当然还有许多丑事毕露出来，这虽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的，而有不能看的痛恶。汪逆既然扮演这一幕丑剧，我们举国民众，目极愤慨，人人欲得而诛之。汪逆在敌人掩护之下，侈言如何如何，但终要受国家制裁的。只要每个国民，抱着与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他是无法幸免的。我们速起扑灭这一群汉奸。



盐阜区两年来的货币斗争*

(根据对全区财经扩大会议的货币
问题报告提纲改作而成)

新四军渡江北上和八路军长途南下，共同开创盐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到现在已有三年多的历史了！在这三年多当中，货币斗争展开较晚，但至少也有将近两年的历史了，从摸索中我们也得到不少经验教训，并值得作为史料记述下来。

一、史的概述

大概在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准备发行江淮银行流通券，同年初夏即在旧盐城县城正式成立江淮银行，嗣以大“扫荡”影响及其他关系，流通券未能展发行，江淮银行

* 本文原载于苏北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3月出版的《新知识》月刊。



业务也就暂告停顿。当时军部准备发行流通券和正式成立江淮银行的目的不仅在解决辅币困难和调节社会金融，主要还是为了要及早建立起一个金融堡垒，以便以后可较主动地来对付敌伪的金融侵略。这事未能及时完成，对以后盐阜区对敌的货币战确为一大损失。

1941年9月以后，盐阜区适应新情况正式成为一个战略单位，行署创立，各项斗争皆有新部署，当时货币斗争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9月间行署第一次行政会议），但从大扫荡之后环境动荡，社会抗日秩序不宁，未有具体决定。到10月、11月间，行署曾颁布“殷实商号发行辅币券办法”一种，推动各地殷实商号发行辅币券。该办法规定因发行辅币券而支出的制票费或竹筹费，暂由商号垫付，以后即从所发行的辅币作为货款贷出而获得来的利息当中拨还。同时所发行的辅币并非全部贷出，仍要保留一部分（兑换为法币）作为以后承兑法币的准备金。这准备金不交政府保管，仍由商人所组织的保管委员会保管，政府仅保留监督检查之权。这办法颁布并经发动后，仅东沟、益林发行了五六万元竹筹（一角二角两种），东坎发行了五角辅币券5万元，又八滩3万元，建阳某区政府也曾仿效发行了数千元（牛皮纸油印的一角二角辅币券）。换言之，这办法在盐阜区的货币斗争史上尚未发生显著的作用。这办法虽然很顾到商人的利益（如发行费之拨还）和顾虑（如准备金仍交商人保管），但处在敌后，正当商人也是怕发行纸币的（怕假冒怕收拾残局等等），这也是上



述办法不能发生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行署在颁布该项办法时虽然也估计到，但在程度上是不够的。所幸行署当时提出该项办法，并非作为整个货币斗争的对策提出来的，也不过是用以适当解决当时辅币缺乏的困难而已。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没收中外各大银行以后，华中法币（也可说是全中国）环境起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以前，由于中、中、交、农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放弃对法币外汇市场的支持（即法币一般不能换购外汇），法币在上海和长江下游的通货地位已经降低和有了限制，但由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存在，法币在长江下游终还保有最后的同时也还是优越的堡垒，它可以有力地来调剂和捍卫法币在华中内地和敌后的流通。上海公共租界中外各大银行被敌伪没收以后，法币在长江下游和华中敌后就完全失掉了依凭。这变化很快就反映到我盐阜区根据地内来。当时（即1941年残冬）东坎渐渐讲究起法币票色的新旧：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有的按票面十足用，有的要暗中打点折扣。而且不久就从东坎影响到益林，其范围一天天扩大，法币的通货地位大起动摇，而且无法抑制改变。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上海已无中、中、交、农等银行为华中各地商人承兑各种法币和破旧法币了。假使上海仍有这样的承兑机关，那末，任凭何种法币或怎样破旧的法币，敌伪即使想尽方法要歧视它也是歧视不掉的。当时这一突变使我们不得不严



重注意法币的发展前途究将怎样？盐阜根据地在金融上将何以独立自救？我们该如何对待当前的法币问题？货币问题在1942年春占据着我们的重要议程，当时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也有专门小组讨论该项问题，并有对策草案经大会原则通过。盐阜区较有计划地积极展开对敌的货币战，对法币问题的处理有较明确的方针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

当时初步对策如次：（1）成立盐阜银行，发行盐阜券（当年4月），目的还仅在逐渐代替一小部分法币，使法币通货地位的动摇及讲究票色好坏的麻烦对人民的影响可减少一些；（2）对法币基本上还是继续采取“听其自流”的态度：即也不设法要人民全面承用法币，不分票色新旧，同时也不促进讲究法币票色新旧的趋势。如果对于以往要更深刻地回忆，并说得更恰当一点，则应该是这样：即在1942年4月以前，行署还多少是偏向于想使较旧法币也该一样流通的对策，因为当时法币情况刚刚变动（即讲究票色），人民颇为不习惯和感到苦痛。4月以后，讲究法币票色新旧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限用法币的对策在主观上也渐渐成熟，行署特别是下层税收执行机关遂渐偏向于“也讲究法币票色新旧”的对策了。

1942年6月，汪逆宣布废除法币和禁用法币，用自己大量发行的伪币（中储票）来代替，由上海而逐渐扩大到苏浙皖其他各敌伪据点。汪逆的这一罪行，比起日寇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来，自然是更严重地打击了法币在长江下游以



至整个华中的生存。法币不特没有可靠的依凭，甚至连自己最后的立锥之地也难保留了！当时华中敌后各地人民所受的震动和损失是十分重大的，“小牛票”隔夜即成“废纸”，不能流通。对于这一突变，行署并不是完全没有预见到，因此事变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只是在时间上估计不足，以为汪逆废除法币的期限可能再迟一些，再加以敌后物质条件的限制，遂使我们应付事变的准备工作（主要即为积极增发“抗币”，代替一部分法币，来抵制伪币。）未能如期完成到足够的程度。这时我们断然采取了下列三大政策：（1）将票面一元的新抗币（当时拟即发行）作为法币五元发行，从此确定抗币与法币之比为“一比五”，使抗币的发行量可突增五倍。开始时人民对此略有怀疑和不习惯，但经过商会动员解释，不到三五天即顺利流通了。（2）成立盐阜区贸易管理局和东坎、益林、钦工三个分局，并会同原有各地税务局，严格管理豆油、豆饼等十三种大宗出口土产，限令出口销售以后仍须采购相等价值的货物回来，以防止汪逆将法币排斥到我地区来抢购物资，使我地区通货加倍恶性膨胀，物价加倍飞涨，使人民受害。（3）停用中农票，对其他法币采用明确的限用政策（亦即有条件的扶持政策），以免法币过于膨胀和过份动摇。这些都是在6月中旬和7月初旬相继实行的。至于对于伪币，自然是严格抵制禁用，即在接近敌区如盐城、盐东，开始时对伪币也是禁用和没收的。以上各种对策一直推行到1942年11月至12月。



以后，情况变化，日寇对我苏北地区准备残酷“扫荡”，淮海区11月间即行开始，我们整个进入反“扫荡”的准备中和动员中，金融自然不会例外。行署一面通令各县准备法币准备金，以应付抗币可能到来的挤兑和军政经费的支付，一面尽可能设法将法币使用标准（即票色新旧）降低一些。因为行署估计“扫荡”与反“扫荡”的军事斗争一开始，抗币威信难免于动摇，如不适当承兑，特别是部队支付时如仍强用抗币，抗币威信必更难支持，同时抗币威信动摇时，抗币流通必受窒碍，如不尽可能使较旧一点的法币也能适当行使市面，伪币必更易乘虚而入，占领我地区，遗害我人民，因此行署当时有以上两项决定和布置。

大“扫荡”于今年2月中旬开始，至3月中旬结束，历时约有一月。自3月至7月，我们的货币对策如下：（1）运用各种方法，如收税时尽先要求商人付抗币；催索到期的各种贷款（如秋粮贷款、小本贷款、纺织贷款等），并要求付还抗币；提早准备上忙（夏季）土地税的征收工作，引起人民搜存抗币的需要（因人民从去秋经验已深知缴土地税最好是缴抗币）等等，来迅速恢复抗币的威信。（2）对法币仍继续采取降低法币票色的政策，5月间行署还出了一个布告，重提这一设施，不过当时法币使用标准在若干地区已逐渐回转提高，因此这布告的精神并未全面贯彻下去。（3）对伪币猛烈反击。在准备反“扫荡”期间，行署一方面为了应付特种需要（如到敌伪据点采购物资），一方面因盐城、



盐东、射阳若干接近敌伪地区，敌伪币日渐充斥，人民向我交税，没有法币备感困难，因此曾规定上述若干地区的征收机关于万不得已时可酌收伪币。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我们一方面缩小征收机关酌收伪币的范围（如射阳县即完全停止），一方面又降低伪币法币的比值，如由一元合一元四角，降为一元合一元，最后降为一元合五角（7月间），用这样的方法来组织对伪币的反击。

上述三种对策，第一种对策是顺利完成的，抗币又成为人民所最爱好的通货，6月以后，抗币又增发了一部分。第二种对策，五月布告，未能贯彻，而且行使结果，害多利少，因此到8月初旬，行署决定全区法币分等使用，即将去年4月以后特别是7月以后严格限用法币的对策，同准备反“扫荡”期间和五月布告所表示的降低法币使用标准的对策综合起来，新的法币可按票面十足流通，较旧的法币也可按票面八折流通。第三种反击伪币的对策，在盐城、盐东皆有成效。不过六七月间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之下，以半购半抢的方式，掠夺了全上海厂商所存储的棉布棉纱，一方面藉以更进一步对我实行物资封锁，一方面又可利用这掠夺来的物资暂时稳定和刺激伪币的购买力，提高伪币对法币的比价，挽救其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七八月后，伪币有回涨之势，我们原先规定伪币一元合法币五角，现在有改订之必要了。最近行署已授权盐城、盐东在万不得已时，为顾及人民困难，必须酌收伪币的地区，可将比价提高为伪币一元合法币六角至七角，这基本



上自然仍是抵制伪币。

以上为盐阜区两年来货币斗争之史的概述。从这概述中，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货币斗争本身的演进，我们可将两年来的斗争史大体划分为下列五个时期：（1）日寇未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以前（即1941年12月以前）为第一时期，货币斗争尚未展开，只在议程上被提到。（2）日寇占领上海公共租界至汪逆废除法币之前（即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为第二时期，货币斗争展开了，对法币抗币的政策逐渐形成和确定。（3）同年6月至11月为第三时期，是前一时期的生长和发展，我们有了较主动和较成熟的货币对策和实践。（4）准备反“扫荡”与反“扫荡”期间为第四时期（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其特点为我在货币斗争的战略上改取防御的战术。（5）反“扫荡”胜利结束后至现在（即今年3月至11月）为第五时期，其过程是由恢复抗币威信到适当增发抗币，由继续降低法币使用标准到法币分等使用，由对折抵制伪币到七折抵制伪币（在盐城、盐东二县），所以这一时期如果严格分析起来又不妨分为前后两段。盐阜区两年来的货币斗争如此划分，与两年来整个财经工作的演进大体上也是吻合的。

二、我们的货币政策

在过去两年的货币斗争中，因主客观情况的演变，我们的货币对策曾有一些变动，但就其本身而言，基本上是



前后一贯的。这一贯的政策在去年春季华中局扩大会议中已经提出，不过直到去年6月以后才明确地成为有意识的行动方案。今从抗币、伪币、法币三方面来说明我们的这一政策。

（一）抗币政策

在敌后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必须有自己直辖的部队，和这一样，要在敌后进行对敌的货币战，我们也就必须有自主的货币发行权，即我们必须发行抗币。为什么呢？因为：

1. 敌我现在所行使的并非金银硬币制度，而是不兑现的纸币制度，大家都是用印刷机印刷钞票，要人民使用。（在问题的本质上，敌我当然是完全不同的。）纸币之所以能够代替金银硬币，在市场流通，能有购买力，能有力量，一方面固然是依靠政治上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是更基本的）也是因为一个市场（一国一省或一县一区一乡）总需要有中间媒介物（货币）来沟通货物的买卖，在这一中介关系上，硬币可以，代替硬币的纸币也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市场在一定时期所需要的中间媒介物（货币）的数量是有限度的，如果作为中间媒介物的纸币发行额超出了限度，纸币毕竟不是金银，它就会跌价（购买力降低）。发行额超出越多，纸币贬值就越贬得厉害。这就是普通所称的通货膨胀的表现。因此敌我今日的货币战，其最中心和最后的内容就是：敌伪要强制敌伪区（首先）和我根据地（第二步）内的人民使用他们的纸币（伪币），



而不使用我们的纸币（抗币与法币），使其金融地盘扩大，财政可更有回旋之地。我们则正相反，一方面，（首先）要抵制伪币的侵入，要在我根据地内禁用伪币，另一方面（第二步）再促使敌伪区的人民少用、不用伪币。使敌伪的金融财政更少出路，更难挣扎，中国人民也可少受伪币膨胀垮台的灾难。因此我们就不难了解：要对敌进行货币战，我们就不能不发行抗币来保卫我们自己的市场（即充分供应市场的通货需要）。否则，伪币就可能乘虚而入，塞满我们的市场，种下无比的祸根。

2. 至此或者有人要问：敌伪区也好，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好，原来都是使用法币的，今日在盐阜区根据地内法币仍为主要通货，我们要抵制伪币侵入，则全力来支持法币，不另发行抗币，不是更直接了当和更为有效吗？不过问题又不如此简单：第一，因为法币独力抵制伪币，在华中敌后今日已有困难，我们虽然欲全力支持，但已有我力难以全用之苦；第二，因为法币本身的膨胀也已到了有害民生的程度，如果不适当地加以限制，在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恶果（详细见以后论法币对策），所以我们仍有发行抗币的必要。

以上证明我们应该发行抗币来抵制伪币。下面再分成两点来说明我们的抗币政策：

第一，我们发行抗币的主要目的在抵抗伪币，但不是独立来抵制。在这里我们是采取联合法币并仍以法币为主，来抵制伪币。



第二，我们发行抗币的次要目的（这与前者是分不开的）在调剂社会金融，特别是协助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生产，改善生活。我们发行抗币，没有一点是为了财政上的需要，我们是坚决反对财政发行和通货膨胀的。过去发行的抗币十分之九以上是用于举办各种贷款，发动纺织，即为证明。

对于第一点，曾有同志采取反对的意见，以为这样的抗币政策有些右倾。他们主张多发行一些抗币，与法币平分秋色。为了加强抵制伪币，为了进一步防范法币过分膨胀的恶影响，他们甚至主张将抗币发展为盐阜区的主要通货。使盐阜金融与盐阜军事并驾齐驱，不要象现在这样落在后面。这样的主张确是十分热情的积极的，但可惜不够理智和不够现实，因而我们也就不能采取。为什么呢？因为：

- （1） 盐阜根据地开辟较晚，基础尚未最后巩固；
- （2） 金融不能完全和军事一样打游击，金融形势稍稍落后一点，为稳妥计，是必要的；
- （3） 汪逆大量发行伪币，且控制住上海及长江下游各大城市，金融上对我威胁甚大；
- （4） 我发行抗币甚晚（迟于汪逆），比起法币来是很小的一支力量，而法币在华中的潜伏力量，比起华北来又是较雄厚的，因湘、鄂、皖、浙的沦陷地区尚有不少是与国民党地区直接毗连的。

因此种种，我们在华中一般就不能采取同华北一样的



抗币（华北称边币）政策。为稳妥计，我们只能联合法币并依法币为主来对抗伪币。作为根据地内的流通工具看，抗币与法币的关系目前亦应如此。去冬准备反“扫荡”期间，抗币曾一度挤兑（虽然一部分是由于我们主观上的疏忽），在今春反“扫荡”期间，抗币币值几乎跌落一半，法币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工具，抵御着伪币，这些事实证明我们的抗币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看问题要看全面，不仅只看到少发行抗币即减少自己在货币斗争过程的主动权，而且还要看到抗币发行多了以后在“扫荡”前后和“扫荡”期间所可能引起的其他种种困难。不错，经过今春大“扫荡”的锻炼，抗币的基础已较前稳固了一些，但在目前还不足以作为变更上述政策的根据，这是我们应该辨别清楚的。

（二）伪币对策

对于伪币，我们一般是禁用和抵制的，这是始终一贯的。在具体执行时，我们曾有下列各种规定：

1. 在我们中心地区，伪币是一律严格没收的，对于黑市，只要可能，也加取缔。

2. 在边区和游击区开始时也严格没收，以后因伪币渐渐侵入（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小额的暂不没收。为了照顾边区游击区人民的困难，我们并不机械执行没收政策。在那些敌伪占优势的地区（特别是在贸易关系上），我们对于伪币也有仅仅采取抵制限制政策的。



3. 一方面为了解除边区游击区人民向我缴纳粮税的困难，另一方面为了吸收一些伪币作为对外支付手段，我们也贬值比其实值低一些而征收一些伪币。这一对策是今年一二月间才开始运用。

4. 以伪制伪的对策：即预先吸收相当数量的伪币在手，当伪币上涨或商人需要伪币较多时，我们即将伪币抛售出去，使伪币不能“行时”；当伪币跌价时，我即牺牲一点公款，将手头的伪币一齐挤出去，使伪币威信更快低落。（以上自然是指边区游击区而言）这一对策我们尚未采用过，因为它需要相当的财力和相当的组织条件，是较难实施的。

（三）法币对策

在过去两年的货币斗争中，法币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同时又为斗争的中心环节，直到1942年4月以后，我们才完全确定了法币的政策。

对于抗币，特别是对于伪币，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这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对于法币我们却不能只采取单面的政策。法币是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对于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以及对于抵制伪币打击伪币，皆具有重大作用，同时又为中国人民（无论国民党区域或敌后根据地甚至华中各敌伪据点）一般财富的代表，与中国人民有莫大的利害关系。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对于法币应全力支持和全力加以保卫。但是“今日”的法币和“敌后的”（这是很重要的条件）法币又有两点是使我们在规定法币对策时所不能不考



虑的，这两点就是：

1. 由于国民党政治的倒退和财政经济政策的倒退，法币发行已日益走上恶性通货膨胀的穷途，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银行家从法币不断贬值当中发了巨大的“国难财”，但是一般人民却为高昂的物价所勒死，大后方人民的饥谨暴动就是最尖锐的反映。法币这样恶性膨胀，其祸患自然也会很快地传播到敌后各根据地内来，因此为人民谋福利的敌后民主政府就不能不起而防范。

2. 自前年12月日寇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以后，法币在长江下游特别是华中敌后已无承兑机关。汪逆禁用法币固使我们备受威胁，他唆使商行，操纵市场，拒用破旧法币或无端打折流通，也使我们无法应付。本来破旧法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法币发行机关远在大后方，不易输送新法币来收回旧法币，同时由于国民党当权派在政治上的反动，他们根本就不考虑如何会同或授权敌后民主政府来收兑破旧法币，粉碎汪逆的诡计。这样使敌后的我们就无法来全力支持法币。

根据以上两点，我们一方面应全力支持法币，一方面又不应当（同时也不可能）作全力的支持。从矛盾中求统一，我们对于法币就采取了“限用政策”，就是票色尚好的法币与抗币一样流通，破旧的不支持其流通（去年7月以后），或者按票面贬值使用（今年8月起）。这一限用政策的目的在于防止破旧法币充斥我根据地，以免人民过分遭受损失。因为破旧法币限制掉，本区法币流通量就相对



收缩，法币膨胀的程度就可较大后方略低一些，在物价关系上人民即可少受一点压力。我们限用的目的不是要以抗币来代替法币，同时今日限用的程度还是不高的，所以法币在本区仍被作为根据地内的主要通货。这一限用政策执行时虽不无困难，同时使民间也会多些纠纷和损失，但比较起来，终是利多害少，且能各方面兼顾，因此，在现有情况下，是唯一妥善的对策。

但是我们的同志间，也有认为这样对待法币是不对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抗币问题上的左倾的错误观点，实际也就是对法币问题之“左”的观点。与这相对立，有些同志对法币问题则又抱着真正是右倾的见解，他们的立论是：

(1) 法币为国币，在国际上又有英美背景，为了政治上联合国民党与英美，我们不应在金融上限用法币。

(2) 战时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处在敌后更不能除外，因此我们只好听其自流。

(3) 法币将来会有光明前途，目前大后方法币不可能流入敌后，因此至战争结束为止，敌后法币币值将不会有大的变动，因此我们也不用过虑法币膨胀。

(4) 敌后限用法币将使市场呆滞，生产室塞（因流通人为减少），其害更大于通货膨胀。

(5) 法币由新而旧为自然之趋势，今限用破旧法币，结果必使根据地人民特别是农民遭受损失，故为顾全人民利益计，对法币实在不应限用。



这五点好象有理由，其实是极端错误的：第一点，将“联合”绝对化了，忘记联合是有条件的，对反动的金融政策我们是应该防止的；第二点，轻视我们主观的力量，见不到适当限制通货膨胀在我们是完全可能的；第三点，判断敌后法币以后不可能如何膨胀，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关于法币的最后前途究竟光明与否，对当前问题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即使完全光明，也无补于当前的货币斗争；第四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不是停用法币，只是适当限用，决不会有碍市场和生产；第五点，一半是对的，但问题要看全面，假使我们不加限制，人民所受的损失不是会更大吗？

所以反对限用法币，主张法币不分新旧、一律通用，可称为金融上的右倾观点（抱这样主张的同志，发展起来，就会反对发行抗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与前述那种“左”的论调是同样要不得的。

两年来，我们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在抗币、伪币、法币三方面的，大体说来，就是如此。

三、斗争的总结

摸索二年，固然也得到许多成绩，但也犯过错误，这自然是难免的。总结起来，可分述如次：



（一）关于抗币的发行和保卫

对于抗币的发行，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极审慎的，并坚决防范走上财政发行的道路。不过在去年四五月间开始发行抗币的时候，我们有些过于审慎，对于人民之迫切信任抗币，需要抗币，尚估计不足，这多少影响了当时的抗币发行量与发行速度，不过我们很快就克服过来。

在发行技术上，我们有两点是很成功的。第一，为了顺利发行抗币，我们是有意利用上下忙土地税的征收期间，把近千万元的抗币发行出去，抗币威信仍不断高涨。同时，1942年7月以后，我们对于法币不得被迫限用，当时我们即将法币的限用与抗币的发行很好的结合起来，使抗币发行格外顺利，同时抗币也有力地配合了法币来抵制伪币。第二，我们处在敌后，物资缺乏，技术条件很差，发行最怕冒假，在这儿我们遵照华中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充分利用土法，制造特别的土纸来印刷钞票，票版虽极简单（不过五元票也用双色套版），但土纸奥妙，不易仿造，因此盐阜抗币两年来未曾受过假冒的威胁。假票是出现过的，但为数不多，且很快即被识破，内有一种（即五元版）是在上海或从上海带材料来伪造的，结果也不生效。我们的游击战制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我们的土著钞票也抵挡了近代的假冒，这可称为盐阜区货币斗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如果在“扫荡”前后与“扫荡”期间保卫抗币是具有



生死意义的重大课题。盐阜抗币在去冬和今春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考验，这在前面已经约略说过，其中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1. 保卫抗币必须党政军民全体注意，而且很小的地方也得注意。去年12月准备反“扫荡”时，关于如何保卫抗币，我们曾经作了全面的动员，但是不够深刻和切实，结果出了这样的毛病：某部队转移地区时，其上级供给机关照以往习惯（即大家皆爱抗币）发给大批抗币。该部队因要暂离盐阜区，后来就只好携抗币到附近益林市面上去兑换法币。又有机关疏散人员时（有许多是离盐阜区的），也是发的抗币，结果他们后来又只好到附近东坎市面上去兑换法币，结果就无端引起东、益二市商民的惊疑和恐慌，抗币挤兑风潮于是发生。幸亏当时盐阜银行准备充分，及时派员携带大批法币前往应兑，同时又拨动存粮出售，吸收民间抗币，不到三日，风潮即全部平息。这毛病即由于各方配合不够和对小事不够注意。

2. 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武装斗争正在进行期间，抗币的暂时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时，即使有力量应兑也往往不能应兑（环境不许可）。因此这时保卫抗币的主要方法只能是：（1）所有党政军民工作人员一律不用抗币向老百姓买东西，并利用这一行动来对人民宣传；（2）民运同志和民兵分乡分庄，随时随刻宣传敌人的“扫荡”不能长久不能胜利，抗日部队不会走，“扫荡”一过去，抗币会立即恢复其原有的威信，以及银行现在为什



么不能来应兑的理由等等。前者我们今年春间是大体做到的，后者则配合不够。一般说，在“扫荡”期间，我们不宜用军事政治力量来强制人民使用抗币，这是会引来相反的结果的。假使群众基础好，法币准备与粮食准备又充足普遍的话，则也不妨利用“扫荡”空隙（即敌人未到前或已去后）进行小额兑换，这倒是应该尽力争取的。

（二）关于禁用伪币与抵制伪币

盐阜区处在日寇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夹击之间，他们所扶植的南北汉奸组织在金融上还未完全合流，华北为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所谓“联票”，华中为伪中央准备银行，发行所谓“中储票”。“联票”发行虽然较早，但对盐阜区尚无积极侵入的企图。“中储票”虽发行不久（汪逆于去年6月废除法币时才大量发行），但一开始对盐阜区即有压力。所以盐阜区禁用伪币和抵制伪币的斗争，直到去年7月以后才列为行动的纲领，同时所谓伪币，指的也就是汪逆的“中储票”。

按盐阜区敌我地区的对敌和进出口贸易关系而言，伪币可能侵入和首先要侵入的地区是盐城和盐东以及自上冈至合德的射阳地区，一开始我们即在那一带禁用伪币与没收伪币，这样继续了五六个月，前两三个月尚无问题，后来，就渐渐觉得有些机械和行不通。盐东和盐城去年10月以后，就经常来信报告，说那边抗币甚少（带去发行的数十万元抗币，不久也流回阜宁），法币也不多，特别是较



新的法币，因为伪币侵入的机会甚多，事实上也正是一天多似一天。这样政府的征收机关，就处在日益显著的矛盾中：收受伪币不行，但不收受也不行。对于这一矛盾，我们因为缺乏经验，同时对于伪币情况又未经深刻地调查和研究，因此一时也就提不出有效的对策，形成一种“拖”的局面，这是过去两年货币斗争史的一大弱点。

当时盐城、盐东（射阳的接敌区也是一样）为什么出现伪币日增和法币日少的现象呢？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局势呢？当时同志们的答案是不一致的，或者说都是不成熟的。有的说这是抗币在盐城、盐东发行不多的结果，因此主张增发抗币来抵制伪币，是的，增发抗币是能抵制伪币的，但是盐城、盐东在伪币日益增多之前，是有足够的法币流通的，法币为什么又少下去呢？它为什么也要让给伪币呢？由此可见变动的原由尚另有所在，至于行署当时未在盐城、盐东多发抗币的原因，除掉印刷关系而外，主要还在我们的发行政策与汪逆不同，即我们不愿任意滥发纸币。今天用以收购人民的物资，明天就使人民受通货贬值之苦，何况我们处在敌后，当时又不能多多收购物资来充当发行的准备。

又有人说，法币日少的原因，是法币没有了来源。盐东的同志曾说盐东的物资交换有两大巨流，一是运棉花去山东，再从山东运大盐和生油回来，一是运大小盐西行而带粮食回来，是具有原始物资交换的性质，故法币不会增多。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极不完全极不妥当的。



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盐东、盐城当时伪币日增法币日少的原因有三：第一，敌据城市和占有工业品，在物资交流上自然胜于农村，伪币乘机从盐城县城及南洋岸等据点渐渐侵入我之边区及敌占区，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第二，当时正是伪币大显威风和法币开始倒霉的时候。同时除上海之外，我周围敌伪据点尚承兑法币和行使法币，于是法币出去，伪币换回，多少也是一时风气；第三，我们当时一味禁用伪币，而实际伪币则日益成为半公开的流通工具，它与法币的比价，在我名为禁用，实则等于听其自流的情况下，一般人民又承认了汪逆的一与二之比，实际伪币比值是没有这样高的，这多少也促使伪币向我地区流入。因此我区当时在盐城等地区，对于伪币除了禁用没收政策外，在不得行使伪币的地区，实在还应更成熟地有策略地来领导人民“贬值承用”伪币，以达到适当抵制伪币的目的。

去年12月以后，一方面为了应付反“扫荡”，一方面开始见到以上的伪币对策过于单纯，于是才在盐城、盐东、射阳等部分地区改为“贬值承用”伪币的对策。可是当时仍因情况了解不够，和囿于人民一时的利害反映，我们所定伪币的比价仍在其实值之上（开始为一元四角，后下降为一元一角），同时再加个别税所吸收之故，伪币遂更充斥，这错误到今春反“扫荡”胜利后才纠正过来，而且不久即显出成绩，伪币减少下去。

七月间，我们得到一些情报，谓附近敌伪据点内的伪币比值只能一元合五六角了，伪币有不断下跌之势。因此



我们遂决定盐城等游击区，将伪币按票面对折流通。这决定贯彻下去不久（也就是立即的）即发现商铺关门或将物价提高一倍的现象，这证明我们的这一决定有了错误。今据苏中工作的同志见告，当时苏中亦发生相同现象。考其原因是这样的：六七月间确为伪币狂跌之际，跌到将近五六角也是事实，可是就在这时，汪逆以半抢半购的方式，掠夺上海所有厂商的存纱、存布的强盗行为也开始了。这刺激着伪币的购买力，使之上涨，其过程如次：汪逆强迫收买存纱、存布，是按其“官价”而非市价，两者相差大概总有四分之一上下，同时又只先付三分之一现款，其余三分之二要分两年偿付，如此，纱布业者的损失自然是足够惊人了！因此他们就尽可能预先贬价抛售存纱、存布，伪币就交到恶运上涨了一些（对法币亦是如此）。而我们则适逢其会，反贬低伪币，相对抬高法币（要一元法币买二元伪币的东西），这样，盐城、盐东的商铺，不是关门相拒，就只好抬价相迎了（因盐城、盐东皆按伪币标价），否则，他们回到敌伪区去办货，就将对折亏本。

自规定伪币对折使用以来，盐城、盐东又显现出伪币日少和法币、抗币日多的现象。同时因抗币、法币不能南下购货的关系，伪币反有更受人民欢迎之势，这自然是上述变化的发展结果。这一方面是好的，因为抗币、法币替代了伪币；但另一方面亦须再加调整，因为在盐东特别是盐城，贸易上的对外支付是经常的，这必须用伪币。今法币（包括抗币）与伪币的比价相差过巨（法币便宜伪币吃



亏），伪币必难吸收，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伪币来应付商人当对外支付时携抗币前来兑换的要求（除非我们不怕巨大损失，长期赔补这兑换上的差额）。因此为了使法币尤其是抗币能在盐城、盐东持久坚持，我们有适当依照客观情况，改计伪币、法币的比价的必要。根据历次经验，这事应交盐城、盐东二县政府机动处理，原则是：在接敌区不是完全禁用伪币，而是适当的贬值承用，其贬值程度不宜过低，例如目前大约为伪币一元合法币八角，我们则定为六角或七角。盐东已经这样修改了，结果还不错。

这一年来的伪币斗争，使我们老练不少。我们深深觉得伪币斗争也正和敌伪军工作一样是极端复杂的，而了解敌情尤为胜利之道。过去一年我们吃了不少“主观主义”的亏，这是值得今后整风过程中引为教训的！

（三）关于限用法币

限用法币，是我们的法币对策，但在去年4月以前我们还没有明确采取，当时我们还是犹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顾虑限用以后：（1）携有较旧法币的人民会受损失，他们会不满政府的措施；（2）较旧的法币既不能顺畅流通，市场通货收缩，将会影响商业。到4月以后，汪逆破坏法币的罪行一天天厉害，东、益等市场拒用旧法币或对旧法币购货即将货价抬高等现象一天天普遍和严重起来，政府征收机关为了保证财政支出，也就不得不采取明确限用的办法了。当时我们已经见到两点：（1）在汪逆的



正面破坏之下，国民党又置我敌后金融困难于不顾（即不授权民主政府烧毁破旧法币或运送新票来承兑），我们是无法挽救人民的一时损失的，而且不忍痛一时来限制的话，盐阜区可能成为破法币的汪洋大海，人民的灾难更会深重；（2）盐阜区有大批食盐西运（为鄂皖所必需），对流回来的一般不是货物，而是法币，同时因国民党的发行机关在西边，东来的法币在我们的限用政策的影响下，可能是全部新的，因此所谓“通货紧缩”对我方的影响是不会如何大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现在看来，当时提早确定限用对策倒是更好的。

去年6月，汪逆废除法币，给我们很大的威胁。前面说过，当时有同志认为法币在华中敌后会很快垮台，因而主张不择手段，多多发行抗币，代替法币，我们也愈快停用法币就愈好，以免汪逆将那即将成为废纸的法币排斥到我根据地内抢购我物资，使我人民受害。对于这主张，我们未全部采用，因为我们了解汪逆对法币的破坏虽较数年前华北伪政权更为猛烈，但华中法币基础也胜于华北，所以法币不会一下子就垮台下来。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当时对于伪币前途的估计仍是低了一点，以为它的力量将很快地被削弱。所幸当时这种估计上的偏差并未造成行动上的任何错误。对于伪币当时曾计划收购一部分以作为对外支付之准备外（这点后来也做得很少），基本上仍是采取彻底禁用的对策（详细见前）；对于法币，我们当时也不过一方面更严格一点来限用，另一方面即实行贸易管理，堵止汪逆破坏法



币排斥法币的阴谋。此外，我们当时还计划提早发行盐阜银行的本票来收兑法币（因抗币票面太小），并将这法币贷给商人到根据地外去购货回来，以抵制汪逆排斥法币的阴谋。结果因这办法有些“主观主义”，并未实行。

去年12月以后，为了准备反“扫荡”，我们曾将法币的使用标准略微降低，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到今年5月，行署又重新布告凡“号码齐全、版纹清晰、不破不补”的中、中、交法币，皆应流通市面，从现在看来，确是害多于利和不够策略的。大“扫荡”之后，抗币尚未完全稳定，同时敌后据点增加，伪币侵入的机会和孔道增多，继续维持去年12月降低法币使用标准的规定固然也有必要。例如淮安南部两三个区，原为韩德勤部驻地，大“扫荡”后变为敌我对峙的地区，那儿原来所流通的就有很多较旧的法币，如果没有五月布告的影响，伪币是会很快侵入的。同时，大“扫荡”之后，民间较旧法币比以前增多，假使当时法币使用标准让它提高，人民会受很大影响，这也是产生五月布告的原因。在这方面，政府也的确给予人民一些帮助和便利，特别是七月间人民缴纳土地税时。但是五月布告终是害多利少的，收进来的3,000万元土地税内有八九百万元较旧的法币是要八折才能使用出去，政府财政颇受损失。尤其是五月间法币使用标准已局部提高，今出了布告，自然使政府以后处理法币问题时，减少了机动性，这是不够策略的地方。五月布告的产生，一是由于看问题还不够全面，二是由于对客观事物的推移和趋势估计



不足，这也是值得今日整风过程中引为教训的！

根据去年7月以后和今年五月布告以后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周围敌伪据点禁用法币和法币按票色新旧的程度打各种折扣使用的事实，以及我根据地内对于较旧法币因受敌伪影响，实际上也在或明或暗地折扣使用或者拒用，我们遂于8月初旬决定法币公开分等使用，即“不缺口、不毛边、不剪边、不油污、不洗刷”的中、中、交法币按票面十足流通，不合上述标准但“号码齐全、版纹清晰，不破不补”的较旧法币则按票面八折使用。我们这样决定的理由是：（1）使不会如去年7月以后那样只有新的法币好流通，以免法币过于收缩；（2）较旧法币虽然也可流通（一如五月前后），但承受者可不再吃亏或用不出去。这样对于抵制伪币侵入和“扫荡”前后特殊情况的应付，皆有帮助。当然，这办法也和其他限用法币的办法一样有缺点的，例如票色界限难以划分，容易引起人民纠纷，政府征收机关容易发生贪污流弊等等，因此曾有不少同志反对或怀疑这一办法。其实他们不了解如不采用这一对策，缺点和窒碍可能会更多些。今天我们处在敌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敌后法币问题又不负责处理，我们是没有十全的方法来解决破旧的法币问题的。

这分等办法实施之初，一因动员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深入普遍，二因票样未统一发至各区各乡，三因陕甘宁边区问题发生不久，人民怀疑政府此举与国内政治问题有关，政府第二步或将完全不用法币，因此种种原因，就是



原来可十足流通的法币也为人民所不乐用，人民几乎全要抗币。同时对于八折票有乐于吸收的，也有不愿吸收的，持有八折票的有愿意八折用出的，也有不愿意的，市场曾一时混乱，物价上涨，交易双方亦多纠纷并影响交易，贪污投机的行为一时当然难免。不过所有这些不是发展的，而是日渐减少的。今市面上新票日多，旧票日少，前者可照票面流通，后者可八折流通，渐渐成为习惯，物价也平定下来。盐阜区人民自去年7月以来，即有“照票”经验（即看票子能否十足使用），今则更行普遍。现在留下来的主要问题有下面两个：一是军民之间尚有纠纷；二是十足和八折法币的标准，市面上皆较政府规定为高（今市面几乎只行使中央银行30年后版的10元新票一种）。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准备由盐阜银行组织流通兑换处普遍赶集市，按规定用抗币来承兑十足票和八折票，使两者皆能顺利流通（区政府和分派所也配合做）。兑回来的法币即作为抗币的发行准备金，到“扫荡”发生时又可用这些法币来稳定抗币，以后我们对内支付（如军政机关人员购买办公用品等）尽量做到使用抗币与十足法币，对外支付（如购置大批西药材料等）则尽量使用八折法币与伪币。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调节今后的货币市场，这在过去是做得不够的。

法币分等使用以后，还发生下面两种现象：一是有人在益林专门收买八折票，带到南边去做票子生意，而不买货出去，故一时会影响我豆饼、豆油等土产的出口，现在



这现象已减少下来。二是有一种中间法币，十足够不上，八折又不舍得，于是市面上遂出现“九折交易”，今仍存在。这两种现象也是情理中事，且与我根据地的货币斗争无害，所以政府不加干涉。

八折票南流的原因，据说很多，主要为：（1）我们的八折票色或比南边敌伪据点的法币市场高一点，此中有差利可图；（2）我苏中根据地及我盐城、盐东二县税收法币标准较低，商人可以用这边的八折票去十足缴税；（3）当时长江下游谣传日寇将撤退武汉，中央军要东征（这与谷荻三次诱降或有联系），人民因而有收藏法币的。诸如此类的原因，都是没有持久性的（偶然性很大），因此，八折票南流现在也少了一些。

关于法币分等使用，现在亦有同志为了想避免分等的麻烦和纠纷，主张仍如去年7月以后一样，干脆只使用十足的法币，政府不收八折的，听民间自流（实际促使较旧法币更不能流通）。如要这样改变，我们认为必须注意下列两大条件：（1）要本区经常有足够的新法币供应市场流通；（2）改变以后，人民和市场所感到的困难要不比现在多。可是这两点现在还是不够成熟的，因而我们当前的任务还是继续贯彻法币分等使用的办法。

四、关于配合作战问题

在过去两年的货币斗争中，盐阜区与附近兄弟地区



（主要为苏中与淮海）是没有联系的，也可说是孤军作战。与淮海虽有一度联系，但也不过通汇关系而已，在作战方针与作战步调上仍是各干各的，而且不久就连通汇关系也终止了（因淮海遭“扫荡”之故）。这一缺点大概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是同样存在的，但是这缺点并非平常的小缺点，而是有严重影响的，因此我建议军部以后应注意领导华中各战略单位在进行对敌货币战时，应取得方针上和步调上的基本一致。

这里我举出几件事情来说明相互不一致的害处。

（1）苏中的江淮票开始亦按一与五之比发行（即江淮票一元合法币五元），以后涨至七元，现在为九元，盐阜区则基本照旧，因此在抗币政策上两者是不一致的。孰好孰坏，相互情况不同，尚难论断。但盐阜区抗币不涨价，多少会使苏中抗币的涨价受些影响（特别在毗邻地区），减少它对伪币的压力。

（2）当我们将伪币与抗币的比价从二元降为一元四角和一元二角的时候，苏中似已降为一元比一元，这显出我们给予伪币的打击是不一致的，火力是不够集中的。

（3）我们对法币采取限用政策，今体现在分等使用，据淮北来信，那边颇受我们这一政策的影响，法币问题亦复杂起来，难以应付，这就是相互配合不够的结果。

不过处在今日敌后的条件下，华中各战略单位在货币斗争上要取得完全的一致，那也是不可能和不妥当的，我认为对抗币适当增发，全力支持，对法币限用与支持同时



兼顾，对伪币则全力排斥或禁用，这三点是各地应该一致的。至于如何实行这三点，即可各有各的机动性，但事前或事后相互应以通讯联络，免得过分分歧。关于这配合作战问题，因过去注意不够，我只能提出以上一点意见，以供各地同志参考。

1943年12月



盐阜区农村的巨变*

苏北盐阜区自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以来，贫农、中农、富农所有土地逐渐增加，农民不是相继破产为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而是相继上升为中农与富农。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业资本家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被停止了，甚至他们原来所集中操纵的土地也逐渐分散。他们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是低落下来了，这是盐阜区农村的空前巨变。

根据1944年春间阜东5县431个乡（内旱田约占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户口调查，以及将这调查所得的统计材料，与国民党在抗战前（在1932年前后）所调查的陕西、河北、江苏、广东、广西等五省的有关材料作一对比，我们即可明白看出这一历史巨变的大概轮廓。

下表告诉我们，在民主政府统治下：（一）贫农户是减少了（他们已部分地上升为中农），但其土地却反增多。（二）中农户及其土地均呈显著增加。（三）地主的

* 本文原载苏北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盐阜报》，转刊于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19日第3版。



时 期	阶 层	户 数 (百分比)	所有土地 (百分比)
国 民 党	贫 农	70.1	19.4
	中 农	19.0	17.8
	富 农	6.4	18.0
	地 主	4.5	45.8
	其 他		
民 主 政 府	贫 农	62.3	22.0
	中 农	27.7	28.9
	富 农	6.1	14.3
	地 主	2.1	28.0
	其 他	1.8	6.8

户口及土地数呈显著低落。其次，我们再用涟东县1942年与1944年的对比材料来研究，该县在1942年春，依照全区布置曾进行全县土地和人口调查，当时被调查的户口为34,296户，被调查的田亩为783,422亩，至去年（1944）春该县又依照全区布置，作全县土地和人口重新调查，被调查的户口为32,891户，被调查的田亩为758,60亩，其范围与1942年相差无几（该县1944年户口及田亩数较1942年为少的原因，乃该县有若干乡当时已划归淮海县建制），两次调查的结果如次：



涟东县近二年各阶层户口及其田亩增减比较表：

时 期	阶 层	户 数	所有土地
一 九 四 四 年	赤 贫 农	10.1	1.3
	中 贫 农	18.8	6.9
	上 贫 农	18.4	10.0
	中 农	24.4	27.2
	富 中 农	24.6	20.8
	富 农	8.5	18.3
	大富农小地主	2.5	8.6
	中、小地主 大、中地主	1.56 0.14	9.4 3.59
一 九 四 二 年	赤 贫 农	14.0	1.3
	中 贫 农	24.0	7.1
	上 贫 农	18.0	10.1
	中 农	21.5	22.1
	富 中 农	13.0	20.7
	富 农	6.5	20.1
	大富农小地主	1.6	7.2
	中、小地主 大、中地主	1.22 0.18	7.7 3.7

根据上表看来，我们当不难指出该县近二年来各阶层土地分配关系演变之趋向及其进度。兹分述如下：

十亩以下的贫农，近两年来户数减少 9.1%，但其土



地仅减少0.2%，这说明一部分贫农已上升为上贫农或中贫了，留下的原有贫农其所有土地则是相对增加的。

中农和富农的户数近二年来是增加的，其田亩数则反稍有减少，这方面的矛盾现象，乃由以下事实形成，即：原有贫农、中贫农相继上升，则中农与富农户数显然增加，但由贫农和中农刚上升为新中农和新富农，其所有田亩，自不易赶上已上升为富农和大富农的老中农和老富农之原有田亩水平，因此田亩百分比就稍有下降，所以实际两者并不矛盾，皆为原有贫农、中农上升之结果。

相反，从地主阶层来看则是这样的规律存在，即：自大地主向小地主乃至大富农推移，是很明显地呈现着相继向下的趋势，大中地主的户口数及田亩数近二年来是缩小的。至于中小地主户口及田亩百分数之增长，是不能作为地主阶层上升的象征的，而且正相反，是原有大地主下降为中地主，原有中地主又下降为小地主。这个下降过程的反证即是：前例大富农和小地主这一阶层户数与田亩数之增加，大部分是原有小地主下降的结果。

以上这些变化，也同样证明前述的历史巨变。这些巨变的根本原因，即在抗日民主政府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它坚决与全边区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实行了减租减息，展开了生产运动及推行了累进税等合理的土地政策，使平均地权主张得以真正实现。这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是具有决定关系的。

不过由于解放区建设的时间短促，以及由于社会经济



改造工作的艰巨，盐阜区的全户口中仍是62%为贫农，他们占有全土地22%，他们的生活不能足食，这问题要进一步解决，还有待于我们继续贯彻减租减息法令，以及各项民主建设，特别是大生产运动。



如何解决战时部队 的油盐菜供应问题*

由于我数千万野战军与民伕，集中在物资非常分散落后的农村中，同时又担负着高速度的大规模的运动歼敌任务，故上述军民一进入战区，就必然遇到油、盐、菜供不应求的严重矛盾，有时甚至陷入“淡食”状态中，这会削弱部队战斗力，同时也会妨碍群众纪律与军民团结，在经济上它还会混乱物价与贸易金融，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并越过一切困难，来克服这一矛盾。

最近华东局与军首长根据过去的零星经验及目前的形势和情况，已决定试用下列两种办法来解决或减少这一矛盾：第一是责成支前会、工商局和供给部三个系统来设立公管性质的供应站；第二是通过地方党、政与群众团体来动员各村庄的人民组织民管性质或群众性质的军民供应合作社（这是我试拟的名称），现在前者已在积极着手进行。对于这两种办法，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经验或者仅有很少的

* 本文载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1947年7月14日第



经验，我们还得慢慢摸索，一面研究，一面试行。现在我暂提出以下初步意见（其中有些是经过同志们共同讨论的），以供同志们参考和讨论：

一、确立信心

要办好一件事，首先条件之一，是要我们对这件事能确立起完全的信心，做到精神上完全不犹豫、不动摇。对于前述第二种办法，我们还没有得到反映，但是对于前述供应站的办法，我敢说至少在供给部门的同志中间是有抱着怀疑态度的，认为这件事难以办好。这些同志的怀疑是有其一方面根据的，因为去年华中淮北战斗与涟水战斗时期，地方和部队曾组织过供应站，虽然也有些效果，但大体说来，是失败多于成功，当时经常有这些现象发生：

（1）准备好的油、盐、菜赶不到战地，赶不上部队，所谓“马后炮”。（2）赶上的菜往往烂了或者走了味，部队不要，不欢迎。（3）部队要行动，即使供应站有好的油、盐、菜，也不愿买去带着。（4）杯水车薪，供应站的东西一下就卖光，无济于事。

这些非“偶然”的现象，当然有其客观原因：比如蔬菜天性容易腐烂走味，油类不易携带，部队流动得快，其流动面积又广大，再加当时支持供应站的运输力和财力又极有限等等。不过我们如果根据这些现象和原因，对供应站工作即作出全面的固定的结论，认为以后亦难办好，那



就会犯错误。譬如我们如果对供应站任务不提得过高，仅要求他能供应部队的大部分油、盐，一小部分蔬菜和肉（比如每个月能供应七八天），同时在派遣各级供应站的干部上，在财力和运输力的支持上，如果领导又都能使之做到“相当充分”的程度，供应站工作就不会难以完成，而目前华东局和军首长则正是这样要求和决定的，并指出这是供给工作和工商局工作的新方向。所以我各级供给工作同志，首先应放下“怀疑”的包袱，提高信心，配合支前会和工商局来迎接这一新任务。

二、供应站的根本问题

关系供应站成败的根本问题，主要有三个：

1. 运输问题——我们虽处于物资分散落后的农村，部队消耗量又惊人巨大，但在一定时间内，筹集一定足够量的油、盐乃至蔬菜、肉食之类，倒不是不能克服的难题，真正的大困难是如何完成运输。关于这一点，军首长已下定决心，专门拨出足够的运输力（保证这一个月能转送三四百万斤油、盐、菜）给供应站系统使用。现在留下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支前会如何保证调度和照拨；二是供应站本身应如何周密地合理地将这批运输力分配在后方的采购系统，前后方的运送系统，以及战地各供应站到团队的分配系统，并加以联系和组织。对这两件事，我们应十二万分的重视和注意，根据初步经验，对¹万人，如果供应站负



责供应其全月蔬菜（包括油盐）三分之一，即约重10万余斤，则每日约需15辆小车的运输力，但其物资补充线（即从物资采集处或储存处到供应站）只能限在三十里之内。如果补充线延长一倍，运输力亦需约增一倍。

2. 财力问题——筹备大量的物资，自然要大批地资金，对这一点，华东局亦有了决定和保证。现在应接着注意的为以下问题：第一，从“垫款收买油、盐、菜、肉到卖给部队收回现金”，这一循环，为时至少需要两个月，因此财政应与工商局在采办资金的预算方面，至少应做三倍的准备。第二，对供应站工作应以及时完成对部队的供应为主，对于供应物品的成本及盈亏计算，应为次要问题。去年在华中时，曾有个别供应站过分为上级规定的成本价格所限制，不敢低价出售，以招揽部队，致使东西等着烂了，或者只好再加运力和运费，运到部队新的驻地去供应，这既不合时，又不合算，实有纠正之必要。第三，为了使部队对于供应物品能够接应，财政上尚需要准备一笔支出，使各连队能够立即购置挑油盐的担子乃至补充驮运蔬菜的一部分毛驴。以上三种准备或观点，我们必须确定。

3. 干部问题——供应站工作，可以而且必须联系粮站、民站及后述之军民供应合作社来进行，但是它自己必须有自上而下之独立的执行系统，否则，工作即难保证贯彻。粮站机构绝大部分是依靠地方原来的粮食局系统，部队供应部门则予以配合；供应站机构由上而下，主要就得



依靠各级和各地的工商局，另再吸收一部分新力量来负担；同时部队供给机关，亦应扩大或增设供应处、科、股的组织来配合。这一机构和干部问题，是需要大家下决心，并分清当前工作的轻重缓急，才能迅速解决。

以上三个问题如果正确地处理好了，则战时部队蔬菜供应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完满的解决。

三、供应站的基层组织

根据粮站的经验，供应站的基层组织，应该是配合着一个纵队部，设立一个供应（中心）站，再在其左、前、右各个方向配合各师团设立若干个供应分站（或称供应点）。供应物资即由他们来运取，或由后方运给他们，然后再经过他们配售到各团（连）去。这基层组织是随着部队的运动方向，由当地或附近之工商局抽调公营商店人员及新增加的人员，临时会同纵队以下的供应科、股的人员组织而成，而以前者为主。这基层组织由支前办事处与野战供给部会同该战区最高工商局（或者工商局的代表）领导组织之，并布置其工作。

这基层组织应控制有足够的常备民伕，以便协助各团转送供应物品，部队必须保证不扣用该项民伕。

这基层组织并要善于组织和联络附近的小贩、糟坊、手工业者、屠户等，临时协助供应站工作，如附近有群众合作社一类组织，就更应增加办法，联络和运用。为了扩



大供应物品之运销，供应站尚可考虑公私两利，将他们变为自己的供应网，这在试行有效以后，恐怕是值得大大推广的供应方法。

四、供应物品的购买

由于我们不能普遍设立供应站并保证充分供应，故对部队的伙食费，我们目前仍须照发。因此，供应站的物品今天对部队仍须采取现金交易制，部队保证必须付现，并须尊重供应站之标价。因为供应站定价往往低于市价（甚至会相差很大）的缘故，部队方面会有个别人员趁机贪污舞弊，或者低买进、高卖出，或者代替老百姓来买，私做人情，故对出入较大的供应物品，必要时尚宜采用“配给购买证”制度，该证可由各团供给处有限发行，无此证各连队即使付钱，亦不得购买。这同时又可防止供应站个别人员对上谎报供应物品已售给部队，实际是高价卖给商贩，以图贪污的行为。

各纵供给部及团供给处，在领导上尚应注意这样的特殊问题（这在以后将可能时常发生）：即当基层供应站存货尚多，而部队又将移动时，或其存货虽不多，但部队不甚欢迎时（因不合胃口或有些走味），为了节省民力及减少公家损失，我们应尽量设法使各团队能将该项存货统统买走，甚至即以实物代菜金直接发给各团，这样做时，供应站当然亦须对物价作适当的机动，而不能为不正



确的财政观点所拘束。

五、军民供应合作社

要解决数十万军队集中于一地的战时油、盐、菜供应问题，单靠前述供应站一种办法，当然是很不够的，这主要恐怕还得依赖群众性的军民供应合作社（特别是菜的部分）。对于这种组织和办法，我们过去还毫无经验，但是根据公粮公草制度的实行，以及人民之热烈拥护当前的爱国自卫战争的情形看来，这并不是不可推行的。我暂提出以下意见，以供参考研究：

1. 军民供应合作社应为人民志愿支前的一种经济组织，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即被指定的地区，凡村庄皆必须组织与参加，作为村政权的一个附属部分，其日常工作可由村财粮委员兼管，繁重时亦可另选人来管。

2. 每户皆为合作社社员，其基本任务为依照村政府或合作社的规定，经常准备着一定量的蔬菜（鲜菜、盐菜、干菜等），随时听候集中，并随时准备补上。该项被集中的蔬菜，村政府或合作社必须立即或于最短期内按一般市价付钱，绝非征发性质。

3. 准备哪些菜，准备多少，被征购以后是否须即继续准备，这些都要看季节与战争情况来规定：一方面要保证部队供给，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勉强人民。各户准备的蔬菜，公家可不负必须按时征集购买之责，因此各户村不能



再存储下去的蔬菜，应自动替换其它蔬菜以免损失。

4. 该项蔬菜将视情况由行政上通知，或按村或按县区集中，或就地设铺（即找一地点挂合作社招牌）按定价售与部队，或随本区、村出伙之担架、小车，顺便运交前方指定之供应站，以供应部队。

5. 对于军民供应合作社，村政权应负责直接组织与领导，村支部应负责保证，群众团体应负责协助（或相互结合起来）。在经济上各区、村的军民供应合作社，应受工商局指挥，以便通过工商局系统，将公营的供应站与群众性的供应合作社相互结合起来，统一为前线部队服务。

6. 对于军民供应合作社这一工作，容易产生的偏向可能有以下四种：（1）单纯的行政命令，而不注意政治动员；（2）对于各户准备蔬菜，会因作价过低或付款过迟，而变为不合理的摊派负担，及规定各户准备蔬菜时的平均主义倾向；（3）村干部的贪污舞弊；（4）开始推行时，由于没有经验及对帐务的忽视，会形成经济上的混乱。对于这些可能产生的偏向，我们应警惕预防。



新区初期的部队供给工作*

本文尚未经前委审查，兹先付印，以供同志们业务研究之参考

第一部分 新区初期部队供给工作的特点及其基本任务

一、特点

下列特点是我们必须注意和掌握的：

（一）无政权依靠，无后方支援，一切要自筹自给，而且要爱惜新区，长期打算，将新解放区和革命家务建设起来（发展观点）。在这初期，部队供给工作，不仅为领发分配工作，而且要兼负地方政权的财经工作，筹粮筹款，对人民利害，有更进一步的直接关系（群众观点）。因此对于党的政策，就更更要多方学习和注意。

* 本文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后勤部《新区财经供给工作（参考文件）》（1948年5月编印）。现存江苏省盐城市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纪念馆。



(二) 取之于敌,以战养战,成为更直接更重要的供给来源和方法(战争观点),因此“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必须毫无折扣的贯彻,过去那种浪费破坏不缴公的恶劣现象,必须坚决纠正过来。我们应从零乱走向有组织,由盲目走向有计划,有计算,组织新区一切经济力量,结成整体,支援空前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

(三) 由下而上的分筹和由上而下的统支,成为保证新区供给的决定关键(统一观点)。这必须每个同志自觉地遵行。在这方面,我们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下对上的本位主义,不尊重上级的统一调度,一是上对下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面的困难,机械强调制度。

(四) 战斗频繁,情况紧张,一切工作皆要极敏捷地进行,善于掌握时间因素,并要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做到全党当家(合作观点)。例如各级军政负责干部,今后在部署战斗时,就应周密地考虑到吃饭、缴获等问题,帮助财供机关预作布置,政治和民运机关与财供工作的互相配合等。

二、基本任务

(一) 保证部队的粮食、菜金(给养),这主要靠向新区人民筹措;

(二) 保证鞋子的补充,这将以团为单位,沿途分期相继补充,方法是利用缴获的废物及粮食等向人民交换;

(三) 保证擦枪油;



(四) 保证最低限度的敷料（棉花纱布）与电料的补充，这主要靠缴获；

(五) 供给标准中所规定的其他供给，则看情形办理，停发或减发。

对于以上供给任务之保证及供给标准之执行，我们今后应特别注意下列三个问题之正确处理：

(一) 供给标准的兑现问题——财政或分筹困难时，即公开说明情况和理由，减发或停发，而不要主观地强制压低物价，以免上下级在物价上扯皮，妨碍团结。

(二) 苦乐均衡问题——在各部分筹自给的方针之下，必然要产生苦乐不均的流弊，故各部必须服从统一调度，“抽肥补瘦”，但是要做到随时随地皆绝对均衡也是不可能的，故一面要反对本位主义，一面也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三) 局部需要与整体需要的矛盾问题——各部分筹自给有余的部分，调剂出来，帮助其他兄弟部队，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有时（今后会经常遇到此种情形），在你团也不够，但其他部队更不够，在此情形下，当仍要从你分筹所得项下，拿出一部分来调剂全盘需要，这时就困难了，反对本位主义与照顾整体利益的党性考验，主要是在这样的关头，这是我们今后要共同注意和努力的。

为了有助于以上问题之处理，我们建议以后要将革命家务——财政收支状况，作有计划的公开报道（利用会议、团报或专门出版物），做到经济民主，全党当家。



第二部分 豫皖苏初期解决给养问题的检讨

对于豫皖苏初期的部队给养工作，今不作全面检讨。现在只检讨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何解决给养问题。

首先，讲一讲我军去年八月间向黄河南，向陇海路，向豫皖苏新区进军时的情况。当时由于时间仓卒，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差，供给部门亦然。一是表现在“物资准备”上，当时尚有少数战士未发齐单衣，其他如米袋、夹被、炸弹袋、子弹袋等装具，亦很不齐全，经费不特不充分，而且全是本币。其次，是表现在“思想政策的准备”上，这是关系以后工作更大的问题。当时各级领导对于进入新区以后，应如何筹给养，其政策与具体方法应该怎样，可能发生哪些偏向，要预先注意防止等等，皆是很少准备，甚至没有准备的。

由于上述两种情况，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故在豫皖苏初期工作中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缺点和偏向，不过同时亦有其成绩的，今分别检讨如次：

一、成绩

首先说成绩。由于我们搜集的材料极不完全，只是一些零星典型材料，故不能作全面统计总结，因此不能说提到名的，就是有成绩或其成绩大；没有提到名的，就是没



有成绩或其成绩小，这是要申明的，我下面列举成绩皆是带有全兵团性的，各纵皆有一份，个别举例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

主要成绩有四：

（一）物资上自筹自给的成绩。南下以来，部队没有饿饭，全部粮草皆部队自筹自借，这是很大的成绩，同时自给经费亦约有一个月。南下后，冬衣、鞋子等虽仍赖河北前运供给，但各纵自己也从缴获没收中解决了一部分。例如：四纵十二师在涡阳曾以缴获之粮食，调换一部分棉花装被子；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南下以后，自己解决棉花2,500斤，鞋子2双（一双用旧衣找群众换的；一双集体筹粮解决的），子弹袋130条，被子61条等，这样的例子各纵师团皆是有的。一纵在许昌四十一天当中，收得税款（烟业运销税）65,000万元（合蒋币150万万元），解决了许多问题。该纵当时尚为野供解决了2,100万元的物资，四纵2,900万元现款及3,000件衬衣，八纵3,000把洋锹和8,000副绑带。

（二）政策认识与工作经验提高了一步，这是最大和最宝贵的成绩。前面说过，我军在出发时，对新区各项准备工作的政策和经验是没有准备或很少准备的，但经过半年“实践”的锻炼和教育，我们是提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搞好），今举例说明如次：

1. 农村筹粮方面：我军南下开始时，大多用摊派方式，向人民借粮，致使中农与贫雇农也与地富一样有负



担，这是不合政策的。到后一时期，各纵皆有转变，除没收大地主与恶霸的粮食充作军粮外，筹措时则纠正普遍摊派的方法，这可举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机枪连粮秣上士张文斌同志的一段话来表明这一转变，他说：

“我在郾城西某庄（二百余户）筹粮，该庄出来几个办公人员，向我们接洽，我们事前已在旁庄及该庄穷户中初步了解了一些，当时办公人员答应找麦子2,000斤。支部书记对他们说，只找地主富农筹措。他们含糊答应，不多一会，已筹齐堆在办公处，要我们接收。支部书记叫他们将筹措户名册交出来，发觉是摊派的，立即退还原户，另行指定四家富户借到1,200斤，搞好后召集村民宣传我们的借粮政策，并嘱咐办公人员，以后不许再摊派。”

2. 城市工作方面：譬如一纵队开始进碭山、漯河等城市的时候，是很混乱的，违反政策之处甚多，后来进许昌时，情形就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如下：（1）注意撤出非城防部队；（2）预先即调集干部，准备好公安、财粮等政府形式的组织进城工作，民运部与供给部取得密切配合；（3）布告安民，召集商民座谈会，宣传政策，以求秩序之恢复；（4）对官僚资本没收很慎重，并注意政策。该纵利用烟业行及转运公司的来往信件及帐册，调查出与四大家族有关的烟业，予以没收，是比较好的范例；（5）结合没收工作，对其他烟业觅保报税放行推销，既利当时许昌商业的恢复，又收得巨额税款；（6）将各师采办人员集中，统一军需用品之采买，以免抢购混乱。故该纵在许昌的工



作，比起该纵在杨山时期，真有很大进步。

(三) 制度观念开始树立，本位主义开始下降。部队自进行土改学习以来，对统筹制度逐渐重视，本位主义开始下降，这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1. 小金库缴公。在此休整期间，前委号召各纵师团南下以来从没收缴获等收入中打埋伏在小金库的全部缴公，今已自觉缴来者据初步统计如下：

单 位	金 额			
	本 币	蒋 币	金 属	银 属
一 纵	23,218万元	103,865万元	1,458两(另金戒165只,金圈2只)	1,747两(另银镯银戒377只,银元9,330元)
四 纵	2,249万元	62,617万元	342两(另金戒226只,其他金件24件)	314两(另银元3,129元)
六 纵	4,027万元	112,290万元	198两(另金戒4只)	937两(另银元3,351元)
野 直	3,049万元	871万元	34两(另金戒10只,金镯3只)	302两(另银件八件,银元5,466元)
合 计	32,543万元	279,643万元	2,032两(另金戒445只,其他金件33件)	3,300两(另银元21,276元,其他银件385件)

不过上表中所统计之本币蒋币，半数以上已经各纵开支了，是转帐性质，只有半数及金银实物是真正缴公的资财。



2. 战斗缴获丝毫未动。这次六纵在兰封战斗，其四十九团缴获汽车11辆；载有烟叶、花布、香烟等物，战士等均丝毫未动，并着一营派人送至团供。

其四十六团缴获汽车8辆，装有洋面、行李及部分枪支弹药，部队亦未拿动，团政主任陈励耘同志并即派员押送师供。惟该团第二天又假冒该师首长的决定，说除缴上7辆汽车外，其余皆分给该团。这是本位主义开始动摇而尚未完全克服下去的表现，有其好坏两方面。

(四) 扩大我党政治影响，启发了群众斗争性。由于我在没收大地主官僚恶霸的财产和粮食的过程中，不特向贫苦群众宣传调查，而且也将没收来的资财，分发群众。例如我在太和县没收敌救济物资，当即拨出面粉6,000斤，黄豆5,000斤，豆粉6,000斤，牛奶1,000筒，衣服1,000余件，分发群众。在潘寨没收顽师长潘之中（家有田八百余亩）财产时，分给群众粮食250担，衣服10箱又150件，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故新区人民更认识我军的本质，欢迎和盼望我们，并也敢于参加分取地主浮财的斗争。

上述四种成绩的获得，是不容易的。第一，靠全体同志们的努力；第二，靠各级军政负责同志的正确领导；第三，靠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供给部与参谋处，供给部与民运部的配合和互相协助，这是应该指明的。

二、缺点与不良现象

以上是成绩，现在来报告缺点和不良现象。



今我党开展三查运动，我们对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更应着重检讨；同时总起来说，我军去秋南下以来，缺点也的确多于成绩，我们违反政策，损害人民利益的不良现象确是十分严重的，我们有深刻警惕和用力纠正的必要，共计有五大缺点和不良现象。我在下面报告这些不良现象时，也要征引一些典型例子，但由于我们的调查是不全面的，故不能说提到名的，就是有毛病或毛病大，未提到名的，就是没有毛病或毛病小，这是要首要申明的，以免误会！今分述如次：

- (一) 乱没收（略）；
- (二) 贪污浪费腐化（略）；
- (三) 无制度（略）；
- (四) 强买抢购（略）；
- (五) 本位主义（略）。

三、不良现象的根源

前述五大不良现象或严重缺点，在这次休整和三查学习以后，当然会纠正不少，但绝对不要以为以后即不会发生，相反，如果我们不警惕戒备，仍会严重重演。现在有好多单位，伙食过支，经费过支，都准备再出击时乱抓一把来解决，故为了便于今后纠正和防止起见，须要将其根源揭发出来。

(一) 客观上的原因

1. 物资困难，需要迫切，因而有时就放松对政策的



注意；

2. 行动频繁，战斗紧张，因而就增加“检查工作纠正偏向”的困难。

(二) 主观上的原因 (这是更主要的原因)

1. 领导上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例如前委过陇海路时，所发出的筹粮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具体周密，至于对城市官僚资本，则是缺乏明确指示。这样，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观点，就必然会在下面代之以起，来指导行动，其内容主要有三：

(1) 盲目性的左倾冒险主义情绪，以为对大地主官僚资本恶霸等打得过火一点也不妨，由于划分阶级的界限不清，就更助长这一思想行动。

(2) 以新区为殖民地的观点，并含有错误的报复情绪，引起对新区物力的浪费和破坏，再加当时以为“反攻就将一直反攻过去”的思想，对新区缺乏长期建设的观点。

(3) 单纯的供给任务观点：服从片面需要，不顾政策。

2. 无健全的组织 and 周密的制度——到新区没有地方政权，部队供给机关的任务突然加重，但人员依旧，各级地方工作委员会又形同虚设，未能从组织上做到“全党当家”，制度又涣散殆尽。

3. 党内不纯 (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这是贪污浪费腐化现象普遍生长，成为群众性偏向的主要原因。



以上主客观的各种原因，是我们今后纠正和防止前述五大缺点的努力方向，而以上这些混乱庞杂的思想作法，则是脱离群众不顾大体的，都是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不相容的，也是同新解放区的经济情况与财经任务不相容的。今后我各级党政军机关要加强财经工作的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澄清上述各种庞杂的思想，纠正本位主义倾向，把统一观点、战争观点、群众观点与发展观点这四个观点认真贯彻到新区财经战线上去，使财经工作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与军事政治方面的伟大胜利！

第三部分 今后供给工作中的 若干政策问题

一、筹粮政策与给养问题

今后新区供给工作中最大的问题，当仍为吃饭问题。我一兵团人马粮草消耗，每天要小麦杂粮约36万斤，草约48万斤，菜金2,000万元（按目前160元计算），这巨大的消耗，一进入新区，就要加在新区人民身上，搞得不好，不是部队饿饭，削弱战斗力，就是违反政策，脱离群众。今提出以下意见和方针，以供同志们讨论：

（一）没收大地主问题。在豫皖苏没收大地主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是有其成绩的，但也带来更多缺点和毛病，



今后应怎样呢？我们认为对大地主及恶霸地主（切勿蔓延到一般中、小地主）的粮食浮财仍应没收，也对没收的目的、主体及条件，均应有明确的规定并纠正以往的偏向。

1. 没收的目的：没收的目的应完全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得到实利，而不应如过去那样是为了解决部队给养，甚至是为了私人发洋财，拿地主的红绸被子等，或为了大吃大喝，杀地主的肥猪、鸡、鸭，事实上过去部队打土豪（没收地主），却往往是为了后两种目的，筹粮还在其次，故遂使贪污浪费大大抬头，今明白规定是为了群众，没收的粮食浮财全归群众分配，这样即可免除部队乱没收和贪污腐化现象，同时我军还可更加接近群众。在豫皖苏常有群众这样反映：“部队分东西给我们，是因为他们不爱吃杂粮，不喜欢破旧的衣褂。”今后将没收的目的改变，群众当中这种不满和冷漠之声即可消除，至于群众没收的粮食。又适为我军需要吃粮时，则可向其说明，在军民兼顾的原则下，分给部队一部分（部队需出具正式领条），以免部队向该庄其他户筹借，这在群众一定会乐于接受的，关于其他浮财，则一律归群众，这样可堵塞很多流弊。

2. 没收的主体：没收的主体应为当地群众，我们不要过早过急地代替包办，我们只应从旁积极协助领导，消除群众中的“恩赐”观点，不认识其自身的力量。

3. 没收的领导与配合联系：上述没收工作，以后责成团以上政治机关负责协助领导，每一没收工作完毕以



后，必须作出专门书面报告，惟组织群众分配果实时，对于其中粮食一项，应主动照顾到部队的需要，与筹粮工作队同志密切联系。

4. 掌握没收的条件与情况：上述没收工作不是随时随地皆可发动进行，而应具备一定的条件，看情况由团以上政治机关来指导决定，所谓条件情况，主要即为：

(1) 敌我军事情况。(2) 地方党政工作基础。(3) 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一般说来在我过军地区及拉锯战或游击战不稳定的地区，我们不应过急冒险发动群众进行没收斗争，这有以下好处：

(1) 可暂时麻痹一下敌人。(2) 可减少对其他地富分子的刺激与粮食的移藏。(3) 无组织的群众可少受些打击与报复（过早没收，多分得浮财的，往往是二流子、狗腿子，后来受报复的又往往要多搞到真正的贫雇农）至于中心地区或较稳定的游击区或我原来即有地方组织基础的地区，则可发动群众，进行没收斗争。

在不发动群众没收斗争的地区，如有大地主及恶霸地主，他们自应列为我们首先借粮的对象，并可特别多借。

(二) 预借军粮问题

1. 借粮的方针：解决部队粮草，今后不与没收大地主工作直接联系，一般皆采取预借军粮的方式，说明我军的困难及将来可向民主政权抵缴公粮的保证，以及“预借公粮”的负担办法，这样可大大减少地富阶层的恐惧不安以及粮食的移藏，便利我们解决给养，这里我们应该完



全懂得筹粮的策略。

对地主特别是对拟没收而未没收的大地主、恶霸，也出给借据向其借粮，好象“右”了些，未免地富不分，其实只要向其先借多借，我们在阶级政策上，就没有什么错误。因为这些分子，到要用我们出给的“军粮借据”来抵缴公粮时，其土地也要平分分了，故“借”与“征发”实际是一样的，我们又何不采用更和平更策略的方式呢？

2. 中农问题：对于中农，各新区皆提“不借”的口号，这点似有再加讨论之必要，我们认为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中中农土地不动的原则，搬到借粮工作中来混同使用，我们应予区别。因为前者是社会各阶层重新分配农村社会的主要财富(土地)问题，后者是各阶层人民对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负担义务问题，同时根据抗日时期各地区征收公粮的经验，我们在江南苏浙皖山区的经验，以及我们去秋以来，在豫皖苏的经验，都证明象我们这样大的兵团在任何地区活动，如中农不负担军粮，单靠吃地主、富农，即将其全部粮食没收或累进预借完，也无济于事，特别是新区初期，我们还不能从其他县区，调剂粮食过来，部队在某一地区拉锯，则不敷之数更大，甚至连贫农也要被借，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只能提这样的口号：“地主先借多借，富农后借，中农必要时少借先还，贫雇农不借”。

3. 借粮的数额：借粮的方针与原则确定以后，与具体执行最有关系的问题，即阶层如何划分，预借额如何计算规定，这两个问题，如果规定得不明确，交到下面去实



行仍会不断违反政策，今提出意见如下：

(1) 划阶层：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详说，我们认为为了照顾到新区行军频繁、战斗紧张的特点和营、连干部及基层供给人员群众工作水平较低的特点，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精通最科学、最完全的划分阶层的方法，而只能要求他们切实注意地亩、租佃，以及人口三个因素，而师以上机关每到一个新的较大的地区（如由旱地地区进入水田地区，如由地质好的平原水田区进入地质较差的山岳水田地区等）即作一概况调查，规定每人（更低的要求，即为每户，不计人口因素）有田若干亩者，即大致为某一阶层，使营、连干部战士一查询，即大致可判别其为地主或富农、中农，在这里，亦为简单计，租出田与佃进田皆按每二亩作一亩折算，在江南苏浙皖赣一带，由于土地好，及土地分散及兄弟大多分家的关系，大概可例示如下（租出佃进的田，按折半计算列为其所有田内）：

	每人所有的田亩数约	每户所有的田亩数约
中农	一亩半——二亩	六亩——十二亩
富农	三四亩——六七亩	十三四亩——三十亩上下
小地主	六七亩——十亩上下	四十亩——五六十亩
中地主	十二三亩以上	六七十亩以上
大地主	十六七亩以上	八九十亩以上

注：小地主的基本特征，是出租其土地的一部分或全部，故前列小地主地亩数中，包含有二折二的关系在内，其表面所私有的田亩数则不止此数，中大地主同。



以上是最粗略的阶层划分方法，且为示例性质，倘条件许可，我们就需领导与教育营连干部乃至战士，作更精细的调查与划分。

(2) 预借额——各阶层每亩田（租进佃出的田二折一）一般能预借军粮若干斤呢？这由师以上机关掌握下列的负担率，调查所到达的新区之平均出产量，规定出一个数额，交下面执行预借。譬如假定江南每亩田（非山岳水田）能收大米300斤，则其各阶层每亩预借额大致如此：

	负担率（约数）	预借额（约数）
中农	5%	15斤
富农	10%	30斤
小地主	15%	45斤
中地主	25%	75斤
大地主	35%	105斤

上面两个问题解决以后，实际预借时，一面要看部队需要多少，其次还应了解对方实际存粮状况，亦不能机械硬照定额预借。对于地主，一面应提高警惕，注意其粮食有无分散移藏，同时如果他确有各种理由实在存粮已不多，我们亦应尽可能使其保有与当时当地中农相等的口粮。

(3) 借粮的若干具体规定：以上是预借军粮的政策问题，下列各点是我们实行预借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具体规定：

① 如地主不在家管业，则可请其佃户代缴预借之军



粮，在借据上加以注明。

② 祠堂庙产按地主土地预借。

③ 如有地方公共积谷，以先借用，如为国民党公仓、公粮，则予没收。如果吃不完而我军又要撤走的话，除开仓济贫一部分外，应尽可能转运至其他地区，并可采用人民运一担得分若干斤“军民兼顾”的办法来鼓励，如能变卖现款，亦可变卖一部。

④ 预借军粮，要避免完全交与保甲长去办，以防他们转嫁摊派，但对旧保甲长是可以利用的，特别是群众条件差与时间急促之际。

⑤ 在战斗中或行军过分疲劳时，可先就近借一些粮，然后再按前述办法借来归还。

⑥ 预借军粮，可由伙食单位分头在驻村执行，但团营要经常派人检查纠偏。休停三天以上，团即应负责组织集体筹措，师要负责划分地区，并加以调剂。

⑦ 借粮必须付给借粮收据，该收据为二联，粮食种类及数量皆固定印好，等于粮票，可免贪污，为了及时够用，必要时授权各团财经工作队与供给处负责印刷发行，方法极便利：一块刻好字的木板另附若干粮草斤数的木刻活字，带着纸与青莲或油墨，要那一类借据即可印出那一类借据。

这类借据的印行，团委要负责经常检查，并督促他们将发行数按时上报。

⑧ 机关部队饲养员多的，要组织他们于进入宿营地



后，即集体向老百姓借马料马草，因为他们最容易违反群纪，须特别注意。

⑨ 建议以后各级作宿营报告时，要增列借粮情况的报告，以利统一调剂。

⑩ 草随粮借，地主草不多时，可向富农多借些，进到山区，部队应自己伐柴解决，但不要损害山主利益。

⑪ 进城市吃粮，如无缴获，可通过原商会，镇、保长筹措，并尽可能防止其随便摊派，如有粮行，可向先借，但要筹还，如发觉有逃亡地主的粮食，可按预借军粮原则，尽先借用。

（三）菜金问题

1. 在行使本币很不利的条件下（如过军地区与边沿拉锯地区或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而又无蒋币代替，则动用随带之银元，但何时可动用，每日每人发若干，皆须由兵团部队或授权纵队通过财经部决定通知。

2. 如何使用本币，亦应以团为单位，由团财经工作人员负责设法利用缴获物资收兑用出之本币。

3. 在过军地区，如粮食充足，必要时亦可由师纵队负责决定，临时以粮代菜金若干日，过期再以粮换菜，即为犯法。在此以粮代菜金的若干日内，禁止以粮换猪吃。那时借粮时如能同时交涉如借油、盐、菜若干，折给粮食若干，付给借粮证，则更好。



二、没收官僚资本问题

我党在现阶段对一般工商业资本财产是采取保护和发展的政策，仅对下列两种始予分别没收：

（一）官僚资本

1. 官僚资本的两个特征：所谓官僚资本并非指国民党官员或与这些官员有关系的人所经营的工商企业而言，这不能算官僚资本。我们在界首涡阳等地所了解的和所做的是错误的，它乃是指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大工商业而言，它有两个很显著的特征：一是从其产生到发展，经常利用经济以外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关系，来加强对人民及中小资本家的经济剥削与压制操纵；二是从其产生到发展，常盗窃国家的公共财富，转为其私人集团所有（例如日寇投降后在华日资纺织厂，大多皆转入中纺公司为宋子文系所占有），来扩大其经济努力，以压倒中小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故官僚资本严格的称呼是垄断的国家资本。

2. 没收官僚资本的目的：我们要没收这种官僚资本的目的，是在解除它的加在人民及中小资本头上的压迫，而不是为了要破坏其生产力，更不是为了瓜分其工厂，以满足我军一时之需，我们应首先弄清此种没收目的。这样的官僚资本体系，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全国性的）及长沙、济南（一省的）等地，则有其直接的剥削机构（如银行、仓库、工厂等），在中等城市如许昌、无为、屯溪等地，在经济上一般能控制十数个县以



上，又往往与水陆交通及大宗外销土产（如烟叶、茶叶等）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中等城市，官僚资本亦常有其直接代理人，如银行的分支行，大的转运公司及操纵大宗土产的行商等，但亦常与其他工商家混合在一起。在这样的中等城市，官僚资本一般不采取工业资本形态，而常采取商业资本形态，这与它的“买办性”有关。至于在一般的小城市如涡阳、亳州等，官僚资本本身一般是不直接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后进入一般小城市，不必设想它有什么官僚资本，这样就可减少下面的许多错误。至于进入中等城市，我们也要特别审慎，谨防错没收，同时总起来说，官僚资本在这样的城市里，其所占比重（从商行户数来说）也是极少的，我们应谨防扩大。

（二）战犯等所经营的工商业

1. 战犯财产的区分及没收范围：战犯、汉奸、特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等所经营的工商业，根据刘少奇同志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是可以分别没收的，但并不是将它们作为官僚资本（即非从该工商业之经济关系出发）来没收的，而是因为该工商业的所有人在政治上有罪恶为群众所痛恨，这是我们应该分别清楚的。这样的工商业在中小城市也不是很多的，我们不应随便扩大其范围。兹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摘引如下，他说：

“工商中常常牵连到敌伪物资及汉奸、战犯、特务、保甲长等的财产处理问题。现在有些同志总觉贫民应斗一斗，分一点东西，但又要服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于是都



找到汉奸、特务，沾到一点边，就把工厂、铺子封了。

属于敌伪的物资及汉奸、战犯、特务、贪官、污吏的财产是可以清理没收的，但并不是说，凡是这些人员，不分轻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的要加以没收，这样做就错了。

一般国民党及敌伪小职员财产，不应没收，保甲长的财产，看他鱼肉人民的轻重，贪污的轻重而定，轻的可以不动，重的动一部分，但不要弄光，不要把范围搞的太大了，不要弄错了。现在有些同志将汉奸、特务扩大化了，什么叫汉奸、战犯、官僚、特务，什么人的该没收，一定要弄清楚。

敌伪军一般官僚不能算战犯，他们只是奉命令作战的，是正常的战斗行为。战犯是指援助战争，决定战争有关的人（如国民党军委会委员、国府委员、立法委员、举手赞成内战政策的国民代表等）及宣传煽惑内战的分子，在正常的作战之外，杀人的敌军军官（如虐杀俘虏及染上无辜人民鲜血的）也可以战犯看待。

所谓汉奸是指帮助民族敌人，决奸献计或在敌人掩护下屠杀抗日人员及坚决对抗战的分子，在敌伪机关中做事的小职员及受敌伪雇用的工人不是汉奸，不能把凡在敌伪方面做过事的人都看成汉奸，对于特务，也要把敌伪特务组织中的人员加以区别，看他坚决反对过解放军没有，不能把在敌伪机关中做过事的人都看成特务。

关于贪污官吏，国民党的官员中，不贪污的很少，所



以也应把压榨人民鱼肉人民较严重的和一般的官吏区分开来。”

所以对于战犯、特务等的工商业财产，及前述之官僚资本，我们事先皆应周密调查，不能随便扩大没收范围。

2. “得财用财”要继续生产发动群众：对于上述两种工商业资本的没收，皆应先查封登记，然后接收处理，如属工厂，一般皆应尽可能采用各种方式（如公私合办或与工人分红合办），继续生产，不能随便乱分掉，以缩小社会生产力。如属战犯、贪官污吏等的商店财产，没收后应全部或大部分分给当地群众。接管以上工厂时，原有技术人员及一般职员，我们可加使用，以利初期工作。没收后应出详实的布告。可否没收，应由师以上机关决定。

3. 坚持五不没收的原则：由于上述没收工作一有差错，即会严重影响新区城市的工商业前途，尤其今后的新区工商经济比较发达，是中国民族工商资本家集中的地区，他们很注意我党的实际工商业政策究竟怎样，我们对城市的工商业的一举一动，皆关系这一阶层人士对我的向背，故我们对上述两种工商业的没收，尤应审慎处理。在这里我们认为应坚持下列五不没收的原则：

(1) 对方情况不清楚，不没收。

(2) 时间来不及，不没收（因处理工商业没收事宜，非三五日所能济事）。

(3) 接管的条件不具备，不没收（这主要是对于工厂，以免破坏生产力）。



(4) 经济上不合算不没收(譬如漯河的电灯厂,不论它是否已为交通银行收买,我们皆不必没收)。

(5) 群众条件不具备,不没收(尤其是没收贪官恶霸等的财产)。

三、筹款与征税问题

(一) 筹款的策略形式和对象

过去红军时代打土豪,收土豪本人或其子并扣押在部队,限期要他送款来赎,这种筹款方法,今天不宜再用,因为我们今天已为全国性的正规军,再这样作有碍我们的政治影响。同时由于蒋币不值钱,地主也不会过多的储存蒋币,他们也实难多交,这可以从以下实例中看出:四十九团在阮寨,带了一位地主名叫程广福,他开始怕死,答应家中可以筹款来,但结果一直带到阜阳,仍无下落,后来送师部将他放掉了。

六纵在界首向商会财委会委员蔡仲品家(开有铁货店)筹款6,000万元,迫使该户临时拍卖货物,方筹起6,000万元(6,000万蒋币折合抗战前币制不过200余元)。

在城市中,一般与其筹款,倒不如征税为更好。十七师黄政委说:“他们在阜阳向二三十家商号筹款11,000万元,引起商家的恐慌躲避,得不偿失,反不如征税。”这是从实际中体会出来的,因为征税(例如货物税或营业税)自始即有一定边际,商民又有负担的习惯,容易推行。



不过在来不及征税，部队又急需要补充经费时，则亦可酌量用正式借的形式，保证以后可以抵税款。向中等以上的商户，特别是有官僚资本嫌疑的商号，或前述战犯嫌疑等的商号商借现款和军需用品，但必须团以上机关方有权告借，并须出具正式借据。

（二）征税的两种方式及应注意之点

征税有两种方式：

1. 是以团为单位，将征税人员配属在团财经工作队，随军行动，遇到船只货车即作宣传，征收货物税。
2. 是部队进城，由师财经工作处专设税务机关，征收货物税与营业税。

营业税之征收，可采取民主摊派方式。货物税不征内地摊贩及内地行销的土产，营业税征收小商贩，税率皆应低于国民党，使一般工商业能负担得起。税不重收，收税必须给正式税票，税率由纵队以上财经部规定。

四、缴获与城市管理问题

（一）对于以缴获保证供给的几点建议

缴获为新区解决供给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建议各级负责同志，今后必须保证以下各点：

1. 部署战斗时，必须同时部署缴获工作，使财供部门有依靠并使之具有相当的预见性，同时还得再作队前交代，列为战斗任务的组成部分之一，使战士们亦知配合协



助。

2. 估计缴获大时，尤应有临时统一的专门的缴获工作队组织，代表上一级来统率各部的缴获工作，以免慌乱脱节，缴获特别大时，最好有一军政负责同志留下指挥。

3. 坚决保证“一切缴获都缴公”的纪律之彻底执行，为了使这一缴公制度，更易见效，对缴获品之分配，主攻部队和直接经手者可有优先分配权，但不得超过供给标准的范围，缴获特别有功者可酌给奖励，为了免除下级战士说怪话，一切的缴获品的上缴及分配处理情形，皆应及时公布。

（二）对于城市缴获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为了使城市缴获工作（攻城战之后）作得更好，我们建议下列各点：

1. 组织财供人员在二线部队位置。前面战斗一结束，即协助其进城，给予一定的武装。

2. 除城防部外，其余部队立即撤出。

3. 对城市实行两三天的军事管理，必要时应限制民工及农民拥挤入城。

4. 要规定城防部队的工作守则 如何配合与协助缴获接收工作。



前言

新區新鄉供給工作主要的是以農業、畜牧、墾殖等方式來保障糧食的必需供給。但這項工作，必須之在實地新區政策下，我們我們各級幹部應在工作上而應努力加強教育政策開關。

我們對新區的政策與此小冊子，其中一類是財政供給工作。一文主要說明初期財政在經濟工作之程序財政政策問題，和一般原則。此區係由兩項包圍，去經濟政策，今後如有修正，其以前之修正時，其後之及財政供給工作之新計劃各級幹部應努力的爲了外也起給，但內之

財政供給工作，其後之及財政供給工作之新計劃各級幹部應努力的爲了外也起給，但內之

財政供給工作，其後之及財政供給工作之新計劃各級幹部應努力的爲了外也起給，但內之

財政供給工作



骆耕漠早年文集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大连黑石礁）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51,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伊 始 责任校对：王 莉
封面设计：柴 昕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4428·111 定价：2.10元